

文化生活译丛

Culture & Life



AUF EWIG IN HITLERS SCHATTEN ?

永远活在希特勒 阴影下吗？

[德]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著 丁君君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AUF EWIG IN HITLERS SCHATTEN ?

回顾过去几年的历史，可以发现，在统一后的德国，纳粹时代依然是一个被回避的话题。

除了1933和1945年，目前德国回避的话题中又多了一项内容：1989/1990。为什么会这样？“德国问题”到底意味着什么？

本书着眼的并不仅仅是德国历史，还有作为德国历史参照体系的欧洲和整个西方史。只有放在这一体系中，衡量德国近代历史的标准才会明晰起来：那是西方世界的标准，历史中的德国一度是西方的一分子，德国参与构建了西方世界，却不止一次地游离于西方之外。最后一次游离引发了世界史的一场大灾难。



译 歌德学院(中国)
翻译资助计划

定价:29.00元

ISBN 978-7-108-03640-7



9 787108 036407 >

文化生活译丛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永远活在希特勒 阴影下吗？

关于德国人和他们的历史

[德]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著

丁君君 译



AUF EWIG IN
HITLERS SCHATTEN ?

译
政法学院(中国)
翻译资助计划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AUF EWIG IN HITLERS SCHATTEN? by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2nd ed. 2010
© Verlag C. H. Beck oHG, München 2010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was financed by the Goethe-Institut China
本书获得歌德学院（中国）全额翻译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远活在希特勒阴影下吗？关于德国人和他们的
历史 / （德）温克勒著；丁君译．—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6

ISBN 978-7-108-03640-7

I. ①永… II. ①温…②丁… III. ①德国—近代史
②德国—现代史 IV. ①K5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7360 号

责任编辑 史行果

封面设计 罗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625

字 数 150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29.00 元

前 言

德国人会永远活在希特勒的阴影下吗？相较于二十年前，本书名提出的这一疑问已不太被人提及。在1986年的“历史学家大争论”中，我曾发表过一篇与本书同名的文章，讨论纳粹屠犹行为的独一无二性。这篇文章也被收入了本书中，并附有一篇我十年之后续写的回顾。1996年我思考的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真的只有保守派在宣扬“历史政治”吗？我们这些（自诩为左翼民主人士的）批判右翼修正主义分子的人，在言谈和写作中是否也在做类似的事情？时至今日，“历史政治”的概念早已变成了一个流行词，据我所知，这一概念最早是出现在“历史学家大争论”中（当年我在文中也使用过），为的是警示出于政治目的将历史工具化的危险。

两德统一并没有驱散希特勒的阴影，也不会驱散。“二战”结束四十年后，犹太人大屠杀才以其真正面目被德国人的集体记忆所承认，这一真面目是：大屠杀是20世纪德国历史中的核心事件。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大争论”才是一种必须之举。因为争议的真正主题是德国犯

下反人类罪行的历史地点，而触发争议的则是某些将欧洲犹太人大屠杀行为相对化的尝试。

两德统一后的头十年里，奥斯维辛的话题无疑变得越来越棘手，越来越可怕。部分左派以犹太人大屠杀为名斥责联邦政府参与以维护人权为目的的武装行为。1999年，在派遣联邦军去科索沃的问题上，红绿党的联邦政府却倒打一枪，声称：正因为有奥斯维辛的历史，德国才更应义不容辞地对巴尔干进行军事干涉。

自此之后，犹太人大屠杀的话题逐渐退出了日常生活，这是一种进步，因为任何一种对这一罪行的工具化都会逐步走向庸俗化。面对历史，负责任的做法应是致力于如何在当下为负责任的行为创造条件。从这一考虑出发，需要做到两点：其一，德国人不应该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止步不前；其二，德国人不应把犹太人大屠杀视为历史中的唯一合理教训，夸大看待某些政治决策。

回顾过去几年的历史，可以发现，在统一后的德国，纳粹时代依然是一个被回避的话题。1933年之前的历史未必直接导致了希特勒的上台，却为这一事件及其后果创造了前提条件。本书收录的多篇文章正是以此为讨论对象，从18世纪开始，探讨当时对德国后世影响深远的自由和专制体制。

除了1933年和1945年，目前德国回避的话题中又多了一项内容：1989—1990。直到1990年10月3日那一天，即两德统一之日，困扰人们一个世纪之久的“德国问题”才堪称真正得到了解决。为什么会这样？“德国问

题”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也是本书中某些文章思考的主题。这些文章着眼的并不仅仅是德国历史，还有作为德国历史参照体系的欧洲的历史和整个西方史。只有放在这一体系中，衡量德国近代历史的标准才会明晰起来：那是西方世界的标准，历史中的德国一度是西方的一分子，德国参与构建了西方世界，却不止一次地游离于西方之外，最后一次游离引发了世界史的一场大灾难。

本书中的文章基本都曾发表在日报和周刊上。笔者针对的对象并非专业人士，而是更广泛的、对历史感兴趣的普通读者群。某些观点和引文因其提纲挈领的意义在书中重复出现了多次，一些直接引用的出处在注释部分都有注明，但因为篇幅原因未能概全。如果读者们对本书探讨的课题有深入了解的兴趣，容我推荐大家参考我编写的19、20世纪德国史（两卷本），书名为《迈向西方的长路》（*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2000年由C. H. Beck出版社出版发行，目前已重印到第六版。

2007年3月，柏林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目 次

前言	1
一 普鲁士的革命只能造就国王	1
二 1848 年：艰难的革命	11
三 一位容克革命家	19
四 刺杀事件和不在场证明	29
五 反革命的革命	40
六 对内战的恐惧	51
七 被压制的罪责	59
八 千疮百孔的进步	75
九 1923 年：魏玛濒危	79
十 兴登堡——德国的灾难	90
十一 可避免的灾难	99

十二	沦陷之后的逆转.....	112
十三	融入西方.....	128
十四	柏林的巴士底狱.....	141
十五	永远活在希特勒阴影下吗?	151
十六	反面观.....	161
十七	11月9日.....	167
十八	波兰的解放和德国的统一.....	171
十九	矛盾的记忆.....	187
二十	什么是西方价值共同体?	200
	名词缩写表.....	224
	人名索引.....	225

一 普鲁士的革命只能造就国王*

10

一个国家的没落之路

普鲁士的正式解体非常短促。1947年2月25日，盟国管制委员会颁布第46号法案宣布解散普鲁士，理由是“（普鲁士）一直是德国军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载体，事实上它早已不复存在。”^{〔1〕}后一句话的争议性较大。在普鲁士的解体时间上，其实存在着很多不同看法：有认为是1932年7月20日的“普鲁士政变”，当日总统兴登堡（Von Hindenburg）颁布了一条紧急令，宣布解散总理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领导下名存实亡的普鲁士邦政府，并任命弗朗茨·冯·帕彭（Franz von Papen）为联邦专员接管普鲁士。有人认为是1933年2月6日，纳粹党以“稳定”名义解散了普鲁士邦议会。也有人认为是1945年5月8日，即德意志帝国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日。

* 《法兰克福评论报》，2001年1月18日。

〔1〕 Ingo von Münch（主编），《分裂德国的文件》，斯图加特，1976年，第54页。

普鲁士“是德国军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载体”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据称米拉波伯爵（Mirabeau）说过：“普鲁士不是一个拥有军队的国家，相反，它是一支拥有国家的军队，国家只是军队的驻扎地而已。”〔2〕事实上，这句话出自18世纪的德国军人作家格奥尔格·海因里希·冯·贝恩霍斯特（Georg Heinrich von Behrenhorst）之口。在18世纪，几乎所有集权制国家都是军事政权，普鲁士则首当其冲。18世纪中期，奥地利每六十个人中有一个士兵，而在普鲁士，每十三个人中就有一个士兵。

- 11 普鲁士的军事倾向并不仅仅是统治者的秉性所致。普鲁士公国曾由德意志骑士团统治，1618年，公国继承权落到了霍恩索伦家族的勃兰登堡选帝侯身上，当时的普鲁士虽然东接梅梅尔，西至莱茵河，却没有完整的国家领土。因此普鲁士对外来侵略和军事安全的担忧尤为强烈。1701年1月18日，在皇帝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I.）的认可下，大选帝侯的儿子弗里德里希三世（Friedrich III.）在柯尼斯堡加冕为“普鲁士的国王”，此时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势力还不够强大，但已迈出了成为强权大国的关键一步。

德意志强权

在第一任霍恩索伦家族国王的孙子——弗里德里希二世

〔2〕 Rudolf von Thadden, 《质疑普鲁士——一个被解散国家的历史》，慕尼黑，1981年，第58—59、167页。

(Friedrich II) 的统治下，普鲁士终于崛起为强权大国，当时的德意志地区有两个大国，另一个更为古老的势力是奥地利。和维也纳的哈布斯堡王朝不同，直到 18 世纪晚期的瓜分波兰事件，柏林的霍恩索伦王朝几乎只统领德语区。哈布斯堡信仰天主教，霍恩索伦王室则信仰新教。而勃兰登堡普鲁士国王之所以选择信仰新教，其间有一个关键因素：1613 年，选帝侯约翰·希吉斯蒙特 (Johann Sigismund) 从路德教改信了改革后的新教。

一个统治着路德信徒的加尔文信徒：正如提出“市场经济”概念的阿尔弗雷德·米勒-阿玛克 (Alfred Müller-Armack) 在 1941 年所言，这是“世界史上一次独一无二的结合”。^[3] 1905 年，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发表了探讨加尔文教和“资本主义精神”关系的论著。秉承着韦伯和历史学家奥托·辛策 (Otto Hintze) 的思路，米勒-阿玛克也试图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普鲁士现象：加尔文教精神为统治者赋予了政治活力，而被统治者则具有路德教的顺从精神——在霍恩索伦王朝的政权中，两者发生了历史中唯一的一次碰撞。

12

如果普鲁士真是一个纯粹的军事政权，它其实很难崛起为强权大国。事实上，早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父亲——“土兵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统治下，集权的霍恩索伦王朝在欧洲已被视为政绩显赫的典范。其实就统治手段而言，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强权政策和其他集权国家并无显著不

[3] Alfred Müller-Armack, 《经济风格谱系——18 世纪之前的国家经济形式的思想来源》，斯图加特，1941 年，第 141 页。

同，这位普鲁士国王最突出的特点是对风险和资源的武断权衡。弗里德里希二世 1740 年登基时，勃兰登堡普鲁士还只是一个领土分散、统治混乱的国家。此后弗里德里希肆无忌惮地发动了多次战争，最后却只因为一个历史的偶然才得到拯救，即“勃兰登堡家族的奇迹”：1762 年 1 月，弗里德里希最危险的敌人——俄国女沙皇伊丽莎白去世了。在七年战争的危机中，弗里德里希表现得可圈可点。然而他之所以成为一个传奇，是因为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政策最终取得了成功。也正因此，他的榜样才为后世带来了极大灾难。

如果弗里德里希只是一位单纯的军事统治者，他也不可能得到“大帝”的称誉。在当时的欧洲，弗里德里希的确具有代表性，然而他代表的是一种新型的国家政权和开明的集权统治。自上而下地贯彻理性：这一理念和其他集权国家的“唯我独尊”有根本上的不同。早在弗里德里希的统治时代，“Travailler pour le roi de Prusse”——“为普鲁士国王而工作”，已有“为自己而工作”的意义。当然这些工作应符合国家利益，必须是理性行为，住在无忧宫里的哲人国王——国家的首席仆人，似乎也在以身作则。

13 “让德国落后于西方世界的并不是其反动，而是其进步。”——1947 年，历史学家鲁道夫·施塔德尔曼（Rudolf Stadelmann）提出了这一极具矛盾性的说法，以此解释德国为何没有发生成功的革命。^{〔4〕}施塔德尔曼的“进步”指的

〔4〕 Rudolf Stadelmann,《德国和欧洲革命》，劳普海姆，1948 年，第 11—13（28）页。

是开明的集权统治和弗里德里希的个人作风。柯尼斯堡的依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纯粹—实用理性批判哲学家——虽然不赞成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但一直对法国大革命赞许有加。然而就开明的集权政治而言，连康德也认为，只有通过“国家智慧”，即自上而下的革命才能实现。因此他的呼吁并不是面向民众，而是面向开明集权的国家。〔5〕

国家最终听从了康德的呼吁，但为时已晚——1806年至1807年，普鲁士在拿破仑大军前遭遇惨败。此后，两位普鲁士的外邦首相——拿骚男爵卡尔·冯·施泰因（Karl vom und zum Stein）和汉诺威侯爵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堡（Karl August von Hardenberg）——先后进行了政治改革，改革虽然没有取消集权制，却唤醒了社会力量，以至四十年后的1848年，在这些社会势力的强烈要求下，普鲁士举行了第一届邦议会选举。就这样，普鲁士变成了一个宪法国家：这是1848—1849年德意志革命的寥寥成果之一。

普鲁士的阴影

德意志革命并没有达到其两个主要目标，即统一和自由。二十年后，俾斯麦实现了其中之一，其手段是对奥地利和法国发动战争，因为这两国是统一之路上的障碍。然而俾斯麦没有解决自由问题，也无力解决，因为议会制度违背了

〔5〕 Immanuel Kant, 《关于永恒的和平——一个哲学方案》，汉堡，1959年，第115—169（154）页。

老普鲁士、王朝、容克地主和军队势力的利益。但至少，俾斯麦一步一步地为男性国民争取了平等的议会选举权，先是在1867年的北德意志联盟，后在1871年的整个德意志帝国。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创建之所以被称为“自上而下的革命”，俾斯麦的政策是主要原因之一。对于这种称法，俾斯麦本人或许也没有异议。1862—1866年间，普鲁士和法国国王拿破仑三世在宪法问题上的冲突达到顶点，拿破仑三世警告俾斯麦普鲁士将发生自下而上的革命，俾斯麦则答道：“在普鲁士，革命只能造就国王。”〔6〕

直到1918年10月，“一战”的失败已成铁定时，德国才成立了议会政府。政权的议会化也有一定的“自上而下革命”的特点。如果从前的普鲁士真心支持宪法改革的话，或许帝制也能得到保留。然而他们没能做到，因此德国人在11月推翻了德国帝制，推翻的对象也包括霍恩索伦家族。

共和国虽然宣布成立，普鲁士建制却继续保留了下来。保留建制的目的是为了凝聚国家的东西地区，防止可能发生的分裂行为。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普鲁士和之前世界认识的普鲁士截然不同。作为德意志史上最大的邦国，普鲁士逐渐发展成为德国民主制最坚实的后盾。社会民主党、天主教中央党和左翼自由德国民主党在普鲁士共同执政，并以此证明，只要执政党既有政权意识又有妥协精神，议会制也能行得通。魏玛共和国社会民主党的“首席理论家”鲁道夫·西尔

〔6〕 Fürst Otto von Bismarck, 《俾斯麦全集》，柏林，1924年，第149页。

弗丁 (Rudolf Hilferding) 说过：“普鲁士是共和国地盘上的骄傲堡垒，我们的任务是将其发展成社会主义的骄傲堡垒。”西尔弗丁曾两度被选为财政部长，此番话是他 1929 年在基尔的社会党会议上的发言，这段“黑红金”的普鲁士宣言当时为他赢得了满场掌声。^{〔7〕}

然而到了 1932 年，连普鲁士的选民们都以多数票否决了民主制，于是“骄傲的堡垒”也随之崩塌。在多数派面前，民主已无回天之力。事实上，如果当时的总统兴登堡最终坚持阻止纳粹掌权的话，以德国总统的权力，宪法制依然可以得到保留。然而兴登堡受到了身边最亲近的顾问和朋友们的压力，其中包括易北河东的骑士贵族势力的著名代表，这些人希望通过让希特勒参政的方式来“驯服”他。1933 年 1 月，兴登堡终于让步了。很早以来，共和国的普鲁士遗老势力一直在努力取消魏玛民主制。1933 年 1 月 30 日，他们的奋斗“终成正果”：希特勒的议会内阁中，保守派成了多数派。

七周之后，即 1933 年 3 月 21 日，兴登堡和希特勒在波茨坦的迦尼瓮教堂共庆“老派权贵”和“新生力量”的结合，^{〔8〕}起因是新选帝国国会的人会议式，这一新选议会将通过为帝国政府授权的法令。当年迈的元帅兴登堡独自下到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墓室中，与国王进行沉默的对话时，很多德国人心中都涌动着同样的爱国主义情感，此前只有 Ufa 拍

〔7〕 1927 年在基尔举行的社民党党代会，会议记录第 180—181 页。

〔8〕 《舒尔特海泽的欧洲历史日历》，第 74 卷 (1933)，慕尼黑，1934 年，第 62 页。

摄的关于弗里德里希大帝的电影才能达到这种效果。然而“波茨坦之日”并没有复活老普鲁士帝国。新的执政者只是利用了老普鲁士的神话，为自己的政权赋予比 1933 年 3 月 5 日的成功获选更高的合法性。

如果没有利用弗里德里希大帝的神话，奥地利的天主教徒阿道夫·希特勒很难让德国人追随自己十二年。然而这个神话只是无数神话中的一个，效果并不明显，就像早前的帝国神话让德国人相信自己是历史的受命者，要领导整个欧洲，保护西方不受反基督徒（布尔什维克人）的侵犯一样。代表老普鲁士势力的军方、外交和高层势力虽然对这位新秀领导颇有微词，但当他们看到希特勒一步步地为德国洗清了 16 1918 年的败战耻辱后，也不由欢欣鼓舞。这些老派精英并不想和英法动武（希特勒本人也想避免与英国作战），因为这样的战争很可能扩展成为世界大战，但他们毫不反对将战争作为扩张德国势力的手段。这些深受威廉二世影响的精英对攻打弱勢的波兰毫无异议——毕竟这场战争的目的是夺回属于德国自己的土地，并同时彻底消除波兰的威胁。当然，在保守派眼中，希特勒发动的最合情合理的战争就是对布尔什维克俄国的战争。

普鲁士的反抗

直到人们彻底打消了对纳粹政权的反动性质和犹太种族灭绝行径的怀疑之后，以普鲁士势力为主的保守派才开始对

希特勒发动大规模抵抗运动。此后，众多普鲁士背景的军官、地主和公务员在良心的号角下奋不顾身，死而后已。1944年7月20日的事件，对于某些参与者而言，也是对自身罪责的一种纠正。勇于参与此事的人，是需要一份道德感支持的。

“1944年7月20日事件”的十周年纪念过后不久，它已成为了联邦德国的一种“起源神话”。来自贵族、军方和教会的抵抗运动已变成针对希特勒本人的抵抗运动。在“7月20日事件”被视为德国宪法的铺垫行为之前，保守派反对党在当前和未来的政治方针上存在的不合民主之处，都被粉饰一新。在保守派看来，对希特勒的抵抗运动拯救了普鲁士的荣誉。若论起普鲁士在20世纪的角色，那么人们应该回忆的是这次事件，而不是老普鲁士在推翻魏玛共和国和希特勒掌权过程中的贡献。

17

20世纪80年代，民主德国也“发掘”了普鲁士。1980年，在昂纳克（Honecker）的要求下，菩提树下大街上重新竖起了弗里德里希大帝的骑士雕像——雕塑家克里斯蒂安·丹尼尔·拉乌赫（Christian Daniel Rauch）的作品。在此之前的一年，英格里特·米腾茨威（Ingrid Mittenzwei）出版了一本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传记，这本传记对这位霍恩索伦家族国王的一生作出了新的判定，肯定了其执政的进步性。1985年，恩斯特·恩格尔贝格（Ernst Engelberg）——他和米腾茨威一样，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出版了其《俾斯麦传记》的第一卷，恩格尔贝格在书中将德意志的统一阐释

为“自上而下的革命”，对帝国建立者的历史功绩也给予了充分认可。此时，普鲁士已不再是反动势力的代表，而被视为一种有功有过的国家体制。这种路线修正的动机很明显：社会主义统一党既然要推广其意识形态的统治基础，就必须让非马克思主义者在民主德国的官方历史观中得到认可。而仅仅强调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和反法西斯主义是不足以做到这一点的。

距离 1701 年国王登基三百年后，普鲁士已然成为了历史，其魅力和威力皆已丧失殆尽。普鲁士留给今天的影响，更多是其在 1871 年创立第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时的贡献。因为没有当时的第一个，就没有后来的第二个：1990 年 10 月 3 日，昔日德意志帝国存留下来的东西德地域合并了。对普鲁士的记忆被存留在当年的首都，它也是今日德国的首都。柏林令人严肃思考普鲁士在德国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摒弃将其或捧入天堂或贬入地狱的非友即敌的古老成见。

二 1848年：艰难的革命*

18

“所有条件一旦成熟，高卢雄鸡的高鸣将宣告德国复活日的到来。”1844年1月，马克思在流亡巴黎时写下了这句话。这位“科学社会主义”之父相信，法国正在酝酿着一场革命，它将不同于1789年和1830年的“资本主义”革命，而会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然而马克思认为，虽然法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最为尖锐，但两者之间的决战却会在德国而不是在法国打响。当时的德意志连资本主义革命都没有发生，马克思也意识到自己祖国的落后性。但恰恰是在这种局面中，这位辩证哲学家看见了机遇。因为落后只能通过激进的方式来解决，所以德国的资本主义革命将顷刻引发一场无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的心脏将是无产阶级，它的头脑将是哲学——更明确地说，是德国哲学家卡尔·马克思。^[1]

写下这句勇敢预言的四年后，高卢雄鸡再次高歌。1848年2月24日，“平民国王”——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

* 《时代》，1998年1月22日。

[1] Karl Marx,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柏林，1959年，第378—391页。

在巴黎的反抗民众前举起白旗，放弃了王位。三天之后，革命的烽火已经烧过了莱茵河。在曼海姆举行的一次民众集会中，巴登州的自由党和民主党人士要求德意志所有国家实行媒体自由，成立刑事陪审法庭，制定宪法，创建德意志议会。2月28日，自由党议员海因里希·冯·茄戈恩（Heinrich von Gagern）——后来的德国国家议会的主席——在达姆施塔特（Darmstadt）的黑森州议会申请召集德国议会，并要求“更换联邦首领”。此时，自由党的纲领已昭然若揭：政治自由和国家统一成为了很快传遍德国的“三月要求”的核心内容。

众所周知，1848—1849年革命的走势出乎了马克思的意料。温和的自由党根本没打算先推翻当前的局面，然后为工人阶级的革命让步。事实上，优裕资产阶级的领导者更希望和贵族阶层在自己的要求上达成和解。而工业无产阶级当时只是社会中的少数派，他们虽然追求彻底的社会和政治改革，却也没打算扮演马克思希望他们承担的角色。更有甚者，当时参与革命的农民数量远远超过工人，1848年初，各地农民一起抗议封建剥削和沉重税赋，而最关键的要求得到满足之后，他们又退回到保守派的阵营中。

1848年12月，反革命的力量在柏林大获全胜后，马克思斥责普鲁士的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倒向了“背叛”人民的一方。马克思的这番话一锤定音，历史的书写也以他的判决为标准。而当民主德国和苏联成为历史之后，这种谴责也随之消失。但是，“德国资产阶级在1848—1849年遭遇惨败”这一观点却依然深入人心，并且，持这一观点的人并不仅限

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信徒。

然而细究之下，对德国 1848 年革命的评判却大都变得温和一些。德意志国民议会和法兰克福保罗教堂议会中的自由党所提出的要求远胜于 1789 年的法国革命者。作为德国的西邻国，法国革命的目的无非是要夺取贵族和僧院的权力，把资产阶级——即“第三阶层”——扶上权位，而民族国家的框架在法国更是自古有之。反观 1848 年的德国，自由和统一同时摆在革命的日程上。他们首先要成立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党做主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至于自由的具体含义，狭义的自由党和民主党的观点也大相径庭。在巴登州，一群围绕着赫克尔（Hecker）和施图威（Struve）的坚定共和党人试图以一场政变来阻止国民议会选举的进行，这批人组成了一个少数党派。而多数派虽然拒绝君主政体，却也有诸多内部纷争。一方面，他们在国会和君主的分权问题上争执不休；另一方面，在选举权究竟应是“平等”还是“金本位”的问题上，他们也无法达成一致。

而更具争议性的是德国的统一问题。德意志国民议会的选举定在 1848 年 5 月举行，选举地定在 1815 年创立的德意志联盟境内。自 1848 年 4 月之后，东西普鲁士也被纳入了德意志联盟内，普鲁士大公爵领地波兹南的西部有一些德语居民，这一区域也加入了联邦。德意志联盟的主要领地还是哈布斯堡王朝的波希米亚（Böhmen）和麦恩（Mähren）（这些地域的居民大多不说德语）、“威尔士提洛尔”（Welschtirol）、特里斯特（Triest），以及克恩腾（Kärnten）、克莱恩（Krain）、施泰

尔马克（Steiermark）的斯洛文尼亚选区。

1848年初，所有成员国都理所当然地把说德语的奥地利划归到德意志联盟中。直到“光辉年代”时期，才出现了“大德意志”和“小德意志”两种路线，双方在奥地利是否属于德联邦的问题上针锋相对。大多数天主教议员、南德意志人和激进民主党人都属于“大德意志”阵营，他们根本无法想象失去了奥地利的德联邦。而哈布斯堡王朝如果加入了德意志民族国家，哪怕只有领土的一小部分，那么王朝必然会分崩离析。因此，维也纳拒绝了保罗教会提出的相应要求，1849年初，维也纳的拒绝令“小德意志”派占了上风，所谓的“小德意志”派大多为新教徒，和普鲁士关系亲密，主要阵地在美因河北部。

1848年初，在“德国问题”上，只有极少数德国人会考虑让普鲁士担当小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领军角色。不久之后，就发生了1848年的第一场重大外交冲突事件——石勒苏益格（Schleswig）争夺战。当年3月底，丹麦占领了两个易北公国的北部地区，这一区域虽然不属于德意志联盟，却紧接荷尔斯泰（Holstein）。不管属于哪个党派阵营，任何一个德国人都不愿意把石勒苏益格拱手让给丹麦。要挽回当时的处境，普鲁士是众望所归。普鲁士的军事行动果然取得了成功，但到1848年8月底，在英俄两国的压力之下，普鲁士只得和丹麦签订了停火协议，德意志议会中的大多数都认为这是一种侮辱。而保罗教堂议会也无力敦促霍恩索伦家族采取与王朝利益相悖的政策。

1848年深秋，局势已然明朗。如果普鲁士顺应法兰克福

多数议员们的意愿，那么欧洲很可能会爆发一场大规模战争。左派从来不会因为潜在的战争而退缩。相反，与沙皇俄国这一欧洲反动势力的大本营来一场革命之战，在当时甚至是很很有群众基础的念头。1849年3月17日，动物学家卡尔·沃格特（Karl Vogt），一位市民阶层的民主党员，发表了一篇令左派心花怒放的议会演讲，他在讲话中宣称，时机已经成熟，德意志应该联手波兰、匈牙利发动一场东西方之间的决战。“先生们，这是一场西方文化和东方蛮夷之间的圣战，你们不能用哈布斯堡和霍恩索伦之间的决斗来亵渎这场战争……不，先生们，你们要坚决拥护这场战争的本来面目，这是一场民族之战。”〔2〕

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干脆希望来一场“世界之战”。马克思为《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的新年致词中写道：只有当革命发展为一场欧洲甚至世界规模的战争时，才能获得成功，这场战争必须从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垮台开始，然后燃烧到资本主义的德国和代表着东方蛮夷的俄国。“法国工人的革命奋起和世界之战——这就是1849年的内容。”〔3〕

左派拥有无可置疑的执著精神。在欧洲，俄国是所有自由派、民主派和社会活动分子的眼中钉。然而，在一场革命战争中，革命者几乎不可能以大获全胜收场。若果真发生这样一场战争，则必然导致中欧的保守势力比1849年、1850

〔2〕 参见法兰克福德国立法人民大会速记内容。

〔3〕 Karl Marx, 《革命运动》（《新莱茵报》1849年1月1日），第6卷，第148—150页。

年的声势更壮大。考虑到这个背景，德国自由党派的妥协政策显得很合理。虽然激进派极力要求，但温和派出于合理考虑，还是决定避免和内外势力发生激烈冲突。

1848—1849年革命并没有实现其双重目标：德意志的自由和统一。1849年4月，国王弗里德里希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拒绝了国会颁给他的“王冠”，这一举动无异于证实了这种孤注一掷政策的失败。同时实现德国的自由和统一是一种挑战，而德国自由派在当时还力所不及。

但是，1848年的革命者并非完败，而是有所斩获。1848年底，普鲁士已经成为了一个有待完善的法制国家。这样一来，霍恩索伦王朝和“第三德国”的立宪国之间的政治距离也随之缩小。这也为后来“自上而下的革命”的成功创造了前提条件，俾斯麦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在1866年到1871年之间实现了自由党派的统一愿望。俾斯麦的出发点是
23 解决“小德意志问题”，这是部分自由派人士基于1848年的经历奋力争取得来的，对于欧洲而言，这种解决方式比“大德意志”的种种做法更易接受得多。

1948年，正值德国革命一百周年纪念之际，图宾根的历史学家施塔德尔曼发表了一篇题为《德国和西欧革命》的文章。文章的核心论点是对马克思的“落后”辩证观的尖锐批驳：“让德国落后于西方社会的并不是其反动，而是其进步。”〔4〕施塔德尔曼在这里指的是德意志开明的集权主义对

〔4〕 Rudolf Stadelmann,《德国和西欧革命》，劳普海姆，1948年，第11—33（28）页。

革命的阻碍作用，他称其为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从这个角度来看，俾斯麦秉承的正是老德意志尤其是普鲁士的传统，他实现了1848年革命的某些要求，因为这些恰好符合了上层社会遗老势力的利益。

至于这种“自上而下的革命”的弱点，施塔德尔曼认为是“缺乏主动的实践意识和对西欧革命理念的理解”。〔5〕德国在“一战”战败之后实行了议会民主制，然而在君主制国体的影响下，很多德国人认为这是一种被战胜国强加的体制，并非德国本土产品。其实早在1930年初，魏玛共和国的议会民主制就已崩塌，而仅仅三年之后，也就是1933年1月，魏玛作为一个宪法治国家也全盘沦陷，其深刻原因可追溯到1848年被搁置的自由问题上。

1946年，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把纳粹政权称为“德国的浩劫”，而要长期纠正德国人对西方民主的偏见，取消这种偏见的高支持率，就必须得借鉴“德国浩劫”的经验。〔6〕这一经验至少对“民主忌恨者”中的“右派”有效，如果还存在与之对立的左派，那么民主德国——第二个德国独裁政权——的垮台也会产生比较持久的类似效果。 24

在合并后的德国，自由和民主这两个1848年革命的双重目标终得实现。而这一成功之所以姗姗来迟了一百五十年，

〔5〕 Rudolf Stadelmann,《德国和西欧革命》，劳普海姆，1948年，第14页。

〔6〕 Friedrich Meinecke,《德国的浩劫——观察和回忆》，威斯巴登，1947年第3版。

其原因深埋在德意志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人们一方面需意识到，当时革命的前景必将对德意志资产阶级的政治意识造成致命后果。但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事后假设，如果当时的革命热情更高涨一些，或许就能避免德国和整个世界在 20 世纪经历的灾难。1848 年革命是一次难产事件。如果试图对这一革命的面貌进行粉饰或隐瞒，则只能造就神话，不能启蒙。

三 一位容克革命家*

25

俾斯麦百年忌辰

地点：普鲁士第二议院。时间：1850年12月3日。议会正在商讨奥尔米茨（Olmütz）条约之后的局面，普鲁士通过这一条约避免了一场与奥地利的战争，但在自由党看来，这也意味着普鲁士屈辱地拜倒在哈布斯堡王朝之下。

然而保守派议员俾斯麦并不这样认为。这位勃兰登堡省的容克贵族在议会发表了一番演说，这不是他的第一次发言，却是他第一次重要发言。他表示支持《奥尔米茨条约》。俾斯麦说，“所谓大国，唯一稳健的基石是国家的利己主义，而不是浪漫主义”，这才是大国和小国的根本区别。他指出，普鲁士在奥地利面前的“傲骨”虽然是人心所向，却不是合理的战争动机。“一个政治家，无论身处内阁还是

* 《柏林报》，1998年7月25、26日。

议会，轻而易举就能迎合人心吹捧战争，一边在壁炉边取暖，或在讲台前口沫横飞，一边却让血溅沙场的士兵们承担这种政策的成败。世上再没有更轻易的事了，可叹啊，政治家，他为什么不在此时想好一个能在事后站得住脚的战争理由呢？”〔1〕

俾斯麦的这番言论对德国人的影响并不如他的其他言论。譬如，1862年9月30日，在普鲁士议院的财政委员会上，他曾说：“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讲和多数票决定的——这才是1848年到1849年间的重大错误——而是通过铁和血……”〔2〕俾斯麦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在这番话中领会了这位政治家思想行为的精髓。而1888年2月6日，这位“铁血首相”在帝国国会上喊出了如下口号：“我们德意志人除了上帝，不畏惧世上的一切……”然而这句话的后半句却没有流传开来：“……而对上帝的畏惧才是让我们热爱维护和平的动力。”〔3〕

俾斯麦担任了1862年到1871年的总理，在他的领导下，普鲁士经历了三场战事：1864年和奥地利共战丹麦，1866年和奥地利打仗，1870—1871年和其他德意志邦国共战法国。在这三场战事中，不仅柏林方面支持打仗，战时的哥本哈根、维也纳和巴黎也积极迎战。俾斯麦打起的并不是

〔1〕 Fürst Otto von Bismarck, 《俾斯麦全集》，柏林，1924—1926年，第10卷，第103—105页。

〔2〕 同上书，第139—140页。

〔3〕 帝国议会谈判速记记录，第102卷，第733页。

“浪漫主义”的战争，而是“国家利己主义”之战，也就是说以他理解的国家理性为动因。

他从“小德意志”的立场上解决了德国问题，也就是说，将奥地利排除在外。俾斯麦实现了一个民族方针，而这个方针正是法兰克福保罗教会在1849年3月艰难拟定的。对欧洲其他国家而言，“小德意志”方案远远比“大德意志”更能让人接受，虽然后者一直更受保罗教堂议会青睐。如果出现了一个大德意志，将哈布斯堡王朝的德语区甚至波希米亚、麦恩的部分领土纳入自身，它将极可能在欧洲横霸一方，远远超出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的势力。

俾斯麦并不似拿破仑三世，这位法国国王是一个好战的政治家，但俾斯麦从他身上学到了处理内务政治的本领。到1875年，身为首相的俾斯麦宣称德国已身处“临战危机”，至此，他认为德意志的国土版图已经“饱和”，不再需要继续扩张。但俾斯麦和后来的威廉家族继任者不同，他并不主张实行威信政策——这一点在上文提到的1888年2月6日的帝国国会讲话中可见一斑：“强权国家如果在无关自身利益的²⁷事情上强行干涉、插手、号令他国政策，他们实行的是强权政治，而不是利益政治，他们目中只有本国的威信。”〔4〕

从技巧和远见上看，俾斯麦的处理内政的手段要远逊于其对外政策。他的内政措施甚至多次拖垮了他的外交。1879

〔4〕 帝国议会谈判速记记录，第102卷，第725页。

年，俾斯麦施行了粮食保护税，却导致德国和俄国关系一度降到冰点，当时俾斯麦正在与俄国示好，并试图通过 1887 年的保障条约与俄国重新修好。俾斯麦令德俄关系恶化，从而导致了后来的恶果，这也是他 1890 年下台之后对继任者的不满之处：德国不得不对法国和俄国进行双线作战。

俾斯麦的内政一开始就与宪法背道而驰。1862 年 9 月 28 日，国王威廉一世将当时任普鲁士公使的俾斯麦从巴黎召回担任首相，威廉一世当时打算进行军队改革，却遭议院拒绝，因此希望借助俾斯麦扭转议院的态度。而俾斯麦为了说服议院重整军队，借用了所谓的“桥梁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宪法并没有考虑到议院和国王、上院之间出现意愿冲突的情况。俾斯麦认为，军队改革已然启动，不能撤销，因此即使没有议会通过的预算，国家财政也应该继续支持改革，直到上下两院通过此间的财政支出为止。而这种做法几乎等同于一场政变，而俾斯麦在这里也第一次步入了拿破仑三世的后尘。

- 28 拿破仑三世和普鲁士在宪法问题上发生冲突时，曾警告俾斯麦普鲁士将发生一场革命，而俾斯麦则答道：“普鲁士的革命只能造就国王。”^[5]这位首相说得没错。1862 年到 1866 年的德意志政权虽然违反了宪法精神，但市民和工人们只是口诛笔伐，却没有拿起武器走上街头。普鲁士在 1866 年战胜奥地利后，所有政治阵营都在议论俾斯麦的“自上而下的革

[5] Bismarck, 作品集, 第 8 卷, 第 459 页。

命”：保守派大加批判，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则非常欣赏。直到近二十年后的1884年，恩格斯还在给奥古斯特·贝贝尔（August Bebel）的信中写道：“1866年完全是一场革命。”恩格斯认为，普鲁士仅仅通过推翻德意志联盟和内战就建成了德意志帝国。“普鲁士胜战之后，推翻了三个‘天赐’的王权，统一了各方，包括从前的自治市法兰克福。如果这还不是革命，我就不知道什么是革命了。”〔6〕

之所以具有“革命性”，不仅仅指普鲁士推翻了汉诺威、库尔黑森和拿骚的王权，同时还因为普鲁士从拿破仑三世那里偷学了一种统治策略，当时人将其称为“波拿巴式”：男性公民享有普遍、同等、直接的选举权，这一政策并不适用于普鲁士和1866年建立的北德联盟成员国，只在北德帝国国会的选举中有效。俾斯麦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直接争取民心，他认为民众更忠于皇帝，相形之下，优裕的资产阶级一直受到普鲁士三级选举制的眷顾，更倾向于投自由党的票。

这位来自阿尔特马克的容克地主想到民众时，脑中浮现的或许是他领地上的那些雇农的形象。而大城市里的工业无产阶级却是另一种类型的民众。因此，普遍平等的选举权并没有如俾斯麦所愿，反而产生了另一种效果：促成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崛起，而这些人更追随奥古斯特·贝贝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而这两人是伦敦的国际

〔6〕 MEW，柏林，1959—1961年，第36卷，第238—239页。

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徒，相反，“死气沉沉”的社会主义者费迪南德·拉萨勒（Ferdinand Lassalle）却反响寥寥，拉萨勒1864年死于一场决斗，他和俾斯麦曾有多次交谈，两人很是投契。

1866年底到1878年夏之间这几年，俾斯麦在议会中的最大支持者是民族自由党。这个党派中聚集了德意志自由党中的右翼分子，这些人很乐意与身兼普鲁士总理和北德联盟首相的俾斯麦合作。双方合作的基础是一部“豁免权法案”，普鲁士议院应俾斯麦的要求在1866年9月颁布了这条法案，为没有预算的政府授予豁免权。但俾斯麦根本没有向议会保证：以后在类似情况下，自己不会再像普鲁士宪法冲突时这样行事。这种豁免权在北德意志联盟和德意志帝国的宪法中得到了一定的延续：议会和人民政府并不能遏制王室权力。在法制体系和经济规范的改革问题上，民族自由党和俾斯麦的想法很合拍。民族自由党虽然未能让议会掌握执政大权，但也不能说他们是1866年的失败者。不过在这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里，俾斯麦在内政上的确大获全胜。

如果当时选择了另一种做法，就会违背“自上而下革命”的路数。俾斯麦实现了1848年的统一理想，而这一点和普鲁士国家理性不谋而合。至于1848年革命的其他愿望，譬如对自由的追求，俾斯麦实现了其中符合普鲁士的老统治阶层——王室、贵族、军方——利益的部分，当然这距离自由主义的理想还很遥远。但是，普鲁士德国绝不能演变为西方概念中的议会政体——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俾斯麦才

能实现德意志的统一。

“统一不就是一种自由吗？”1866年，一个民族自由党人在竞选北德帝国国会席位时以这个反问句安抚自己和他的追随者，他就是时年48岁的路德维希·班贝尔格（Ludwig Bamberger）。〔7〕在当时，自由派的资产阶级和德国的四分五裂以及掌握着土地的贵族“硕鼠”作战时，民族口号依然是他们的战斗号角。可1871年帝国建立之后，“民族”的意义发生了转变。在70年代的“文化斗争”中，自由派和俾斯麦将忠于罗马的德国天主教徒视为异族分子。在打击了“帝国的黑派敌人”之后，“红派”成为了新的对手：1878年，在俾斯麦的强烈要求下，民族自由党对一项针对社民党“危害公共群体的活动”的特别法投了赞成票，虽然这种做法其实与法制国家的原则背道而驰。

接下来，自由党自身也成了攻击目标。在一项“保护民族工作”的活动中，自由党遭到批判，他们对自由贸易的追求被视为损害了德国利益。1878年，德国颁布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二年夏天又实施了粮食和钢铁保护税措施，到此时，“民族的”已不再意味着自由主义和反封建，却演变成了反国际性，并已显露出了反犹的端倪。

70年代末，帝国首相俾斯麦和“曼彻斯特的自由党”决裂后，事业开辟了一番新局面，他成为了社会改革家。要把1883年的《医疗保险法》、1884年的《事故保险法》和1889

〔7〕《民族报》，1866年12月4日。

年的《养老和老兵保险法》提上议会的讨论议程，就要向反对国家的经济干预行为的人们宣战，而这些法律却能让德国成为现代社会保险的典范。

事实显示，俾斯麦并没有对工人进行严厉管制，或试图将他们拉出社民党的阵营。但他的确曾在一篇评论中说过：“动机并不能改变效果。”〔8〕社会改革法的效果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而这些法律能取得成效，很大程度上是俾斯麦的功劳。这位帝国首相坚信自己的计划最终能够成功。“国家社会主义必将取得最终胜利，”他在1881年说，“所有重新接受这一观念的人都会成为时代的主宰者。”〔9〕

以社会保障来取代政治自由：这位帝国的创立者并不是最后一个抱着这种想法的德国政治家。但是俾斯麦并没有成功地削弱或击溃社民党的力量——不管通过社会主义法还是社会保障的糖衣炮弹。在1890年的帝国国会选举中，红牌“帝国敌人”一跃成为最强大的党派。俾斯麦当时已年近七十，他不可能和对手主宰大局的帝国新议会共同掌管国家。于是他又想来一次政变，甚至想到了解散帝国，再与贵族们重新建国。然而1888年登基的年轻皇帝威廉二世却不愿意这样做。他在1890年3月30日免去了俾斯麦的职位。德国也因此免去了一次严重的国家危机，甚至一场内战。

帝国的创建者俾斯麦在任职首相期间已化身为一个活生生的神话。即使归隐汉堡的弗里德里希鲁尔城堡之后，他的

〔8〕 科布棱茨联邦档案馆，帝国总理府，1001—4169号文件。

〔9〕 Hans Rothfels,《俾斯麦和国家——精选资料》，斯图加特，1953年，第359页。

威望也更甚于前。在威廉二世和手下执政不力的烘托下，这位“萨克森老英雄”显得越发光芒四射。俾斯麦于1898年7月30日去世，那时在大多数德国人心中，他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偶像。他被视为帝国的推手、德意志的盘古以及弗里德里希大帝基业的竣工者。

俾斯麦无疑属于德国的伟人之列。他是德意志历史中最重要政治家，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有胜而不骄的胸怀，1866年即将战胜奥地利时，他已打算要和强大的对手结盟。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国家而不是民族，因此人们很难将他定义为一个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他虔信宗教，观念保守，因此不可能成为拿破仑三世那样的冒险家。俾斯麦具有出色的文采与口才，语言能力出类拔萃，演讲形象生动且高潮迭出。但俾斯麦也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在这一方面他的气量很狭窄。1884年1月，自由党的爱德瓦特·拉斯科尔(Eduard Lasker)——俾斯麦的政敌——访问美国时在纽约逝世，当时的俾斯麦竟然拒绝将美国使馆的吊唁信转达给帝国议会。

俾斯麦最伟大的政绩是他用小德意志方案解决了德国问题，即便到俾斯麦下台百年之后的1990年，连德国和四个战胜国签订的“二加四条约”都证实了这种解决方案的正确性。但是，由于俾斯麦不断壮大德国的势力，却导致德国人习惯了寄望于“高层”的壮举，却忽视了自身的责任，这也是俾斯麦带给德国人的灾难。俾斯麦虽然为德国人赋予了普遍平等的男性选举权，实施了一定的民主，却也造就了一个

不听命于议会的政府。而直到“一战”战败之后，政府才开始听从议会，但这样的背景也让魏玛共和国走得步履维艰。而希特勒之所以能两面讨好，一方面迎合民众的普遍选举权要求，另一方面迎合大众对西方民主的偏见，实际上也得益于俾斯麦影响深远的矛盾理念——“自上而下的革命”：首先实行选举权的民主化，后来才有阶级体制的民主化。

“俾斯麦敲断了民族的脊梁……”这句话出自历史学家泰奥多·莫姆森（Theodor Mommsen）1902年1月3日写给国民经济学家鲁约·布伦塔诺（Lujó Brentano）的信，而三年之后，莫姆森就与世长辞。^[10]莫姆森是民主党议员，他对俾斯麦的态度经历了从反对、支持到反对的三个阶段，他通过这句话总结了普鲁士和德国政治领袖俾斯麦的二十八年政绩。人们可以认同俾斯麦的伟大，但也要认同莫姆森评判的正确性。俾斯麦去世一百年之后，德国人才真正切身体会到这位首相及其政治手段的矛盾之处。

[10] Lothar Wickert,《泰奥多·莫姆森》，第4卷，法兰克福，1980年，第93页。

四 刺杀事件和不在场证明*

33

1878年如何成为历史的拐点

(一)

当帝国首相俾斯麦在弗里德里希鲁尔的花园听说柏林发生刺杀德皇事件时，第一反应正如其“铁血宰相”之名：他并没有询问81岁的皇帝的状况，而是把铁拐杖狠狠戳进大地，喊道：“现在，我们得解散帝国议会了！”^[1]

1878年6月2日，诺布林(Nobiling)的刺杀事件变成了德国历史中的一个拐点。仅仅在几周之前的5月2日，威廉一世已遭遇了水管工赫德尔(Hödel)的刺杀，而与第一次不同，这次刺杀令德皇身受重伤。其实，早在第一次刺杀事件之后，俾斯麦就有意在帝国国会中通过一项针对社民党的法

* 《法兰克福汇报》，1978年12月9日。

[1] Arnold Oskar Meyer 《俾斯麦——男人和政客》，斯图加特，1949年，第482页。

规，这条法律授权联邦参议院禁止“所有以社民党理念为目的的印刷材料和协会”。但这项提案以 251 票对 57 票的结果遭到了否决，连民族自由党都通过其党魁鲁道夫·冯·本恩森(Rudolf von Bennigsen)表达了对“特别法”的忧虑，因其触犯了自由权利原则，和自由党的原则背道而驰。^[2]然而发生第二次刺杀事件之后，资产阶级的观念发生了转变。

在卡尔-爱德瓦特·诺布林(Karl-Eduard Nobiling)的刺杀事件中，很难断定社民党就是其背后的授意者，这一点和马克斯·赫德尔(Max Hödel)不同，毕竟后者曾短期属于社民党的一员，直到其因为无政府倾向被党派开除。至于无政府主义者的个人行为 and 马克思信徒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质上是水火不容的两种立场，没有人有兴趣了解。1871 年，奥古斯特·贝贝尔在帝国国会曾发表过一次讲话，将巴黎公社的失败称为一场“小型的前哨战”，并声称“欧洲的大事件即将来临”，他自己并未正确意识到这番话产生的影响，也错估了当时的社会权力关系，但从此之后，在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心中，“社民党”开始和“暴力”概念如影随形。^[3]

事实上，早在当时，“社会主义工人党”已经有清醒的自我认识，正如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后来所言，他们是一个具有革命性，但没有革命能力的党派。^[4]然而除

[2] 帝国议会报告速记，第 48 卷，第 1503—1510 页。

[3] 同上，第 20 卷，第 920—921 页。

[4] Karl Kautsky,《通往权力之路——对柏林如何走进革命的政治观察》，柏林 1909 年第 2 版，第 44—46 页。

了工人运动，只有很少人意识到（或愿意意识到）两者之间的巨大区别，因此也几乎很少有人会质疑俾斯麦观点：刺杀德皇的指使者是社民党。第一次刺杀事件之后，很多人依然认为特别法是一种服务于错误观念的错误手段，但这些人6月2日之后也改变了观点。柏林的《民族报》（*National-Zeitung*）是当时民族自由党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在5月时还曾警告国人，政府建议的禁令预示着1849年反动势力的抬头，“反动何时休！”〔5〕然而诺布林刺杀德皇九日之后，这份报纸却一反5月的立场，表示民族自由党“在国家临危之际，应该把通过特别法打击反政府暴乱的工作提到最高日程上。”〔6〕

俾斯麦懂得解读一个时代的标志。他知道很多民族自由党的选民都跟他观点一致。俾斯麦希望新一轮选举能选出一个更好的议会——能实现他长久以来的立法计划的议会，不像从前的议会一样，能通过他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因此，在解散议会之后，俾斯麦转而通过选举活动来动员民众。俾斯麦通过半官方的“州联络处”呼吁“爱国的选民们”“围绕在皇帝的旗帜下”，并动员他们去了解“各种党派和候选人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解决政府的大问题。”〔7〕而作为俾斯麦的喉舌，《北德意志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只想看到那些“能为德皇及其属下忠诚服务，从民

35

〔5〕 1878年7月31日《民族报》。

〔6〕 《民族报》，1878年6月20日（早报）。

〔7〕 转引自1878年6月20日早报内容。

族而不是私人或党派利益的角度提供支持”的候选人当选。^{〔8〕}老普鲁士保守派的报纸《十字架报》(*Kreuz-Zeitung*)一直怀疑俾斯麦有革命倾向,这份报纸的观点更直接:“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延伸——任何有知觉的人都能一眼看出来。那些针对社会主义的人,应该先从自由主义身上下手。”^{〔9〕}

挑动民族神经的做法很有成效。两个保守党派又多争取了37个议席,总数达到了115个议席。而原先有129个席位的民族自由党则失去了29个席位;左派自由进步党的议席也从35降到了26。由于支持率下降,民族自由党最终决定赞成通过针对社民党的特别法。党派中的极右翼分子甚至反对对这项特别法加一个有效期限。在《边境使者》(*Grenzboten*)报上,一个匿名作家发表了一篇文章,表达了对未来帝国国会中多数派关系的忧虑,呼吁人们要利用当前的机会,“将社民党永远地踢出帝国的标注。正因为有这样的必要,所以更不能在特别法上加上一个有效期。甲之熊掌,乙之砒霜”。^{〔10〕}

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莱驰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是帝国国会的民族自由党议员,早在大选之前,他已明确表示要对特别法投赞成票。在《普鲁士年鉴》中,他将社民党称为“罪恶党派”,并引用了另一位比他的思想更自由的先生的话:“对我们而言,市民社会的成分比任何一

〔8〕 1878年7月30日《北德意志汇报》。

〔9〕 1878年7月30日《新普鲁士报》。

〔10〕 《边境使者》,1878年第3期,第479页。

个党派成分都更重要。”^{〔11〕}

36

（二）

1878年的5月和6月刺杀事件在三个层面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赫德尔和诺布林的刺杀行为直接导致了特别法的制定，这与自由的法制国家的原则是完全矛盾的。民族自由党投票通过了“针对社民党危害公共行为的法律”，虽然在他们的努力下，法律的有效期被定为两年半，但民族自由党还是违背了自己的自由原则，因为自由原则意味着，个人的罪责必须要根据普遍的刑法条例来制裁，而观点的表达并不属于一种须惩戒的行为。民族自由党对特别法的赞成票既是对俾斯麦的失败，也是对被释放的公民选票压力的失败。在1878年到1890年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有效期间，社民党的工人运动日渐感觉自己生活在政治和社会隔离区里。而这种意识正是培育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温床，给社民党带来了一种超越德国范围的沉重负担。

其次，刺杀事件激起了众怒，致使1878年7月30日的帝国国会选举中发生了法制动荡，也让俾斯麦借机在税务和财政改革上赢得了议会的多数票。直到1879年，新选的议会才通过粮食税和钢铁税实现了“骑士封地”和“钢铁工业”之间的联盟，然而这种联盟不但拖累了农业到工业社会

〔11〕 Heinrich von Treitschke, 《社会主义和刺杀行动》，载《普鲁士年鉴》41（1878），第637—647页（639，647）。

的过渡，也使得工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即从冶金业到新的电力技术、化学产业的结构转变，变得步履维艰。一直到 1918 年之后，农场主和矿场主的合作一直被右翼反民主势力视为是社会的中流砥柱。虽然重工业和地主之间的利益冲突不断
37 使双方的合作困难重重，但在危机时刻，这种共同的威胁感却牢不可破，因此他们才愿意重修自 1879 年来的联盟。粮食税最重要的效果是刻意保留了普鲁士的骑士地主阶层，而这后来也演变成魏玛共和国结构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是共和国崩溃的根本原因之一。

第三，在 1878—1879 年，对社会主义和革命的恐惧最终已成为一种特殊的“右翼”民族主义的通病。早在 1862 年到 1866 年的普鲁士宪法冲突时期，民族旗号依然是自由资产阶级打击封建贵族——国家分散的始作俑者——的有力工具。然而到 70 年代末期，民族主义的敌人已不再是右派，而是左派——即左派自由党和社民党中或真或假的国际主义分子。在这些民族主义分子当中，一部分是早先远离民族运动的人士——其中有普鲁士容克地主，也有那些厌倦了商业竞争的手工业者和小商贩——还有一部分人因为 1873 年以来的经济危机以及社会动乱放弃了自由信念，转而与普鲁士的军事封建势力缔结了一种社会再保险契约。最后一群人中既有保护税涉及的工业主，也包括德国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市民阶层。

1888 年，怀抱自由民主思想的帝国议员路德维希·班贝尔格栩栩如生地阐述了民族主义的演变之路，班贝尔格属于

1880 年和俾斯麦以及本党派决裂的民族自由分子中的一员，他的原话如下：“在普鲁士激进分子和萨克森协会的手中，民族旗帜已经扭曲了其之前的意义，而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扭曲，是因为民族主义的手下败将拾起了对手脱下来的长袍，将其改制成自己的式样，重新染色、修剪，然后套在身上伪装成民族运动的骄傲后裔招摇过市。”^[12] 38

民族主义的“右翼”对“左翼”的胜利是 1878—1879 年转型的意识形态表现，同时也是其遗留结果。虽然新型民族主义是经济危机的产物，但其对大众和领导阶层思想的影响却一直延续到经济危机之后。

(三)

曾有某些作家预言 1848—1849 年或 1866 年会发生“德国自由主义的败北”。然而温和的自由党和激进的民主党不同，他们根本不愿意看到 1848 年革命的发生，而且早在“光辉年代”之前，自由党已明确表示愿意和贵族联手进行改革，而不是互相敌对。到普鲁士宪法冲突后期，“民族自由党”（这是某些支持俾斯麦部分举措的自由党的称法）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原则。他们追求的目标类似于“货真价实的议会制”。他们希望让全民议会具有足够的掌控权，这样政府在原则问题上就不能长期僭越议会多数票的意愿来执政。多数民族自由主义者一直到 70 年代末期都在坚持这一理想。

[12] Ludwig Bamberger, 《政治文集》，第 5 卷，柏林，1897，第 217 页。

然而自 1866 年之后，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言者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自信，他们怀疑自己已经不再扮演着自己宣言的角色：“普通阶层”和“民族”的代表者。民众运动正在抢夺他们的风头，而 1867 年在北德意志联盟、1871 年在德意志帝国实行的普遍选举权更是推动了民众运动的发展。1878 年，自由资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并不是选举社民党的工人，对于他们而言，工人的威胁要小于“易北河东”（Ostelbien）的势力，这个区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保守党的选票集中区。

自由资产阶级在帝国最危险的敌人其实是天主教徒，这批人感觉自己在霍恩索伦的“新教王权”下饱受排挤。^[13]对自由经济政策、职业自由和通行自由的不满使天主教徒也加入到了农民、手工业者和商贩的大规模运动中，而自由党失去了一部分“天然”选民基础，也觉得是一种生死存亡的挑战。

自由党接受了这种文化斗争，他们的目的是将自己营造为唯一合法的民众运动组织。这种立场一方面完全秉承了自由主义的启蒙和进步思想传统，在主观上被视为对中世纪落后局面的抗争。另一方面，这种自由主义的原则却遭到其权力手段（针对天主教政治势力）的玷污。因此，这种文化斗争同时也是 1878 年后压制社民党运动的序曲。

对于俾斯麦而言，文化斗争是个极好的机遇，它能转

[13] 转引自 Theodor Schieder, 《1871 年作为民主国家的德意志帝国》，科隆，1961 年，第 175 页。

移自由党的注意力，让他们暂时不去考虑宪法政治目标以及对更多议会权力的追求。可以肯定的是，俾斯麦在法律和经济政策上对自由党作出了不少妥协，因为1866年到1878年之间的立法更具进步而不是保守色彩。但俾斯麦的意图是削弱而不是增强议会的影响力。他认为，如果帝国要继续保持内外势力，那么议会成员们——他称之为“无根无基的先生们”——得节制自己的要求，而政府权力却要增强。如果民族自由党的左翼不配合“帝国内建”，就必须和他们分道扬镳。在俾斯麦眼中，只有转向保守路线才能保持国家实力——虽然民族自由党大多对此表示赞成，但还是40 是有少数派例外。

1878年，民族自由党中的少数派对《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投了赞成票，但到了下一年，他们却不再赞成保护税措施，因为他们意识到，不断在俾斯麦面前妥协只能让自己继续出洋相。这些游离分子多是金融或商业资本家，其中也有一部分老普鲁士省的出身优裕的市民，1880年这些人又退回到反对党的阵营中，因为他们已无法和俾斯麦合作实行自由党政策。左翼自由党希望打破容克地主一统天下的僵局，他们希望协助市民阶层获得与其经济实力相应的政治影响力。然而到90年代末期，事实证明，他们发现如果不借助呼声极高的德意志“世界政治”，就无法实现这个目标。这是一种能让“坚定的左翼”批判者有归属感的战斗手段，没有什么更能证明德意志旧政权的自我意识了。

(四)

德国 1878—1879 年的转向过去了百年，一切皆已面目全非。帝国、皇帝和普鲁士容克地主都已烟消云散。1878 年被特别法迫害、摧毁的社民党在百年之后选出了西德地区的总理。昨日的社会革命家，今日的国家执政党。德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不同于西欧任何一个国家，作为一种宛如“文物”的意识形态，它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它在经济上变得愈发“反生产”，而经历了纳粹时代和两次世界大战，这种观念也已身败名裂。

在 1878 年的德国，“有组织的”恐怖主义只是市民社会的想象物；而 1978 年，它已成现实。恐怖主义不再是民众运动的旗号，相反，它所表达的，是对工人运动退出舞台、⁴¹ 丧失革命意识的抗议。曾有个自诩为精英的恐怖分子组织以法西斯式的蛊惑手段来自圆其说，他们不得不把联邦政府和“晚期资本主义”统统定义为“法西斯”，才能为自己的恐怖行径开脱。到了今天，针对恐怖主义的抗争——只要是在法制国家的范畴内进行——都是一种维护民主的抗争；1878 年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一种阻止帝制德国民主化的斗争手段。百年前社民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民主制；而 1978 年的激进分子的奋斗目标却是取消民主制。

1878 年和 1978 年的局面虽然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但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相似点。如果有人去研究 1873 年到 1896 年的“大衰退”，了解了当时经济发展的停滞、危机和普遍

的经济消极感，就会发现很多与当代的共同点。经济保护主义虽然已经超出了国家界限，但牺牲消费者来保全自己的做法，如今在很多行业都很盛行，与当年“保护民族工作”的呼声如出一辙。当今的世界和从前一样，一厢情愿地把恐怖暴力的幕后黑手想象得无比之长，想象自由主义分子是刺杀事件的幕后主使者，相信“刑法的软弱”是导致“散乱无章局面”的罪魁祸首：这些观点听起来并不陌生，它们登载在1878年6月7日的《十字架报》上。^[14]保守派自始至终相信：要对付激进的意识形态，禁令比政治争辩要有效得多。这种信念也为他们赢得了不少支持。虽然从客观上来说，联邦德国的政治体制要比帝国和魏玛共和国稳定得多，但是其主观上对危机动乱的恐惧并不亚于从前。因此，从始至终，德国人都普遍倾向于反自由主义立场。

在1878年到1978年之间，虽然社会现实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在政治行为方式上，德国在某些层面上几乎毫无改变。⁴²这里的德国指的并非只是联邦德国。“一个将安定视为首要公民义务的国家，必然只能通过这一手段来获得这种安定，那就是将那些在家不安分的分子赶出国门。”这段话并非出自民主德国的内阁发言，而是堂而皇之地登在1878年夏天的《边境使者报》上——俾斯麦的“爬行动物基金会”资助的刊物。^[15]如此看来，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德国历史中不仅有断裂，也存在一定的连续性。

[14] 1878年6月7日，《新普鲁士报》。

[15] 《边境使者报》37（1878），II，第46页。

五 反革命的革命*

从马克思到列宁

——为什么 1917 年没有发展成第二次 1789 年

一宗历史事件发生了四十年之后，已足够对其进行历史归类工作。俄国的十月革命发生在 1917 年，到 1957 年时，已过去了四十年。当时，历史学家理查德·纽因贝尔格 (Richard Nürnberger) 借此提出了一个观点：“在 19 世纪，人的自我意识在很大程度上部分取决于其对法国大革命的观点，就像在 20 世纪，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看法也决定了人的意识一样。”^{〔1〕} 弗朗索瓦·弗雷 (François Furet) 的最后一本书是《幻想的终结》(Das Ende der Illusion)，法语版在

* 《法兰克福汇报》，1998 年 11 月 7 日。

〔1〕 Richard Nürnberger，《马克思主义革命意识中的法国大革命》，图灵根，1957 年，第 61—76 页。

1995年出版，一年之后出了德语版，这本书正是对上述观点的一种强烈印证。^{〔2〕}

弗雷首先关注的是法国的左派知识分子：在1917年俄国的二次革命中，她看到的是在现实基础上重新演绎的革命史，例如1789年的革命，或更确切地说，1793年的革命。在雅各宾派“恐怖”做法的映衬下，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恐怖政策不但显得合情合理，甚至具有必要性：只有这样，一场内外交困的革命才能成功进行，实现自己的理念。这场革命必须实现自己的理念，只有这样，历史才不会丧失其人为给予的意义，那就是进步对落后的胜利。

涅瓦（Neva）和莫斯科（Moskwa）的活动家们在阐释自己的角色时，采用了和法国等外国同行相同的历史视角。“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壮观的效应，要感谢那些苦难中的大众，但它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让这些人的痛苦变得更深切，更尖锐，更漫长。”这是托洛茨基的一段话，托洛茨基当时是国防部人民委员（Volkskommissar fuer Verteidigung），这番话出自他1920年为本书宣传册写的前言，宣传册的内容是批判德国独立社民党员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3〕}在这段话里，托洛茨基即使不点明历史和当前现实的共同点，布尔什维克党员和他们的支持者也能领会他的意思：俄国革命者对全国大众的苛求，正如法国革

44

〔2〕 François Furet, 《幻想的终结——20世纪的共产主义》，慕尼黑，1996年。

〔3〕 Leo Trotzki, 《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Karl Kautsky, 《从民主到国家奴役》（Soziales Denken, Bd. 2），柏林，1990年，第7—174页。

命在对抗内外干扰过程中招致的严酷和贫困局面一样，既是合理的，也是无法避免的。

以法国大革命的经验作为参照，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俄国革命的过程进行事后辩护。布尔什维克革命自始就在试图验证一个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设想是：1789年和1793年的事件应在历史发展的更高阶段重复上演。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德国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贡献所在，这里说的贡献并非实际支持——如帝国统治者和陆军最高领导帮助布尔什维克突出重围的努力——而是理论上的贡献。两种贡献都具有同样的必要性。如果没有鲁登道夫（Ludendorff），那么1917年11月6日、7日（十月革命的真正日期）的革命根本无法发生，但如果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这场革命连题名都没有。

革命始于哲学家的脑中

“让思想促动现实是不够的，现实自身也要去促动思想。”这句话出自马克思的一部早期作品，也就是1843—1844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导论。^[4]而1917年的俄
45 国革命虽然具有革命性，却还不足以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理想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当时社会最紧要的问题依然是农民的贫困，而不是小范围工业无产阶级遭受的剥削。为了解决俄国面临的这一挑战，列宁给出的方案是，让工人和农民结成

[4] Karl Marx,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柏林，1959—1961年，第1卷，第378—391（386）页。

革命同盟，并容忍其“野蛮”农业革命的风格。这个方案虽然有悖正统，却也合情合理。列宁为了让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跳过了整整一个历史“社会形态”的阶段，也就是市民资产阶级阶段，这是他和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分歧。

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在初始阶段还不是科学分析，只是一种政治意愿的表达。在上文提到的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导论中，马克思对“1843年德国状况”和法国1789年革命在即的局面作了一番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德国的落后只能通过一场激进的革命来解决。他认为，德国革命将是一场彻底革命，德国人的解放也同时意味着全人类的解放。“这场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心脏是无产阶级。”德国历史已经为哲学的角色写好了定义。“因为德国的革命历史是理论性的，也就是宗教改革。当年的僧侣所为，也就是今天的哲学家所为，革命始于哲学家的脑中。”〔5〕而扮演和超越路德角色的哲学家正是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的理念宛如中世纪“权利转移”（*translatio imperii*）学说的现代版。所谓“权利转移”，指的是公元800年卡爾大帝登基时，要将罗马皇权从东扩展到西部，也就是从东罗马的希腊人发展到法兰克人或德国人地区，同理，马克思希望革命从西部燃烧到东部，从法国到德国，当然在“革命者转移”的过程中，革命的性质发生了变化。1789年的法国人进行的是一场经典市民革命。而鉴于社会的局面发生了变

〔5〕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第379、391、385页。

化，“高卢雄鸡”再次高歌时，宣告的应是一场不同以往的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革命将在法国燃起，但决战却会在德国打响。在此间，市民革命“只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期目标”。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在1847—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才明确表达这一观念，但其实只是对四年前“导论”中观点的重申。〔6〕

年轻的马克思就像一个“列宁主义者”一样，以三段论的方式来论证自己的观点：首先他指出一个国家的落后性与革命的激进性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然后，他就像列宁后来在俄国的做法一样，在发生三月革命的德国跳过了市民革命阶段。最后，马克思发现了一种革命先锋派，即批判的知识分子阶层。

马克思和恩格斯直到最后，也没有修改他们对市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类比结论。只有在对三月无产阶级革命的时间预期上，他们后来作了自我批评：1848年的条件并未成熟，工人阶级还不足以取代资产阶级登上舞台，然而随着工业的发展，革命条件正在不断完善，即使此前的无产阶级运动都以失败告终，但从辩证的角度看，也为未来的成功创造了基础。人们必须从中汲取经验。

马克思在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Die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中，总结了自己在1848—1849年革命中汲取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课是：无产阶级夺权之后，要

〔6〕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共产党宣言》，第4卷，第459—493（493）页。

稳固自己的政权，就必须对自己的阶级敌人进行全盘遏制。马克思自己的观点体现在他对“革命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描述中：“这种社会主义是革命的永恒宣言，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是取消阶级差异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7〕

虽然马克思在这里没有提及 1793 年的典范，但这一做法与雅各宾派的“恐怖”的相似性是不言而喻的。早在 1847 年马克思已写道：当时“实行恐怖统治的目的是，通过暴力手段消灭封建残余势力，就像在法国那样。谨小慎微的资产阶级花几十年也无法完成的任务，无产阶级的极端行为却会为他们铺好道路。”〔8〕

马克思和恩格斯期待了几十年，希望看到无产阶级革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像俄国那样的落后农业大国打响。然而到了 80 年代，马克思开始对自己的设想产生怀疑。1882 年 2 月，他第一次表示相信“革命的前锋将发生在”俄国。〔9〕三年后，也就是 1885 年 4 月 23 日，他在一封写给俄国女革命者维拉·萨苏里奇（Vera Sassulitsch）的信中对俄国的情况作了如下推测：“俄国的 1789 年即将降临。”他认为“俄国情况属于特殊案例，这里有大批具有革命能力的人”。而且，“如果布朗基主义——这种期望借助一小群同谋者的力量推翻整个社会的幻想——有那么一丁点儿存在合理性的话，必然是在彼得堡。”俄国的所有社会矛

〔7〕《共产党宣言》，第 7 卷，第 9—107 页。

〔8〕Karl Marx，《道德的批评和批评的道德》，第 4 卷，第 331—359（339）页。

〔9〕同上书，第 35 卷，第 276 页（1882 年 2 月 10 日写给 Johann Philipp Becker 的信）。

盾，“从古老共同体到现代大工业、金融业”，都被一个独一无二的独裁政权暴力统治着，“一旦俄国的1789年来临，那么它的1793年也就为时不远了”。^[10]

考茨基警示“无产阶级专政”

那么，列宁究竟是否如他自己所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产执行者呢？答案是肯定也是否定的。他只是从两位哲
48 学家的体系中选取了适合自己革命理念的那部分，忽视了他不兼容的部分。恩格斯在1865年曾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市民的自由、媒体自由和集会权利”是工人党“自身的生命元素”，“是他们呼吸的空气”，^[11]如果没有这些自由，工人党会变得寸步难移，然而这种信念并没有体现在列宁的理论和实践中。除此之外，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婉言暗示过，社会主义的过渡也可以通过无暴力的方式进行，但列宁同样忽视了这一条。然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他却全盘接受——以便对其进行全新阐释。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革命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工人阶级应掌握全盘大权，以便应对之前统治阶级的反抗。他们的前提是，无产阶级在此时应已成为社会的多数派成员。而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专

[10] 《道德的批评与批评的道德》，第36卷，第305—307页。

[11] Friedrich Engels, 《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意志工人党》，《道德的批评与批评的道德》，第16卷，第37—78（77）页。

政”是“被压迫者的先锋组织，其目的是遏制压迫者。”而这里的先锋指的是共产党，更确切地说，是共产党的领导组织。1917年之后，只有将阶级斗争的范畴扩大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范畴，在列宁眼中才是实在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专政概念就是这样的含义。^[12]

在时机的配合下，列宁实现了他的模式。正如考茨基在1912年的断言，这样做的结果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针对无产阶级的专政”。^[13]而假设马克思设想的革命如发生，其所理解的专政究竟应是怎样的模式，最终只能是一种猜测。而在反对力量的强弱对比下，社会主义过渡阶段或许会是一个长期过程，即使这种专政的确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也有可能发展为一种独裁形式。马克思在一篇探讨巴黎公社的文章中满怀激情地提到了“强制委任”，然而这种委任并不能对民主决策过程提供任何保障（更不要提个人自由权利的保障了）。^[14]反之，更可能发生的结果是，革命的领导者会试图将所有的权力都收回到自己手中。 49

1789年的局面（或泛看当时的“市民革命”）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也是无法复制的。但这一点并不能阻止俄国内外的布尔什维克及其信徒从相反的角度看问题——并在这种前提下保持其马克思主义者立场。落到斯大林头上的任务

[12] W. I. Lenin, 《国家和革命——马克思国家理论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作品集第25卷，柏林，1960年，第393—507页。

[13] Karl Kautsky, 《从民主到国家奴役》（见注3），第175—283（233）页。

[14] Karl Marx, 《法兰西内战》（1871年），第17卷，第313—365页。

是，在1789年和1793年之间作出本质的区分，并借此完全倒置马克思的观念。1926年，斯大林提出，革命的无产阶级政权并不应等待新型社会形态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成熟，而应主动创造这一条件，这一观点和革命的市民阶级的政权做法完全相反。^[15]它完全倒置了马克思体系中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更甚者，他还将马克思年轻时提出的落后与激进的辩证关系说推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

如果没有百万工人和农民的参与，俄国十月革命不可能发生，但这场革命并不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从领导者的角度来看，它尤其像一次革命知识分子领导的革命。它其实是一场反革命：一场针对西方“市民”革命的革命，一场针对1789年的理念、针对马克思提及的“人权”的革命。1844年，马克思曾将这种人权定义为低级的“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这里的成员指的是那些自私自利、脱离人类共同体的人们。”^[16]布尔什维克革命是一场针对1789年的反革命，它的方式是极端另类的，和法西斯运动截然不同。然而共同的对立也是一种共性。用社会学家莱纳·雷普休斯（Rainer Lepsius）的话来说，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20世纪中两次反对议会民主制和平民社会的大规模运动”。^[17]

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布尔什维克

[15] J. W. Stalin, 《关于列宁主义的若干问题》，第8卷，柏林，1952年，第12—81页。

[16] Karl Marx, 《关于犹太人问题》（见注4），第1卷，第347—377页。

[17] M. Rainer Lepsius, 《两德合并后两种威胁民主文化的独裁形式》，奥普拉登，1995年，第25—39（30）页。

革命也不可能发生。1914年11月，列宁呼吁将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转化为内战，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遵守了自己的口号。列宁的“第三国际”分裂了欧洲的工人运动，而他对内战的宣传更是推动了右翼激进抵抗运动的发展。因此，即便是后来的“反法西斯运动”，也不能成为之前的十月革命的合法借口。列宁的革命催生出了20世纪的第一个集权政府，而1917年10月也无法和后来继起的大规模活动脱清干系。

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在解释自己的“改革”政策时说，苏联就像需要呼吸空气一样需要民主（在这里他并没意识到自己正在引用恩格斯的话），说这番话时，他自己陷进了一种错觉，以为在不和列宁决裂的前提下对列宁创建的体系实行民主化，就像计算圆周的面积一样简单。然而变革在苏联是不可能发生的。^[18]

此后的历史学家或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联的解体就像布尔什维克的夺权一样是无可选择的事实。1917年的第一场俄国革命发生在2月或3月（根据格鲁吉亚日历计算），这次革命在当年秋天就已遭遇了惨败，现存秩序全盘崩溃。用历史学家曼弗雷德·希尔德迈尔（Manfred Hildermeier）的话说：“在明眼人看来，当时根本不需要列宁引用的‘反抗艺术’，就可以对松散的政权施以‘致命一击’。”^[19]

[18] Michail Gorbatschow,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会的结论发言》，第4卷，1986年7月到1987年4月，柏林，1988年，第394—401（397）页。

[19] Manfred Hildermeier, 《苏联的1917—1991——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和失败》，慕尼黑，1998年，第112页。

俄国革命和 1789 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弗雷曾言：“1793 年并没有令人忘却 1789 年，但十月革命却令人忘记了二月革命。”^[20] 1918 年 1 月 19 日，当列宁指挥人们以军事暴力解散了自由选举出的国民大会之后，俄国就已踏上了通向专政的道路。这是一次重大的转折点。

[20] Furet, 《幻想的终结——20 世纪的共产主义》(见注 2), 第 110 页。

六 对内战的恐惧*

51

为什么德国在 1918—1919 年未能发生大革命

1918 年 11 月 10 日，柏林左翼自由党的《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 上刊登了一篇大胆的文章。在此前一天，霍恩索伦皇室垮台，菲利普·舍德曼 (Philipp Scheidemann) 宣布了德意志共和国的建立，报社主编台奥多·沃尔夫 (Theodor Wolff) 在文章中将该日发生的事件称为“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在此之前，“一座铜墙铁壁的巴士底狱从未这样一击而溃”。“仅仅在几周之前，一个军事国民统治机构还在运作，它如此盘根错节、根深蒂固，仿佛将永远运转下去。柏林的街道上呼啸着政府官员的灰色小车，广场上矗立着罗马柱般的卫兵，那是一个庞大的军事机构，看似无懈可击的官僚系统领着大小政府部门。直到昨天早晨，它们还

* 《柏林报》，1998 年 11 月 7、8 日。

盘踞在柏林城中。然而到了下午之后，一切都灰飞烟灭。”〔1〕

事实上，灰飞烟灭后还有一些残余。当年的11月10日是一个星期天，就像宗教哲学家恩斯特·托雷奇（Ernst Troeltsch）记录道，市民们还像往常一样去格鲁讷森林散步。“没有人盛装打扮，都是普通市民，有些可能是刻意简装出门。一切都显得有些低调，就像人们的心情一样，虽然命运悬而未决，但他们依然因为事情的顺利解决而感到平静、欣慰。电车和地铁如常运行，保证必要的生活需求依然能得到满足。所有人的脸上都写着这样的表情：面包还有。”〔2〕

52 其实，1918年11月9日之后，“伟大革命”的说法很快销声匿迹。皇帝、国王和贵族们都失去了自己的权杖；一个政权被另一个政权所取代，但社会的秩序依然如旧。在去年的战争中，德国人在秋天最渴望的就是停止战事，重归应得的和平。要实现这一目标，德国必须变成民主制国家，因为只有在德国实行民主制之后，以总统威尔逊领导下的美国为首的西方战胜国才有可能在和平条件上作出让步。当然，在政权更迭之外，有些德国人还希望看到一场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还有些人觉得推翻王室是大逆不道之举。但这些人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德国人还是希望在推翻了和平的最大阻力——君主制——之后，他们能通过自由选举决定德国的未来发展方向。

〔1〕 Theodor Wolff, 《革命的成功》，载《柏林日报》，1918年11月10日。

〔2〕 Ernst Troeltsch, 《观察者信件——关于1918—1922年的德国革命和世界政治》，图林根，1924年，第24页。

这也是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领导的社民党的观点，1918年11月9日，这些社民党人出人意料地获得了政治大权。社民党反对革命的立场一如七十年前（1848）的温和的自由党。但两个党派都在最后时刻登上了革命的列车，因为列车已群龙无首，如果他们不对其施加控制，列车就会脱轨失事。毫无疑问的是，艾伯特及其党团拒绝任何一种“无产阶级专政”的游戏方式。虽然直到1918年10月的宪法更改，德国还从未实行过议会体系，但俾斯麦毕竟于1867年和1871年在北德联盟和德意志德国分别实行了男性公民普遍选举权政策。到“一战”末期，德国的出路只能是推行更全面的民主制：政府体系的议会化、女性选举权的推行、小国和社区选举权的民主化。而作为帝国民主制的先驱，如果社民党1918年偏离了这条航线，就会丧失自己的政治可信度。

53

显而易见的是，此时的社民党已不同于“一战”前的社民党。1914年8月4日，社民党在帝国国会中对政府申请的战争预算投了赞成票，原因不在于他们认为德国并非导致战争爆发的罪魁祸首，而在于，在战争已成为事实之后，他们想尽一切可能阻挡俄国军队的入侵。在战争预算的问题上，1917年的社民党分裂成了多数派和其他的“独立社民党”派。后者中还有一些激进的左翼分子，这些人于1918年底加入了共产党。

工人运动党的分裂成为了魏玛共和国的一项沉重负担，也同时成为共和国成立的前提条件之一，虽然这听起来有些匪夷

所思。议会民主制的前提是，工人组织中的温和势力要和市民阶级进行合作。而“一战”前的社民党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分子，他们拒绝这种合作策略，因为它违背了阶级斗争的教义。而恰恰是因为马克思教条信徒在预算之争后离开了社民党，剩下的人才能成为德国第一届民主政府的建国党派。

1918年11月9日到1919年1月19日之间，也就是帝制垮台和人民立宪大会之间的革命过渡阶段，社民党扮演了其有史以来最具争议性的角色。执政的社民党并不觉得自己是民主体制的创建者，相反，正如11月10日任职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艾伯特所言，社民党仿佛是“旧政权的破产经管人”。^{〔3〕}社民党所做的是保证帝国的完整，并尽量维持社会的安定和秩序。至于为议会制民主制创造更稳固的社会基础，在他们看来倒不是很紧要的日程。因此，虽然温和的独立社民党提出了很多建议，很多历史学家后来也觉得这些措施都具有可行性，但社民党并没有针对以下问题采取预防性政策：很多公共机构的重要职位依然由旧政府的支持者把持着，社民党本应针对性地重新调派人手到这些职位，还应建立起一支共和国人民防御军队。此外，很多工人都要求对煤矿产业实行社会主义化，而煤矿业恰恰是反民主的工业场主的大本营。

按正理来看，社民党在除旧和革新上都做得不到位。但他们的行动空间也的确有限。为了避免大规模的混乱，社民党不得不和企业家、高级官员和军队领导合作。他们如果和

〔3〕 德国人民大会立法会议谈话速记资料，第326卷，第24页。

整个市民阶层正面为敌，必然会导致内战的爆发。而之所以要避免德国爆发内战，是因为盟军干涉之后，内战便会扩大成为欧洲范围的大内战。

最迟 1918 年之后，“避免内战爆发”已成为社民党政策的首要日程和最高律令。经历了 1917 年的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格鲁吉亚历的十一月）之后，俄国已成为令人避之不及的坏榜样。从这场少数派革命中诞生了一个专制政权，且不是马克思概念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借用党内理论家、当时属于独立社民党成员的考茨基在 1918 年的一番话，这是“一部分无产阶级对另一部分无产阶级的专政”。〔4〕这种局面的后果必是一场血腥的内战。而社民党不希望德国再重蹈俄国的覆辙。1918 年 9 月 23 日，艾伯特督促社民党加入帝国的第一届议会政府，即马克斯·冯·巴登（Max von Baden）王储内阁时，以俄国内战为例，作了一番强有力的论证：“经历过俄国的人，从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考虑，不 55
可能希望我国也落到同样下场。”〔5〕

民主或内战：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而正是这个抉择决定了社民党和共产党的分歧。早在 1914 年 11 月，列宁已经喊出了“无产阶级的口号”：“将今天的帝国主义战争转化为内战。”〔6〕而在考茨基——列宁眼中的叛徒——看来，内战无

〔4〕 Karl Kautsky,《无产阶级专政》，柏林，1990 年，第 7—87（33）页。

〔5〕 《1898 到 1918 年的德国社民党帝国议会党代会》，第二部分，杜塞尔多夫，1966 年，第 442 页。

〔6〕 W. L. Lenin,《历史和苏联的社会民众》，柏林，1950 年，第 11—21 页。

异于一场大灾难。1918年他写道：“在内战当中，每一个党派都为自己的存亡而奋斗，而失败者只能灭亡。这种意识能轻而易举地让内战变得残暴起来……”〔7〕罗莎·卢森堡虽然对列宁的方式多有批判，但在内战的问题上，她更倾向于布尔什维克而不是多数派、独立社民党的立场。“人们想将内战驱逐出革命，但内战是难以驱逐的。”这是她1918年11月20日写在斯巴达组织的《红旗报》（*Rote Fahne*）上的话。“内战只是阶级斗争的另一个名字，而那种以议会多数制取代阶级斗争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想法，只是一种小市民的可笑幻想。”〔8〕

仅仅几周之后，抽象的论辩就发展成了血腥的事实。1919年1月4日，柏林爆发了“一月起义”，这次事件后来莫名其妙地被称为“斯巴达起义”。策划这场起义的主要是金属工业的革命首领、柏林独立社民党的领袖和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党中央，表面上，他们的目的是重新起用属于左翼独立派的柏林警察局长艾米尔·埃希霍尔恩（Emil Eichhorn）。然而他们真正的意图是组织德国国民立宪大会选举，德国第一届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将选举时间定在1919年1月19日。在德国共产党的建党大会上，代表们就不顾罗莎·卢森堡的抗议，
56 作出了阻止选举的决定。1月5日，卡尔·李卜克内西制定了“推翻艾伯特—舍德曼政府”的口号，此时他们的方针已然明了：德国共产党和其他左翼激进人士不愿重蹈一年之前，也就是1918年1月19日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覆辙，用暴力手段解

〔7〕 Kautsky, 《无产阶级专政》（参见注4）。

〔8〕 Rosa Luxemburg, 《人民代表大会》，第4卷，1943年，柏林，第407—410页。

散自由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而是从一开始就不让选举进行。〔9〕

面临这种对大多数德国政治意愿的强奸行为，艾伯特为首的人民代表委员会也不会乖乖就范：他必须镇压起义。他镇压的手段是以右翼势力为主的新建志愿军(Freikorps)，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也是他在11月9日之后几周内政策疏漏所致：直到那时，德国根本没有国民共和军（很难相信工人们会踊跃响应人民代表的呼声）。

志愿军铁蹄下的牺牲者中有德国共产党的两个核心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1月15日，两人遭到残忍谋杀。谋杀的主使者包括多数派社民党人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他是负责军政的国民代表。本来他的任务是用政治行为来引导正式或非正式的军方活动，并敦促人们面对起义者时注意“比例成分”的原则。可诺斯克没有这样做，他想杀鸡儆猴。但这种做法并没有削弱起义领导者（无论是死者还是生者）的责任：“一月起义”是一次反议会制的暴动，它诞生于对多数派意愿的蔑视，它必将引发内战和专制。

在1848年的德国革命中，也发生过试图组织立宪议会选举的活动：巴登的赫克尔暴动。起义者对自由党和民主党的谴责，一如七十年后共产党对社民党的批判：他们背叛了革命。事实上，在这两次事件中，温和派力量都违心地镇压

57

〔9〕 Richard Müller,《德国的内战》，柏林，1925年，第32—33页。

了激进少数派的颠覆活动。19 世纪的自由党和 20 世纪的社民党都只能饮恨背负“背叛革命”的骂名。然而柏林共和国却很明白，八十年前的德国是如何成为民主共和国的——他们也明白民主党为何在批判 1918 年和德国史缺乏“真正”革命的问题上含糊其辞。

七 被压制的罪责*

58

为什么魏玛的社民党放弃了与帝国的道德决裂

1914年7月24日。奥地利王储夫妇在萨拉热窝遇刺刚过四周，欧洲爆发大规模战事的危机日益严重。因此，社民党秉承着自己的全世界工人阶级联盟的方针，呼吁广大群众上街示威：有五十多万人参加了维护和平的游行。然而几天之后，也就是1914年8月4日，社民党和帝国国会的所有其他党派都对贝特曼·霍尔维克（Bethmann Hollweg）政府的战争预算投了赞成票。

社民党之所以投了赞成票，并非因为总理通过说辞让他们相信德国已经尽了一切和平努力，在俄法两国的逼迫下，德国只能宣战。令他们投赞成票的决定因素是，战争那时已是“铁定事实”，敌人已兵临城下，他们痛恨的“俄

* 《时代》，1989年3月17日。

国独裁分子”正在步步紧逼。正如社民党主席胡戈·哈瑟（Hugo Haase）在帝国国会讲话中所言，社民党只是“不愿意在危机时刻抛弃祖国”。〔1〕然而赞成战争预算也就意味着赞成“堡垒和平”政策，这也令社民党的党内面临严重的危机。1914年12月2日，李卜克内西成为了第一个对战争预算投反对票的社民党议员。1916年3月24日，又有18名议员投了反对票，并因此被开除出社民党。1917年4月，多位反对战争预算的社民党员们成立了德国独立社民党（USPD）。

59 “一战”刚结束，社民党就开始着手研究关于开战的德国档案。几个月之后，结论产生了：帝国对德国人民进行了长达四年的误导。德国并不是被迫加入一场自卫战争，国家的政治和军事领导者故意激化1914年的七月危机，因此必须承担战争爆发的主要责任。

1919年春天，在菲利普·舍德曼的联盟政府中，社民党是最大的党派，他们握有历史真相公开与否的决定权。如果社民党公开真相，也就意味着和沦陷帝国的道德决裂。这个决定的确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也有可能成为共和政府的一个新起点。

七十年前，帝国总统艾伯特建议政府同仁走公开真相的道路。1919年3月22日，他甚至参加了帝国内阁的会议，这是很罕见的。在这一天，舍德曼政府正在讨论是否要对巴

〔1〕 帝国议会谈判内容速记，第306卷，第8—9页。

黎和平谈判施加影响，澄清关于战争赔款的问题。艾伯特认为，既然英国已经拒绝了德国请一个中立委员会来决定1914年战争赔款的建议，德国就得亲自去做赔款审查。艾伯特关心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要以最严厉的方式谴责前政府的罪责”，对新政府的态度进行书面公示，并成立一个国家法庭，对战争的主要负责人进行问责。

在这一天，大多数政府成员都同意公开承认德国在“一战”爆发中的责任，只有一个特殊的人反对。这个人就是帝国财政部长奥乌根·施费尔（Eugen Schiffer），施费尔曾是一名民族自由党员，1918年转而加入新成立的德国民主党（DDP）。他警示众人：“认罪会让人民失去最后的自尊，令敌人大获全胜”。在施费尔看来，“一战”只是一场“自卫战”，是德国的“突出重围”的努力，否则，敌人的围困“会送德国走上绞刑架”，因此他认为德国并没有“责任”。而如果公布关于“一战”爆发的文件，会“让德国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60

社民党员、帝国部长爱德瓦特·大卫（Eduard David）驳斥了施费尔的观点。他指出，协约国早就知道德国档案中那些不光彩的内容。但“如果我们同意施费尔的自卫战说法，我们就同意了协约国对我们的一切批判”。

在这个问题上，社民党的帝国总理舍德曼并没有表态，而是让他的党友艾伯特作最后决定：关于“一战”爆发原因的德国档案被推迟公布，直到人们发现这些档案的存在。在此期间，德国应为巴黎的和平谈判准备一份战争

赔款问题的说明。对于建立国家法庭的提议，没有人提出异议。^[2]

1918年11月，革命政府、艾伯特领导的人民代表委员会已决定对1914年7月和8月的德国档案进行收集和公布。这项工作的负责人是考茨基。1914年之前的考茨基是社民党的首席理论家，而帝制结束后，作为独立社民党的代表，他被任命为外交部的“指派国务秘书”。

帝国内阁对考茨基举动的紧张并非多余。早在1918年11月底，拜仁州的州长库尔特·埃斯纳（Kurt Eisner），另一位独立社民党员，公布了一部分拜仁公使在1914年于7月至8月初时的报告，这些报告的内容显示，奥地利王储在萨拉热窝遇刺之后，德国曾督促维也纳政府对塞尔维亚采取强硬政61策。虽然慕尼黑的报业对报告的节选处理得十分糟糕，导致其澄清真相的效果十分有限，但有心人还是能从中发现，“一战”爆发前的德国根本没有尽到任何和平的努力。

1919年3月底，考茨基向舍德曼内阁递交了一份材料，材料的内容比人们想象的更糟糕，里面有很多德皇威廉二世写在外交人员的草案上的亲笔批示。这些材料显示，最后一任霍恩索伦家族的皇帝是一个好大喜功的煽动者，他处理塞尔维亚事件的原则是：“狠狠地踢流氓一脚”，还有，“奥地利要在巴尔干站住脚，压倒其他小国家，还要让俄国来为此

[2] 帝国总理府、魏玛共和国、舍德曼内阁文件，1919年2月13日至6月20日，波帕特，1971年，第85—91页。

埋单，否则将永无宁日。”〔3〕

这样一来，德国的官方政治整体蒙上阴影。直到1914年7月底，帝国不但在竭力挑拨奥地利和塞尔维亚的矛盾，而且放任这种地区危机扩大为德国、奥匈帝国这两个中级大国与俄法之间的战争。等到帝国政府察觉意大利不会加入他们的阵营，而英国肯定不会保持中立时，帝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特才在7月28日发出信号，要维也纳保持冷静，但为时已晚：奥地利已正式向塞尔维亚宣战，并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几天之内，一场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1919年4月8日，舍德曼内阁讨论考茨基收集的档案材料。负责报告的帝国司法部长、中央党人贝尔（Bell）表示反对文件的公开：他认为这会让世界对德国产生一种单方面的消极印象，因为档案中只有“一战”临近前的资料。但只有了解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例如英国的“包围政策”、法国的“复仇政策”、泛斯拉夫政策和大塞尔维亚政策等背景，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它。

62

同样负责报告的爱德瓦特·大卫却赞成公开档案，他认为，在当前的局面中，只有“全面的透明和真相”对德国才有益处，当局应该澄清，“目前的政府人员在战前和战时并不知晓这些文件的存在，而且德国已经完全铲除了前政府的残余”。此外他还表示，这段历史的背景虽然不能成为德国发动“防御战”的借口，但也能澄清一些问题。

〔3〕 Karl Kautsky, 《世界大战的起因》，柏林，1919年，第84—85页。

舍德曼在这场辩论中依然保持沉默，最后，他不顾大卫的反对，发出命令，“目前应该推迟档案的公布”。〔4〕1919年6月，政府发布了一部“关于战争推手之责任的白皮书”，套用考茨基分析后的结论，这本书“根本不像一本和倒台政权决裂的宣言”。〔5〕

至于艾伯特提出的关于政府立法建立特别国家法庭的建议，国民议会的立法委员会在1919年8月16日予以了否决。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议会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一战”的前因后果以及德国战败的原因。

1919年12月，外交部出版了考茨基整理的档案，并附上了一篇立场较温和的前言。然而这份文件公布得太晚了，已无法改善德国当时已成形的国际形象。此时国内的主流观点是德国在“一战”中的罪责是战胜国的谎言，而战胜国向世界传递这一观点，是为了在道德上谴责战败的德国，逼迫德国缴纳战争赔款。无论考茨基整理出的《世界大战的起因》内容多么全面，都已无法改变这一印象。

63 毋庸置疑的是，在1919年初的德国，如果政府真的坦然承认德国需对“一战”爆发负主要责任，会引发一连串内政外交的波澜。况且，即使德国承认发起战争的责任，战胜国难道会在和平条件上作出让步吗？事实证明，如果德国完全认罪，那么战胜国多半会趁热打铁，在战争赔款上提出更严苛的要求。而另一方面，无论作出何种选择，大部分德国民众

〔4〕 帝国总理府档案，舍德曼内阁档案（见注2），第146—149页。

〔5〕 Kautsky，《世界大战的起因》（见注3），第9页。

依然都会把怒气发泄在那些无心或有意导致德国糟糕局面的人们身上。最关键的是，如果民众得知自己在无意义的战事和痛苦中花费了四年时间，他们会如何反应？他们会憎恨战争的推手，还是憎恨给他们传递这一消息的信使？

这就是当时大多数政客的忧虑，这些人不仅包括出身中等的资产阶级，也包括大多数社民党人，也正为此，他们不敢全盘公开历史的真相。当然社民党和他们的市民阶层同行不一样，他们并不满足于从民族利益的角度来看待战争罪责的问题。社民党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影响到他们与外国社会主义党的关系。战胜国的社会主义党和大多数中立国的社会主义分子当时都对德国的多数派社民党表示了谴责，认为他们从1914年开始实行的“堡垒和平”政策和对战争预算的赞成票是对国际无产阶级的背叛，而独立社民党才是社会主义传统的贯彻者。

在战争结束后的第一次国际社会主义党派大会（1919年在伯尔尼举行）上，法国社会主义者阿尔伯特·托马斯（Albert Thomas）就呼吁要将德国的多数派社民党视为战犯的同谋者，应将他们开除出去。他的提法并没有得到呼应，而引起更大反响则是库尔特·埃斯纳的一番话，他表示自己不赞成是“资本主义打响了这场战争，到处都是罪人，我们向彼此伸出沾满血腥的手，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在我看来，如果对过去没有清醒的认识，如果不回首那令人震惊的往事，我们不可能进步。”〔6〕

64

〔6〕 Gerhard A. Ritter（主编），《第二个共产国际》等，柏林，1980年，第1卷，第201—208（Thomas）、234页（Eisner）。

埃斯纳要求多数派社民党人承认自己的错误，但他们的反应只是敷衍了事。社民党人表态认为：世界大战“总体而言是上世纪帝国主义政策的后果”，他们认为战争的导火索“首先是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发出的最后通牒，还有俄国的全国备战动员，以及由此而起的德国对俄法宣战”。如果要对战争的罪责问题进行全盘清算，所有参与国家都应该公布相关档案。社民党作出的最大让步是，承认德国入侵中立比利时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正是这一行为导致了英国的宣战，因此社民党表示对“由此引发的全球境况”表示“完全理解”。〔7〕

虽然社民党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但在伯尔尼的大会上，多数派社民党依然成为了赢家。虽然他们没有真正承认战争罪责，却依然得到了新成立的第二国际的原谅，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第二国际把德国革命的功劳算在了他们头上(虽然事实未必如此)，另一方面更是因为社民党对共产主义的敌意。战争刚刚结束，对当前问题的讨论已渐渐取代了对过去的反思。

这一倾向尤其体现在1919年6月中旬在魏玛举行的社民党战后第一届党内会议上。会议中，对于战争罪责的讨论已被搁置一边，核心议题为是否接受凡尔赛和平条约，几天之后，国民议会就要对此作出决定。这次党会选出了两个社民党主席，分别是奥托·威尔斯(Otto Wels)和赫尔曼·缪勒(Hermann Müller)，奥托·威尔斯在会上表示，战争罪责的问

〔7〕《第二个共产国际》等，第2卷，第804—805页。

题，应该推迟到公布档案之后再议，从与会者的掌声来看，他的确说出了大多数代表的心声：“我们坚信，战争的主要罪责应由旧政权来承担，任何人都不能阻止他们接受审判。但是，我也不会相信德国是世界战乱的唯一替罪羊，更不相信沙皇是纯洁的无辜者……我永远都不会认为，法国的复仇政策和战争毫无关联。”

根据威尔斯接下来的说法，德国人不应该为五十年前的政策（指1870—1871年的德法战争）埋单。“不，在国际上，卑躬屈膝、赔偿还债的国家是不可能得到尊重的。从没有过一个法国人或英国人为了和平条款的好处而愿意承认自己对战争负全责。在那些国家，民族骄傲感已根深蒂固，虽也有沙文主义的危险，却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我们德国人应该学习如何具有德国的民族感，而这一点，我们要向法国人、英国人以及其他民族学习。”

阿道夫·布劳恩（Adolf Braun）是社民党中的左派人士，任《法国每日邮报》（*Französische Tagespost*）编辑，也是国民议会的议员，对于威尔斯的“民族高调”论，阿道夫深表赞同，他认为，“威廉皇帝时代的民族感，还有老德意志、民族自由党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精神的民族感和我们今日的民族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们的民族感和国际精神并不矛盾……我们不要再讨论1914年战争的原因了，这种讨论不会让党派更强大……我们做过的，都已是过去的事，不应由今天的政治家来评判，我们不应老调重弹。”

在党会上，帝国总理舍德曼也刻意回避了战争罪责的问 66

题。相形之下，另一位管理外交事务的政府官员爱德瓦特·贝尔恩施泰恩（Eduard Bernstein）却对这个话题倾注了更多关注。贝尔恩施泰恩是社民党“修正主义”之父，自19世纪90年代就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信条表示怀疑——虽然考茨基对此表示严正反对——他也是战争预算的反对者，1917年加入了独立社民党，在很短的一段时期内，他曾象征性地同属社民党和独立社民党，但到了1919年3月，他又回归了社民党的组织。

贝尔恩施泰恩在党会上信誓旦旦地表示，他也有同样的愿望，那就是“尽量不让和平条约带给德国的灾难殃及德国民众。但我希望通过一种聪明的手段达到这一目的，我们要让人民了解真相，而（战胜国的）和平条款正是以真相为基础，我们不应跟着市民媒体乱吆喝……因此，德意志共和国必须和从前的体制划清界限。这样我们就要面对战争罪责的问题（说到这里他喊道：以上帝的名义！）为什么要犹豫？为什么要迟疑不决？为什么要回避关键问题？”

贝尔恩施泰恩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他最关心的问题。他充满激情地煽动党派代表们，不要再因为1914年8月4日社民党曾投票赞成战争预算而止步不前：“冲出囚牢吧，不要让这件事囚禁你们。”他认为，要社民党承认德国的错失，也并不是一种苛求。“我们要把自己从资产阶级的荣誉观中解放出来，只有真相，完整的真相才对我们有益。”

然而党会却不希望揭露真相。不幸的是，贝尔恩施泰恩还表达了一种观点，那就是和平条款中十分之九的内容

都是难以商榷的，这一观点引发了争论，与其说这场争论是对他这一观点的客观争议，更不如说是对游离分子贝尔恩施泰恩的道德审判。普鲁士的农业部部长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甚至大胆宣称，和平条款证明社民党在“一战”期间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阿道夫·布劳恩批判了贝尔恩施泰恩的“犹太人行事方式”，并认为他的讲话是“极端不合时宜的”。赫尔曼·缪勒十七日之后在凡尔赛的镜厅中签署了和平条约，在这次党会上，他把贝尔恩施泰恩比喻成一个小商贩，因为贝尔恩施泰恩起初提出十分之九的条款不可商榷，后来又改口称十分之八。来自莱比锡的代表弗里茨·库默（Fritz Kummer）则认为，贝尔恩施泰恩的行事方式和最近刚被民族主义分子谋杀的库尔特·埃斯纳如出一辙，他的墓志铭会是：“他是一个狂热的真相分子。”最终，舍德曼将贝尔恩施泰恩称为一个“魔鬼贵族”，因为妄自尊大的贝尔恩施泰恩甚至维护了敌对的帝国主义分子的立场。

只有一位议员古斯塔夫·豪赫（Gustav Hoch）表示支持贝尔恩施泰恩的观点，豪赫属于多数派社民党的左派分子，他表示：“我们要意识一个巨大的危机，那就是，被卷入民族主义的浪潮之中，这将会为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共和国带来难以言表的灾难。现在决定权在我们手中：如果我们在此时坚定认真地行动起来，无所顾忌、不惧外力，让真相公开，库默同志，如果我们让狂热的真相分子无处不在，深入家家户户，就不用再惧怕民族主义浪潮，虽然对于我们而

言，这一时期意味着难以言表的痛苦，但对于民众而言，它却是幸福的开端。”

豪赫的警示也是一种对未来的清醒预言，和贝尔恩施泰恩的出发点完全一致。“如果我将罪责推到旧政权身上，”
68 贝尔恩施泰恩在他的辩词中呼吁全党代表道，“那也就意味着，那不是我们德国民众的罪责，这种说法的意思是，那些欺骗了德国人民的人才是有罪的。这样一来，我就为德国人民洗脱了罪名。”〔8〕

贝尔恩施泰恩比任何人都更尖锐地触及了战争罪责问题的社会层面。如果社民党任由这一问题留在历史的蒙昧中，也就意味着将一个危险的武器交给了右翼对手。社民党不去谴责那些将德国人带入战争的人们，却一再撇清自己不是战败的罪魁祸首。既然民族主义是公民制德国最有效的黏合剂，因此，社民党的核心利益更应是告诉所有人，1914年前后，旧政权对广大民众的爱国情结的利用是一个过错。这难道不是阻止那些反社民党的中产阶级团体的最佳时机？和帝制德国的彻底决裂，从长远眼光看来，难道不是为新德国赢得更多国际支援的机会？

其实，要求完全公开历史真相的呼声要高于要求隐瞒真相的声音。然而，无论德国是否承认自己的战争罪责，战胜国都不会在巨额赔偿条款上作出让步。毕竟对于战胜国而言，德国对“一战”的责任已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因此德国

〔8〕 1919年6月10日至15日德国社民党党代会讨论记录。

关于战争罪责的讨论起初并未产生重大外交影响。

相比之下，关于战争原因的讨论却严重影响了德国内政。早在1919年就已可预见到，如果不对1914年的七月危机和德国的战争目的作出说明，德国就会陷入自己是战争无辜者的谎言中。此外还有一点很明确，德国人的罪责意识越淡漠，凡尔赛的和平条约就会越发激发他们的民族仇恨情绪。可想而知，这种仇恨会激发复仇的呼声，为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埋下伏笔。

社民党之所以回避或推延战争原因的议题，有很多层原因。一方面，他们担心认罪会让同盟国的赔款条款显得理所当然；另一方面，他们还担心这会影响联盟政府的凝聚力或社民党本身，他们害怕进行深刻的自我检讨，同时还具有一种缺乏反思的“民族感”，这一民族感还包含有一丝恐惧，恐惧社民党会再次被扣上“不爱国人士”的帽子。除非具有极大的勇气，社民党才会依照贝尔恩施泰恩的建议行事。然而舍德曼倡导的政策却带有更大的风险。

和凡尔赛针锋相对时，社民党和工会首领在言辞上令人想起极右翼人士。在魏玛的党派大会上，舍德曼表示，和平条款的深意在于，战胜国想把他们的经济模式强加给德国。“（他们）想把所有德国人都变成劳工，为别国的资本主义效命，直到油枯灯灭。他们针对的并不是德国的‘帝制’，而是德国的社会主义。”〔9〕

〔9〕 1919年6月10日至15日德国社民党党代会讨论记录。

卡尔·吉贝尔（Carl Giebel）是公务人员协会主席，自1912年开始任帝国议会的社民党议员，他在国民议会上的发言甚至比舍德曼更过激。1919年7月1日，在纽伦堡举行的战后第一届自由工会大会上，他把“一战”的主要责任归结到英国身上，并称赞德国工人的英勇举动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壮举。“那是无产阶级对国际资本主义的抗争。”^[10]

70 在舍德曼的党代会发言之前，自由工会已发布了一些类似的公告。5月9日，也就是德国和平代表团在凡尔赛拿到同盟国和平条款的两日之后，工会总委员会主席卡尔·雷基恩（Carl Legien）呼吁道，“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应“起来反对同盟国的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11]

1919年，自由工会比社民党更不愿意反思自己在“一战”期间扮演的角色。5月13日，在工会的董事会上，雷基恩提出，和平条约证明了工会在1914年的立场是正确的。“如果有人在战时还曾怀疑德国是否在打一场自卫战，在了解了和平条款的内容之后，他就不会再怀疑了。”^[12]

社民党和自由工会其实都并非发起反对同盟国“战争罪责谎言”的力量，但两方都在推波助澜，导致1919年时，德国人已普遍达成一种共识，否认德国对战争的责任。在整个争论过程中，最响亮的呼声来自右翼党派，他们认为德国的无辜在于暗箭难防，声称德国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却遭到

[10] 1919年6月30日至7月5日在纽伦堡举行的德国第二届工会大会谈判记录。

[11] 1919年5月31日，通讯报道。

[12] 同上。

了左派马克思信徒的背叛，因而丧失了正义之战的成果。社民党对这种言论大加谴责，但由于社民党在1918年、1919年已不打算和帝国进行道德上的决裂，因此最终也不了了之。

这种做法的后果，没有人比贝尔恩施泰恩看得更清楚。贝尔恩施泰恩和考茨基虽然在观念上针锋相对，却一直维持着朋友关系，在写于1914年7月26日的一封给考茨基的信中，贝尔恩施泰恩抱怨道，社民党至今还没有对右翼势力宣扬的“战罪谎言”表示反对：“如果说，帝制德国并非是唯一对战争负责的一方，那么只要稍稍用一些辩证思维，就能把这种观点解释为‘完全无罪’，这样一来，民众会很容易相信德国不应该推翻帝制，而‘犹太共和国’及其敷衍执政才是今日德国苦难的根源……我们要抵制民族分子的政变行为，如果再这么拖延下去，我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如果他们，哪怕只是很短的时间内，掌握了权力，那肯定会导致恐怖主义的产生，令人难以想象的恐怖主义。卡普（Kapp），1920年三月政变的参与者，只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但今天在逐渐掌权的那群人，却是肆无忌惮、冷血残酷的恶棍。”^[13]

71

没有人听信贝尔恩施泰恩的警告。无罪之战的说法继续在全国蔓延。这种说法的最大获益者就是希特勒，1933年1月30日，也就是贝尔恩施泰恩去世六周之后，希特勒被选为德国总理。正因为大多数德国人相信《凡尔赛和约》是战

[13] 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学研究所，考茨基遗物。

胜国的强加惩罚，相信战胜国在 1914 年利用“包围战术”将爱好和平的德国逼入战争，所以希特勒才能成功上台。1937 年 1 月 30 日，“夺权”四周年之日，希特勒宣布德国在凡尔赛战争罪责条款 231 号文件上的签名完全无效。而两年半之后，纳粹德国发起了又一场世界大战。

1919 年的魏玛帝国宪法

1919 年 7 月 31 日，魏玛的德国立宪国民议会以 262 票对 75 票的结果通过了《德意志帝国宪法》，此时社民党帝国内务部长埃德瓦特·大卫充满自豪地表示，德国目前已是“全世界最民主的民主国家”。大卫的理由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像德国宪法这样坚定不移地贯彻民主。这位内务部长之所以有这番激赏言论，也是因为德国宪法中有直接民主的成分：公民投票、公民决议，最重要的是，公民直接选出帝国总统。^{〔1〕}

然而在当时，大多数德国人并没有大卫这般热情。魏玛宪法是七十五年前帝国总统艾伯特签署、三日之后由帝国公报宣布生效的，然而 1919 年的德国人并没觉得这部宪法跟

《每日镜报》，1994 年 8 月 11 日。

〔1〕 德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谈判速记记录，第 329 卷，第 219 页。

自己有什么关系。这部宪法是多个党派——社民党、天主教中央党、左派的自由民主党——彼此妥协的结果，因此每个党派都有不如意的地方。直到极端右翼分子策动敌对和血腥运动时，宪法才成为共和国的一种象征。这些极端右翼分子令执政的党派意识到，围绕着宪法展开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而是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73 今天，人们一谈起魏玛共和国，首先想到的就是宪法的失败。在通过帝国宪法一年之后，在共和国第一次帝国议会选举中，三个宪法规定的党派就失去了多数选票。宪法生效还未满十一年，德国就放弃了议会民主制，转而采用总统制，而总统制的寿命连三年都不到。1933年1月30日是希特勒掌权之日，这一天也标志着德国第一次民主制的寿终正寝。其实在此之前，人们已经开始争论，魏玛共和国的失败是否也与宪法本身有关。

魏玛的失败的确与宪法有关。虽然帝国总统由民主选举产生，但他的权力非常大，却是这种民主选举的弊端，这种制度很早就导致很多议员跳过联合政府艰难的妥协程序，将责任推给“上面”的帝国总统，而根据宪法第48条规定，在某些（并未明确定义）的危机情况下，帝国总统拥有紧急状态委任权，可取代立法者的位置。自1930年夏天之后，德国已根据这种“预备法”的规定进入了紧急法令执政阶段。帝国议会几乎被排除在外，令德国政治变得越发极端，而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利用了大量的民众动员手段，代言民众的反抗情绪，1932年，纳粹党终于成为了

帝国最强大的党派。

国家法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是魏玛宪法最严厉的批判者之一，1932年夏天他提出，魏玛宪法“贯穿着这样一种合法性精神，它在内容上模棱两可，甚至在宪法的效力问题上都不痛不痒，不具备任何实在的公正性”，这部宪法实在不痛不痒到了“自戕”的地步。^{〔2〕}施密特当时还不是纳粹党员，而是总统制的支持者，他的批判一语中的：这是一部模棱两可的宪法。在1919年的德国还并没有形成足以抵抗敌对外力的民主体制，在帝国沦陷几个月后，如果再有人建议采用宪法规定的选民多数票制，已被视为重蹈了专制体系的覆辙。

到了1948年、1949年，波恩宪法的制定者们试图吸取魏玛的教训。他们希望，自此之后，再没有人能通过法定手段废除民主制，任何一个共和国国家元首都不会再享有立法者的权力，绕过议会，再也不会出现不具备执政权的无效多数派废除国家总理的情况。议会改变了模棱两可的宪法，创造了一种具有抵抗能力的民主制，这种制度为联邦主席赋予了一种代表国家形象的任务；它还有一种极有建设性的贡献，那就是议会可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这样一来，它比任何一项宪法条款都更有益于构建联邦德国的“总理民主”。这些正是波恩立法者从魏玛历史中汲取的经验，他们废除了对议会民主制构成威胁的公民投票程序，也因此增强了联邦

74

〔2〕 Carl Schmitt, 《合法性和合理性》，柏林，1932年，第32、50页。

议院作为立法机关的权力。

就议会执政制度而言，魏玛的民主制不够成熟。而东西合并之后的德国却截然不同，统一的德国借鉴的不是第一届共和国的十四年失败历史，而是老联邦德国议会民主制的四十年成功经验。然而波恩之所以没有重蹈魏玛的覆辙，也是因为魏玛的失败在前。虽然有诸多弊端，但魏玛宪法，尤其在基本权利上的规定，仍然是德国在法制国家和民主制进程中的一大进步。何况没有人敢断言，如果魏玛宪法更成熟一些，就能保证共和国不会沦陷。如果未来有一天，统一之后的德国人开始觉得没必要再以史为鉴，牢记 1918—1933 年的历史，那么德国的民主制将再度陷入危机。

九 1923 年：魏玛濒危*

75

1923 年 9 月 30 日，乌纳 (Unna)。乌纳是黑尔韦格边北威州下属的一个城市，这一天，鲁尔区某些矿区的矿场主聚集在一起开会，除了他们来自的区域，鲁尔区的其他矿区在 1 月都被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占领了。在这次集会上，矿场主们作出了一个后果很严重的决定：从 1923 年 10 月 8 日开始，他们要把每日工作时间从七小时延长到八个半小时。

其实，9 月 30 日的这次决定并不仅仅体现了雇主联合会的一种社会政治意图，它还有更深的含义。对于矿工而言，七小时工作制的规定就相当于其他经济产业的八小时工作制，这也是 1918—1919 年革命最重要的成果，当时，工会和雇主联合会隆重地签订了八小时工作制协定。自 1922 年以来，采矿业的七小时工作制甚至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而现在矿场主声明之前的规定作废，无疑是对工人的一种蓄意挑衅。

乌纳决议同时也是对帝国政府的一次挑战。当时德国由

* 《时代》，1983 年 11 月 25 日。

多党联盟执政，执政党包括社民党、资产阶级党以及倾向雇主集团的自由派德国人民党（DVP），时任帝国总理的古斯塔夫·施特雷瑟曼（Gustav Stresemann）正是人民党的主席。1923年8月13日，在德国工业界的大力相助下，德意志共和国史上第一次成功实现了多党联盟执政，而工业界之所以鼎力相助，其实和自由工会敦促社民党加入有坚实议会基础的内阁的考虑一样：1923年1月，对于法国和比利时占领鲁尔区的行为，德国的反应是消极抵制，雇主们想终止这种抗议行为。虽然从政治上考虑，放弃消极抵制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但在经济上却是不可避免的决策。那些被占领的地区都是富得流油的矿区。当时的德国已深陷通货膨胀，而国家对被占领西部的补贴更是为通胀火上浇油。国家威望正在迅速下滑，德国即将陷入一场混乱。

德国工业界和全德工业联合会认为，参与工时制改革的联盟越大，效果就会好。到了9月26日，莱茵和鲁尔区的消极抵抗果真结束了，大联盟政府也达到了他们的目的——虽然工会和部分雇主并不这样认为，但全德最有势力的大工业主胡戈·施提讷斯（Hugo Stinnes）却对此深信不疑。施提讷斯也在《乌纳协议》上签了字，这份协议其实是对大联盟政府的一种挑战。施提讷斯认为，必须要把社民党排除在外，和社民党针锋相对，目前最严重的内政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要让德国马克真正稳定下来，让经济持续恢复，除了需要多年的时间，更需要大力提高工作时间，每天至少延长两小时，而且要禁止罢工——而社民党不可能赞同这种做法。其实，

大概任何一个议会政府都不可能通过这样的政策。

右翼分子的阴谋

要让德国走向他们希望的方向，势在必行的第一步计划是：解散大联盟政府，重新组建内阁，踢走社民党，让保守的德国民族党成为内阁主要力量。恰好施提讷斯本人是德国人民党人，拥有一个帝国议会的席位。短短几天之内，他和同党就顺利地拉拢了一批重工业界的亲信，开始策划人民党的硬碰硬计划。

77

那年9月底，人民党内部发生的事件不啻于一次对议会制共和国的背叛。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参与者都知道这场惊天阴谋幕后主宰的真正目的。人民党党内唯一达成的共识是要停止和社民党合作，转而寻求与德国民族党的共识。但只有人民党的右翼分子才知道并认可施提讷斯的目的：他并不是想重建一个政党联盟，而是打算全盘更换政府。时任总理的施特雷瑟曼很少参加本党会议，他对右翼势力的阴谋毫不知情，这也并不奇怪，反对派已经不打算拥护他当总理。

从10月2日晚的局势看来，大联盟政府差点儿就逃脱了被颠覆的危险。这次内阁会议上，四位社民党部长表现出了非常积极的妥协态度。他们完全清楚雇主集团延长工时的目的，那就是纠正1918年革命成果，换言之，让德国的社会政治局面回归“一战”前的状态。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因为当时也有来自经济界的声音表示，可以暂时悬置八小时工作制的规定。因为

在通货膨胀时期，德国的出口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后来又失去了这一优势；在货币迅速贬值的几年中，德国经济生产力几乎没有任何增长，此外帝国还得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社民党的内阁部长们才愿意接受对八小时工作制的修改，他们之中也包括财政部长鲁道夫·西尔弗丁，从前的独立社民党领导人之一。而资产阶级党派的一些成员，甚至帝国总理本人都严正保证，绝对不和社民党决裂。这次内阁会议达成了一项似乎能够挽救联盟政府颓势的协议：“我们的人民正在遭受着经济和政治生活上的煎熬，这种困境迫使我们暂时延长原料生产的工作时间，但这种增长幅度仍在工人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1〕

独裁的威胁

然而部长们没有预料到，通过法令暂时取消八小时工作制的做法在社民党的议会党团中引发了严厉的批判。即使左翼自由派德国民主党在最后一分钟提出了一种妥协方案，社民党也完全不打算采纳。这种妥协方案建议，可以颁布一部特别法来管理工时制问题，而处理其他社会政治问题则可依照《授权法》。在工会施加的巨大压力下，社民党党团在10月3日晚对这一方案进行了投票，结果是61票反对，54票赞同。几乎在同时，人民党的党团也作出了一份决议，表示

〔1〕 资料来源于帝国总理府档案馆。

工时制的问题不能脱离《授权法》的框架来处理。

大联盟政府中的社民党和人民党是德国社会中针锋相对的两种利益集团的政治代言人。两个党派都对德国民主党的妥协方案表示拒绝之后，大联盟的失败已成定局。10月3日晚，施特雷瑟曼只得向帝国总统艾伯特递交了辞职申请。 79

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自9月27日开始，整个德国都进入了一种紧急状况。政府的掌控权落到了帝国军事部长盖斯勒手中，而盖斯勒又将这种权力转交给了地方的军事势力。在此前一天，拜仁州擅自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盖斯勒的决策成了帝国政府对拜仁这一行为的回应。由于当时德国争论的焦点是工时制问题，因此拜仁问题暂时被搁置在一边，但这绝不意味着这件事会不了了之。

10月初，政治专制的味道越来越浓。不仅施提纳斯和一部分工业界人士支持实行专制，帝国土地联盟和整个“民族联盟”也对此表示赞同。而拜仁州紧急状况的始作俑者更是打着同样的算盘。军队统帅部部长瑟克特将军，正在等着帝国总统将他任命为临时总理。他也被视为“董事会”中的第一人选，“董事会”的说法是军事部长盖斯勒在9月30日的内阁会议上提出来的，言辞间颇有一些恐吓的意味。

社民党已经意识到了这种“硬性法制改变”的威胁。^{〔2〕}很明显，如果施特雷瑟曼倒台，政变的风险就越紧迫：在此期间，大联盟政府是唯一可行的多数派政府，如果内阁解

〔2〕 资料来源于社会民主档案馆（Archiv der sozialen Demokratie, Bonn, Nachlaß Giebel II/246）。

散，德国就会出现一个政治真空，而这恰恰是专制政权支持者期待的结局。既然意识到了大联盟政府垮台的后果，社民党的领导人就更应该力挽狂澜。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却依然决定走社会福利政策的道路。

10月6日，施特雷瑟曼再度被任命为帝国总理，他也再度主持组建了一个大联盟的议会内阁。此时，德国民族党声
80 明拒绝进入施特雷瑟曼的内阁，而人民党决定不让自己的党派主席倒台。当时，人民党的右翼其实可以唆使党团和社民党决裂。但这样下去就要推翻施特雷瑟曼的政权，而大多数议员不愿意走到这一步。

拜仁的叛逆

10月5日到6日，党派领导们终于在备受争议的工时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八小时工作制原则上被视为正常工时规定，但德国也可以通过工资协定或法律手段提高目前的工作时间。对八小时工作制的肯定也是社民党在战略上的成功。讨论的结果其实和10月2日内阁会议的结论并无不同。这样一来，《授权法》只对其他社会政治问题有效，却不能决定工时制问题。正如社民党主席赫尔曼·缪勒在10月6日的党派大会上所言，这种法律其实是一种“有些专制的手段”；但他也认为，德国只能在合法专制和暴力专制之间作出一个取舍。^[3] 10月13

[3] 资料来源于社会民主档案馆，另引自总理府档案资料。

日，帝国议会颁布了魏玛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授权法。在社民党的坚持下，这部授权法被追加了一个条款，其中规定，如果政府的党派政治局面发生了改变，这部法令就自动失效。

然而，第二届大联盟政府的寿命比第一届更短，仅仅持续三周后就垮台了。它的垮台和第一届不同，起因不再是社会政治纠纷，而是拜仁，更确切地说，是因为帝国政府在处理萨克森州左翼“统一战线政府”和拜仁州“政府专派将军”领导的右翼专政政府的问题上，实行了不平等待遇。

10月20日，拜仁问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天，慕尼黑政府公开宣布不再听命于帝国，并对帝国派驻拜仁的部队进行了“义务收编”。此时的拜仁政府由三人主管：帝国军队派驻拜仁的指挥官卡尔·罗素夫（Lossow）将军以及拜仁警局司令官赛瑟（SeiBer）上校，他们希望借此发出一个“进军柏林”的信号，在蔓延了整个帝国的民族专政呼声中，“进军柏林”被视为胜利的终点。

自10月10日之后，萨克森州组建了一个由社民党和共产党联盟执政的政府，州长是埃里希·蔡格纳（Erich Zeigner），是社民党的左翼分子。六天之后，图林根也成立了一个社民党和共产党的联盟政府。德累斯顿和魏玛的统一战线政府是通过严格的合法途径组建的——通过议会多数票决定制。表面看来，帝国并不能插手这些内阁组建的过程。但所有人都明白共产党加入州政府的目的。虽然帝国政府当时还不知道，德累斯顿和魏玛的共产党员是在莫斯科的直接授

81

意下才接受了部长职位，为的是在 11 月初策划一场武装起义。但此时的柏林已流言满天飞，传说共产党要在秋天发动政变。

在施特雷瑟曼组建的第二届内阁上，所有党派都一致认为要火速把共产党赶出政府。连社民党也认为，在必要情况下可以通过军事手段达到这一目的。但他们希望在此之前还是尽量对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同志们施加影响，争取通过和平的手段解决问题。很显然，这一计划取得了初步成果。社民党的副主席威廉·迪特曼（Wilhelm Dittmann）被社民党派到了德累斯顿，在 10 月 31 日的党团会议上他报告道：蔡格纳
82 州长愿意开除内阁中的共产党员，但直到 10 月 27 日施特雷瑟曼向德累斯顿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蔡格纳立刻辞职，萨克森州的社民党领导人才改变了立场。

社民党的部长们也对施特雷瑟曼的最后通牒表示了赞同，但他们似乎是在施特雷瑟曼的信发出之后，才得知蔡格纳的妥协立场。此时再力挽狂澜已不可能了，10 月 29 日下午，帝国军队浩浩荡荡地来到德累斯顿政府门前，武力逼迫部长们离开办公室，却没能成功。

慕尼黑的政府官员根本不必担心命丧枪下。就像 1920 年的卡普暴动一样，帝国军队拒绝向暴动部队开枪。而且连人民党和天主教中央党都对拜仁的政策抱有好感。在这种情况下，社民党是否还能在帝国中继续执政？

对于这个问题，10 月 31 日，帝国议会中的社民党团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们对联盟政府中的市民党同僚们发出

了最后通牒，并故意开出了对方不可能接受的条件。社民党要求对拜仁进行武力干涉，但遭到了其他党派部长们的断然拒绝。但这些其实都是社民党退出政府的托词。

也有人发言警告社民党不要轻易放弃权力。比如普鲁士内务部长卡尔·瑟威灵（Carl Severing）就指出，如果政党大联盟崩溃，就会引发外政危机：如果右翼民族分子在德国大行其道，那么法国会越发趁火打劫，利用德国分裂主义分子建立一个脱离帝国的莱茵共和国，其后果必然是一场新的战争。然而瑟威灵的话并没有触动社民党的心扉，反倒是帝国总统的话点明了他们的心事。保罗·吕博（Paul Löbe）声称，社民党之所以不愿意再为共和国效力，是因为德国人已不再愿意捍卫这样的国家体制。当下德国的资本、军事和高利贷问题简直和君主时期不相上下。因此，社民党要“重归纯粹的阶级斗争！”〔4〕

83

11月2日，资产阶级党派不出意料地拒绝了社民党的最后通牒，于是，施特雷瑟曼组建的第二政府宣告破裂，内阁分崩离析，到1923年11月23日，社民党拒绝了总理提出的信任案，于是内阁也彻底解散。接任施特雷瑟曼总理职位的是威廉·马科斯（Wilhelm Marx），他组建了一个资产阶级党占多数席位的内阁，1923年12月，在社民党票数的支持下，他通过了一项允许提高延长工作时间的授权法。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转折，是因为帝国总统威胁内阁，如果不这样

〔4〕 资料来源于社会民主档案馆。

做，就要用宪法中的第 48 条紧急法来治理国家。社民党当了整整四年半的在野党，直到 1928 年 5 月他们在大选中获得胜利，此后德国又成立了一个大联盟政府。

魏玛为什么熬过了 1923 年

德国的议会民主制经受住了 1923 年秋的危机考验，事后看来，那几乎是一个奇迹。但如果仔细分析起来，却也能找出很多合理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很简单：这是在德国。德国既没有革命传统，也没有政变传统。而唯一一个有政变能力的人，瑟克特将军，却只愿意在帝国总统的认可下实行专政，他不想和总统为敌。在 1923 年 11 月 9 日晚，也就是希特勒的慕尼黑暴动之后，艾伯特虽然为瑟克特授予了执政权，但这位社民党总统却拒绝了瑟克特对特殊委任权的要求。

第二个原因在于，1923 年 11 月中旬，德国货币终于稳定了下来，这也是大联盟破裂之后才姗姗来迟的成绩。因此，德国也就不再需要采取极端手段来解决危机问题。

84 第三个原因是，德国的外交困境也有所缓解。在 1923 年秋之前，法国一直在催促德国支付战争赔款，理由是法国本身也要支付欠美国的战争借款。此时，美国作了表态，在德国的战争赔款和同盟国内部的债务问题上，美国都愿意加以援助。这对法国的对德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1923 年 11 月，法国总理庞加莱（Poincaré）表示愿意派出一个同盟国专家委员会对德国的经济能力进行审查。这种态度就为后来

1924 年的赔款协议，也就是道威斯计划，以及美国提供的贷款奠定了基础。

1930 年到 1933 年期间，魏玛共和国处于危机的最后阶段，此时德国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德国已失去了忠于议会民主制的总统，失去了稳定的国内经济，也失去了美国的有效援助。而魏玛终于没能挺过这场危机。

十 兴登堡——德国的灾难*

对一个不谙权术者的观察

1871年1月18日，当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的镜厅中举行隆重的新生洗礼仪式时，他也是在场的年轻军官之一，他们一同见证了普鲁士的威廉一世加冕为德皇的过程。当时的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 und Benneckendorf）只有23岁，他于1847年10月2日在波茨南出生，参加了1866年的普奥战争和1870—1871年的德法战争。1878年，他进入了总参谋部工作；1911年兴登堡荣誉退休时，已是德高望重的将军。三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此时66岁的兴登堡又再次出山，率领第八集团军参战，1914年8月底，在坦能堡之战中，他从俄国人手中夺回了东普鲁士，自此一战成名。

* 《柏林报》，1997年10月2日。

自此，德国人开始传颂“兴登堡神话”。虽然在这场战胜俄国人的战场上，另外两位更年轻的将军霍夫曼（Hoffmann）和鲁登道夫（Ludendorff）的功劳不亚于兴登堡，但他们却不具备成为传奇的资质。相形之下，兴登堡外形威严，声音浑厚，全身透着一种令人信赖的气息，更符合传奇的条件。

此后，德国人把“胜利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兴登堡这个名字上，1916年8月底，升任为陆军元帅的兴登堡和埃里希·鲁登道夫共同接管了陆军最高指挥权。鲁登道夫是真正的战争指挥官，另外，将德国所有经济力量都用于战争的计划也是鲁登道夫提出的方案，但这一计划在历史中却被称为“兴登堡计划”。

代位皇帝

86

兴登堡其实是个局外人。他甚至对政治都不是很感兴趣。然而由于德皇威廉二世的威望不佳，战时的兴登堡实际上成了一个“代位皇帝”。即使他缺乏领导魅力，德国军方的宣传人才也会帮他营造出一种——借用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官位魅力”。^{〔1〕}“兴登堡神话”其实是对公众舆论的一种巧妙操纵——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正是“公共关系”领域专业人才设计的一种成功广告策略。

〔1〕 Max Weber,《经济和社会——社会学基本认知》，科隆，1964年，第184页。

德国在军事上的失利并没有让军方宣传人才从此罢手。他们精于将战败的责任推给别人，比如社民党占多数派的帝国议会，比如天主教中央党，或“马克思信徒”等进步分子。兴登堡又一次成为了军方宣传部的喉舌，1919年11月18日，在帝国议会的调查委员会面前，兴登堡声称，某位英国将军（他没有公布该人的名字）说过，德国军队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背后一刀”的说法从此开始口口相传。一夜之间，兴登堡又成为了民族主义在野党用来针对年轻的魏玛共和国的代表人物。

五年半之后，兴登堡生命中最重要时刻降临了。1925年4月26日，在德国人的直接选举中，兴登堡这位坚定的保皇派当选为帝国总统，接替刚刚去世的社民党总统艾伯特。此时的陆军元帅兴登堡已是78岁的古稀老人，共和派的天主教中央党人威廉·马科斯也是竞选者之一，在两人的较量中，兴登堡以微弱优势胜出：马科斯获得了45.3%的选票，兴登堡获得了48.3%。如果共产党员放弃了毫无胜算的竞选者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älmann），如果拜仁的高级天主教人民党不呼吁他们的支持者投票给信奉新教的普鲁士人兴登堡，那么共和派的马科斯或许就能胜出了。兴登堡是保皇派的德国民族主义分子推出的竞选者，但并不是所有选他的人都是保皇派。兴登堡的胜利，一方面要归功于大多数德国人对秩序、权威和“泛党性”的渴望，著名法学家古斯塔夫·拉特布鲁赫（Gustav Radbruch）当时是社民党的帝国司法部长，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泛党性”其实是“极权

德国的弥天大谎”。〔2〕

兴登堡获选相当于魏玛共和国的一次保守重建，它引发了很复杂的后果。一个“代位皇帝”成了国家元首，会让某些保皇分子更容易接受他们并不热衷的共和国政体。在这个意义上，它对魏玛共和国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然而兴登堡的获选对民主制度却产生了一种危险影响。帝国总统并不仅仅是一个重权之位，根据帝国宪法第48条规定，在危机时刻，帝国总统享有近乎独裁的权力。根据紧急法令的规定，总统可以绕过作为立法机构的帝国议会。因此，只有能够影响帝国总统的决定，就等于拥有了政治权力。当时能直接接触兴登堡的人主要有两批，普鲁士骑士贵族和帝国军方人员，兴登堡对他们尤为信任。这些人其实才是1925年帝国总统选举的真正获利者。

如果帝国政府在议会中有多数派的支持，就不会产生启动宪法第48条紧急法令的情况。然而自1929年秋季开始，德国政府遭遇了频繁的危机，越来越多的人因此对艰难的议会妥协程序感到厌烦，希望将议会的权力转交给总统。除了大地主、军方政客，甚至连大工业主都开始呼吁进行一场“平静的”政治转型——从议会民主制转型到总统制。 88

1928年之后，德国又成立了政党大联盟政府，帝国总理是社民党员赫尔曼·缪勒，联盟政府中的右翼势力是倾向雇主集团的德国人民党，自从人民党主席、帝国外交部长施特雷瑟曼在1929年10月3日去世之后，人民党日益倾向走政

〔2〕 Gustav Radbruch,《德国国家法体系中的各政党》，图宾根，1930年，第285—294（289）页。

治转型的路线。1930年3月底，这些“强国”支持者终于如愿以偿：3月27日，在对失业保险问题的争议中，大联盟政府宣告破裂；三天之后，兴登堡任命天主教中央党主席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为新的帝国总理，并公开表示，在必要情况下会为他赋予宪法第48条规定的权力，也就是用“总统制”来取代议会制。

如果社民党愿意多作一些让步，那么议会民主制的沦陷或许能被推迟几个月。然而当时坚决支持议会民主制的人已成为少数派，而总统制却有强大的追随者。兴登堡的小圈子当时被称为“宫廷党”，其中包括国务秘书奥托·麦思纳（Otto Meißner），奥斯卡·冯·兴登堡（Oskar von Hindenburg）——他被戏称为“兴登堡未被宪法承认的儿子”，奥斯卡从前的战友、帝国军方政治领导人库尔特·冯·施莱赫尔（Kurt von Schleicher）将军，这些人正在努力筹备一个不包括社民党的政府，而帝国总统本人也是这一目标的支持者。

社民党退出之后，议会已不可能再形成多数派，因此大联盟破裂之后，德国只能选择另一种执政方式，那就是让帝国部长们听命于总统而不再是议会的旨意。温和的左翼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一结果，而右翼势力却恰恰得偿所愿。

89 德国并没有因此变得获得稳定，反而变得越发极端。帝国议会实际上已被夺权，因此那些极端反议会制的党派——共产党，尤其纳粹党——开始利用这一局面，把自己营造成失权民众的代言者。在1930年9月14日的帝国议会选举中，希特勒的党派获得了胜利，他们的议会席位从12个猛增到

107个。而布吕宁领导的少数派市民党政府之所以能坚持到1932年5月底，只是因为社民党“容忍”了他们。而社民党这么做，也是为了阻止纳粹掌控的帝国政府的右翼发展趋势，而布吕宁的天主教中央党是奥托·布劳恩领导的普鲁士社民党政府的合作党派，因此社民党要保存他们的力量。

小奸小恶

社民党为他们的容忍政策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布吕宁采取了极端严厉的紧急法令措施，导致经济危机越发严重，失业人口不断攀升，而社民党却因此成了众矢之的，并失去了很多选民——尤其是共产党选民。然而除了这种“小恶政策”，德国已没有任何其他现实的解决方案，因为兴登堡的七年任期已在1932年初结束。

如果社民党不和中间派的市民党、温和的右翼势力合作，那么“第三帝国”或许早在1932年4月10日，也就是帝国总统的第二轮选举日，就会宣告诞生了。此时唯一能打击希特勒的人就是现任的帝国总统兴登堡。如果兴登堡能集合魏玛党派和一部分右翼党派的选票，就能把纳粹党首领挤到第二位。因此社民党在大选中提出了口号：“打倒希特勒！要选兴登堡！”^{〔3〕}德国人听从了社民党的呼吁，1932年兴登堡赢得了大选，因为他的选民中还包括七年前的竞争

〔3〕《打倒希特勒！》，载《前进报》，1932年2月27日97号刊（这是社民党董事会的呼声。）

90 对手。反过来，如果多数工人听信了共产党的呼吁投票给台尔曼，那么希特勒或许就成功登上帝国总统的权位了。

兴登堡的胜利要归功于中间势力和温和左派的努力，对于这位老人而言，这却意味着一种痛苦的折磨。他希望重新赢得从前朋友的信任，而这些人却都指责布吕宁过于依赖社民党。军方、地主和民族主义分子纷纷催促兴登堡免去天主教中央党员布吕宁的职位，换一个更具有“民族精神”的总理，这样的总理或许还能获得纳粹分子的支持。兴登堡听从了他们的建议，1932年5月30日强迫布吕宁辞去了总理的职位，并在6月1日任命并不知名的弗朗茨·冯·帕彭(Franz von Papen)——一个非常保守的政客——为继任者，6月4日兴登堡又解散了帝国议会，这届议会的选期其实要到1934年9月才结束，7月20日，兴登堡又取消了布吕宁对纳粹冲锋队和党卫军的禁令。到了1932年7月20日，兴登堡以一种近乎政变的方式解散了奥托·布劳恩领导下名存实亡的普鲁士政府。

1932年夏天，德国从温和的宽容议会制度转向了集权的、完全反议会制的总统制，这种转型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德国几乎爆发内战，而在1932年7月31日的帝国议会选举中，纳粹党成为了最强大的党派，在新议会中，纳粹和共产党加起来占据了无效多数派。这样一来，帝国议会已失去了作为立法机构的权力。兴登堡和他的幕僚们把德国推到了一种法学家称之为“宪法瘫痪”或“宪法危急”的状态中。^{〔4〕}

〔4〕 Johannes Heckel, *Diktatur*, 《特殊预算法背景下的紧急法令权利和宪法紧急状况》，波帕特，1989年，第1卷，第377—386页。

兴登堡看不起希特勒，觉得他是一个“波希米亚暴民”，在初始几个月中，他一直坚定地阻止希特勒夺权。兴登堡甚至愿意为此违背宪法规定，再次解散帝国议会，然后无限期延迟新一轮选举。然而11月6日，也就是第二轮帝国议会选举日，纳粹党失去了两百万选票，共产党则拉来了六十万选票，帝国总统顿时面临着巨大压力。众多保守派政客，如帕彭（1932年12月3日卸去总理职位，接替他的是库尔特·冯·施莱赫尔，但冯·帕彭依然深得兴登堡信任）、大地主和重工业界人士等，纷纷督促兴登堡和希特勒达成“妥协”，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有爆发内战的风险。

1933年1月底，连奥斯卡·冯·兴登堡和国务秘书麦斯纳都对这一路线表示了赞成。在这个紧要关头，恰好施莱赫尔让兴登堡大失所望：当时德国发生了一件“东部援助丑闻”，兴登堡被指责挪用公款援助债台高筑的东普鲁士骑士地主，而新任的总理施莱赫尔竟没有站出来维护他。1933年1月30日，围绕着兴登堡的斗争终于有了结果。这位85岁的老人疲惫地接受了所谓的“妥协”方案：他任命希特勒为“民族集中营内阁”的帝国总理，各部门部长由内阁中占多数派的保守党任命。

迷茫和同谋

直到今天，柏林和德国各地都能看到许多“兴登堡”街道，然而这位政治家的所作所为让他承担了一份极其恐怖的

责任。兴登堡让德国落到了一个充满独裁欲望的政治家手中，而仅仅是在几个月前，也就是1932年11月24日，他自己还公开警告过这一点。兴登堡虽然代表着权力的中心，但他却不能自己决定一切。他身边的“宫廷党”也是权力中心的分子，这个团体主要由旧普鲁士领导阶层组成。如果兴登堡和身边亲信一直坚持阻止希特勒掌权，后者不可能合法上台。然而希特勒还是上了台，因为1933年1月底，兴登堡的亲信们在机会主义的迷茫中，寄望于和希特勒共同“解决危机”，以为这样才能“驯服”纳粹分子，而兴登堡已无力和自己的亲信们对抗。

1934年8月2日，兴登堡在他的东普鲁士领地瑙代克与世长辞，他到死也不知道，自己对希特勒的任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兴登堡是一个不谙权术的人，看不清别人对他的利用。他被精明的军方利用过，被保守派朋友利用过，最后又被希特勒利用了，自1933年1月30日之后，希特勒很快赢得了他的信任。兴登堡是一个神话的名字，但他一直是被神话的对象，而不是神话的主人。他任由一切发生，因此也对世界史上的大灾难负有责任。年轻的兴登堡在1871年见证了德意志帝国的诞生，而他的所作所为却导致了这个帝国的覆灭。

为什么希特勒在 1933 年 1 月 30 日成为帝国总理

德国历史中有一些为数不多的特殊日子，它们既是德国历史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1933 年 1 月 30 日就是这样的日子。希特勒如若不是在这一天被总统兴登堡任命为总理，那么今天的世界将是另一番景象。

在这一天，纳粹元首希特勒登上了权位，关于这一历史事件是否可以避免的讨论已不计其数。借着联邦档案馆创建 50 周年这样一个特殊时机，我想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联邦档案馆存有大量帝国总理府的资料，这些资料中有哪些关于 1933 年 1 月 30 日的历史背景的内容？更确切地说，从这些资料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相关的重要历史人物有多少活动空间和选择可能，并由此判断他们对事态发展

* 在 2002 年 6 月 4 日联邦档案馆成立 50 周年庆典上的报告原文，缩减后发表在 2002 年 6 月 5 日的《法兰克福评论报》上。

担负的责任。从这些问题出发，我想再进一步探讨几个关于历史论断的问题。在我们作出一个历史论断之前，应该首先考虑哪些问题？1933年1月30日是一个既需要历史论断又很难定论的日子。在对它作出一个历史判断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对自己的行为展开思考。

史学界一致认为，早在希特勒上台前的三年，魏玛共和国已开始沦陷：1930年3月27日，魏玛共和国最后一届多数派议会政府——以社民党赫尔曼·缪勒为首的大联盟政府内阁——因在失业保险政策改革的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而宣告破裂。最后一届议会政府倒台之后，德国采用了总统内阁制，这一内阁的性质起先较为隐蔽，后来才坦然公开：天主教中央党员布吕宁组建了一个资产阶级党的少数派政府，自1930年7月开始，该政府根据魏玛共和国宪法第48条规定以总统发布紧急命令的方式执政。

1928年5月选出的帝国议会因为要求废除紧急令的前两条，遭到了总统的解散。而在1930年9月14日举行的新一轮选举中，纳粹党成为了第二大党，因此布吕宁只能在第一大党——社民党的容忍之下执政。社会民主党之所以会容忍布吕宁，一方面是为了阻止帝国内部右倾势力的进一步扩张，同时也为了在普鲁士邦范围内保持自己的势力。由社民党人奥托·布劳恩领导的普鲁士政府是一个魏玛政党联盟内阁，该内阁中除了社民党和布吕宁的天主教中央党之外，还包括自由国家党，也就是之前的德国民主党。因此，如果社民党推翻布吕宁政府，中央党必然会立刻推倒普鲁士邦总理

布劳恩。

1932年春，在社民党、中央党、其他中间派资产阶级、温和的右翼势力的支持下，兴登堡再度当选为总统，这也要归功于社会民主党的“容忍”政策。如果社民党和中央党没有联手合作，那么兴登堡最危险的对手希特勒将在这次总统大选中胜出。这样一来，“第三帝国”的诞生日将不是1933年1月30日，而是1932年4月10日，即总统大选第二轮选举日。

七周以后，即1932年5月30日，兴登堡免去了布吕宁的总理职务。帝国总理府的档案资料也证实了一个当时德国人已知晓的事实：中央党人布吕宁下台的关键原因是，他推行的所谓“农业布尔什维克政策”遭到了大地主和德国民族分子的抵制，更确切地说，这些都发生在布吕宁下台的时刻。此外，当时的国防部长施莱赫尔在幕后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对于这一点公众的了解比较有限。从档案的记录来看，政治更迭的幕后推手们早已算计好一切：新成立政府的首脑是一位不知名的中央党右翼人士，弗朗茨·冯·帕彭，他无须依赖社民党的容忍政策，而是与日益强大的纳粹党合作。为了迎合纳粹党，兴登堡不但废除了自己曾在4月发布的针对党卫军和冲锋队的禁令，还解散了议会并定于1932年7月31日进行新一轮选举。议会的解散是在1932年6月4日——恰好是七十年之前的今天。

布吕宁的免职是德国国家危机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如果布吕宁能够继续留任，如果议会能坚持到任期结束的1934

95

年，那么新一轮的议会选举将在截然不同的经济和政治背景下进行：经济复苏之后，失业人数减少，激进政党的吸引力也会因此下降。布吕宁被免职，帕彭接任其职位，意味着德国从温和宽容的议会制度走向了独裁的、公开反对议会制度的总统制。可以想象，1932年7月31日议会选举的结果必然是纳粹党和共产党获得大量选票，其他政党大败。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新选出的帝国议会中，纳粹党和共产党构成了无效多数派。虽然两个天主教党派（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极力谋求建立一个“棕黑联盟政府”——即纳粹党、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共同联盟执政，但这一提案却遭到了希特勒的反对，如此一来，作为立法机关的议会
96 已名存实亡。议会也不再具有建设性的作用，因为多数选民选择了那些意图废除民主制的政党。

根据记录的资料，在1932年8月10日的内阁——社民党杂志《前进报》戏称其为“男爵内阁”——会议中，与会者在选举结果的问题上产生了很大争议。^{〔1〕}司法部长居尔特纳（Gürtner）和财政部长施威林·冯·克罗斯克伯爵（Graf Schwerin von Krosigk）支持纳粹党加入政府，冯·克罗斯克的理由是，将“盗猎者”变成“守林人”是避免内战的最佳办法。而反对纳粹执政的最坚决的声音来自内政部长盖伊尔（Gayl），他甚至打算和纳粹党来一场“殊死搏斗”。盖伊尔主张进行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并公开提议了一个

〔1〕 男爵内阁：《晚报》，即《前进报》的晚报，第254号，1932年6月1日。

违背宪法规定的方案：推迟新一轮的选举，并强制推行新的选举法。^{〔2〕}

此时此刻，兴登堡是拥有最终决定权的人，他也极力反对希特勒成为国家总理。1932年8月13日，兴登堡在和纳粹党首领会谈后作了一个官方表态，表示“考虑到自己的良心和对祖国的义务，很难担起这个责任，将所有政府权力转交给一意孤行的纳粹党。”^{〔3〕}1930年8月30日，总理帕彭、内政部长盖伊尔和国防部长冯·施莱赫尔来到了兴登堡的东普鲁士领地瑙代克和总统进行会谈，之后兴登堡宣布将再次解散议会，但新一轮的选举不会在宪法规定的60天期限内举行，而要等到国内政局稳定之后。^{〔4〕}

政府违背宪法规定推迟新一轮的选举，在魏玛共和国的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总理府的档案也证实，早在1932年12月2日，即艾伯特任总统时期，帝国内阁已考虑过这种解决危机的方案，当时的总统办公室主任、国务秘书麦斯纳（1932年仍任职）就打算采用宪法第48条规定。^{〔5〕}但无论是在1923年还是在1932年，他们都没有违背与此相关的宪法第25条规定。1932年9月12日，帝国总统再次解散了议会。同年9月20日，总统签署了一项命令，将新一轮议会选举定于1932年11月6日，这是宪法规定的60天期限

97

〔2〕 资料来源于帝国总理府档案馆。

〔3〕 Walter Hubatsch,《兴登堡和国家——1878—1945年的文件研究》，柏林，1966年，第335—338页。

〔4〕 资料来源于帕彭内阁（见注2），第1卷，第474—479页。

〔5〕 资料来源于帝国总理府档案馆。

内最晚的时间。由于帕彭本人的失误，9月20日议会通过了对总理的不信任案，此时帕彭的威望已落到谷底，他根本不敢推行明显反宪法的政策。

1932年11月6日，议会选举的结果使希特勒的对手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这是自1930年以来希特勒第一次在选举中失利。与7月选举的结果相比，希特勒失去了两百多万张选票，而德国共产党的选票却多出了六十万张，并奇迹般地获得了100个议会席位。然而纳粹党的失利和共产党的胜利却恰恰为希特勒创造了上台的机遇。在此之后，德国人对内乱的恐惧成为了希特勒的最大优势。议会第二次解散、冬天的选举、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这一局面在大多数政客和观察者眼中不啻于洪水猛兽。同时，共产党只需再拉来一些选票就可以超过社民党，一跃成为第一大党。如果局势这样发展下去，将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和大范围的国内革命。

98 1932年12月3日，帕彭被国防部长库尔特·冯·施莱赫尔免职，当年任命他为政府首脑的人也是施莱赫尔。施莱赫尔喜欢自诩为“社会将军”，12月中旬他向德国国防军的高层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应该争取与纳粹党的帝国集团领袖格雷戈尔·斯特拉瑟（Gregor Strasser）手下的纳粹进行合作，并且要得到希特勒的“弥赛亚式祝福”。如果这种合作失败，战争将不可避免，议会以及普鲁士邦议会也会被解散。〔6〕

〔6〕 Thilo Vogelsang, 《1930—1933 帝国军事史的信材料》，载《时代史季度观》，第397—436页。

施莱赫尔的努力失败了，因为1933年1月4日，希特勒在科隆银行家冯·施罗德（von Schröder）的家中与前总理帕彭进行了一次谈话，并找到了一种更有吸引力的夺权途径：通过帕彭接近兴登堡。1933年1月16日，帝国内阁又重新启用了1932年8月的国家紧急状态方案：解散议会，并将新一轮的议会选举定于1933年秋，这一时间远在宪法规定的60天期限之外。和上一次不同的是，兴登堡没有参与这一决定。1月23日，总统拒绝推迟议会选举，并表示在解散议会的问题上保留自己的决定。五天之后，也就是1月28日，他明确地驳回了施莱赫尔的解散指令。施莱赫尔继而请求辞职，这一请求立刻得到了兴登堡的同意。

在总理府中魏玛共和国档案的最后一卷，也就是关于施莱赫尔内阁的一卷中，有当时的财政部长冯·克罗斯克日记副本的抄件，其中提到了兴登堡和施莱赫尔的决裂。冯·克罗斯克认为这是因为总统怨恨施莱赫尔强行从他身边赶走了帕彭。日记还提到，施莱赫尔当时希望得到中央党和工会的支持，却未能如愿，其中还写道，“来自德国民族分子和农业界的挑战非常强烈”——这令人不由想起1932年春这些社会势力对布吕宁发起的攻击。

最后，冯·克罗斯克还提到了一个原因，这个原因也涉及农业界以及总统本人：兴登堡之所以愤怒，还因为公众谴责他在东部援助丑闻中扮演的角色时——即他挪用国家财产援助易北河东的负债贵族一事，以及瑙代克地产继承问题——内阁并没有向他伸出援手。瑙代克地产是在1927年兴登堡80岁生日

时，德国经济界赠予他的礼物。为了避免高额的遗产继承税，他把瑙代克地产直接归入了儿子奥斯卡的名下。财政部长冯·克罗斯克最后总结道：“或许是当时种种客观以及私人因素加在一起，致使总统在最后的日子里中受到非常片面的影响，并决定了他对施莱赫尔内阁的态度。”〔7〕

“种种客观以及私人因素加在一起”：1933年1月28日，施莱赫尔被免职，两天之后希特勒上台，虽然这一切看起来似乎出自主观且无聊的理由。但仔细思索之后，这一结果又与当时的社会关系，也就是社会结构密切相关。易北河东部的骑士贵族虽然当时在经济上早已衰败，但是由于他们和国家的权力核心兴登堡有密切往来，因此依然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他们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在经济上更强势的大工业界。在大工业界，特别是在莱茵威斯特法伦的重工业区的右翼势力中，也有人支持帕彭—希特勒，甚至希特勒—帕彭“两头执政”的方案。这些人若想对兴登堡施加影响，还需要一个中间人。在1933年1月，这个中间人就是帕彭。而工业界的领头势力自然希望尽力保住施莱赫尔在总理府的位置。联邦档案馆存有他们在1933年1月底呈交的报告，里面的内容也证实了这一点。〔8〕

100 然而，在当时的工业领头势力以及各行业工会看来，最可怕的事情并不是希特勒担任总理，而是帕彭或德国民族党领袖阿尔弗雷德·胡根贝尔格（Alfred Hugenberg）（虽然可

〔7〕 资料来源于帝国总理档案馆。

〔8〕 同上，第313页。

能性低一些) 组建起一个反动的好战内阁。这样的政府会完全丧失民众的支持, 因此有很多人担心, 帕彭的任命会导致一场政变, 甚至可能引发内战。相形之下, 希特勒虽然在 11 月的选举中失去了很多选票, 但仍然是遥遥领先的第一大党的首领。他拥有群众基础, 如果能够合法地获得权力, 那么宪法遭到破坏和爆发内战的风险会相对小一些。资产阶级的中间党派和中央党也持有同样意见。社民党 1 月 28 日晚的《前进报》就表达了这种对局势的判断。〔9〕

如果有人要追问希特勒上台的深层原因, 就不能仅仅把目光放在 1932—1933 年的档案中。档案资料是研究的出发点, 也是我们经常回溯的原点。如果我们要对历史作出评判或者是理性思考的话, 就得运用档案资料, 它是研究无可替代的基础。然而我们还要将档案提供的资料放到更广泛的历史背景中, 但这种背景并不一定存在于档案中。有些历史背景只能是一种推测, 我们要意识到它是一种推测, 这样才不会轻率地将它归结到其他经过证实的历史背景中。

就希特勒上台这个问题而言, 一个经过证实的历史背景是德国人对合法性的信仰。社民党法学家恩斯特·弗兰克尔 (Ernst Fraenkel) 于 1932 年 12 月在杂志《社会》(Die Gesellschaft) (鲁道夫·西尔弗丁主编) 上故意挑衅地将这种信仰称为“宪法拜物教”。他针对的其实是很多社民党人的一种倾向: 与宪法被彻底废除的担忧相比, 这些人更担心宪法第

〔9〕 施莱赫尔辞职, 登载于《前进报》, 1933 年 1 月 28 日 40 号刊。

25 条被破坏，也就是规定新一轮议会选举期限的条款。^[10]

101 德国人对合法性的信仰是否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呢？“一战”结束后，马克斯·韦伯将这种信仰称为“目前最常见的合法形式”。^[11] 这种信仰之所以对德国影响深刻，主要源于德国人对内战的深切恐惧。我猜想，这种恐惧有一个最深远的渊源，那就是很久之前的一场漫长恐怖的战争带给德国的创伤——三十年战争，这场战争几乎可以被视为德国历史的灾难之源。我们也可以将它表达为这样一种观点：经历了 1618 年至 1648 年的战争之后，对一切现有秩序的破坏的恐惧，对混乱、盲目暴力以及内战的惧怕已深深地植根在德国人的潜意识中。

在此，我们还要考虑到另外两个导致德国 30 年代初期陷入危机的原因，这样我们的考察会有更坚实的基础。一方面，我们要强调前工业时代的权力精英——易北河东的骑士贵族——的政治影响力：这是当时的社会历史现实，它的存在与俾斯麦和威廉皇帝时代实行的粮食税密不可分。

另一方面，“民众的支持”也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这一因素也可以追溯到俾斯麦时代。自 1871 年德意志帝国创立起（若以北德意志联邦为起点，那就是自 1867 年起），德国的男性公民已获得了普遍平等的议会选举权，也就相应拥有了依法参政的权利。然而，一直到 1918 年 10 月，也就

[10] Ernst Fraenkel, 《宪法改革和社会民主》，载《社会》9（1932 II），第 484—500（491）页。

[11] Max Weber, 《经济和社会》，科隆，1964 年，第 27 页。

是“一战”结束以后，他们才第一次了解议会责任制政府。军事上的失败与政治的议会化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了魏玛在民主合法性上的弱势。很多人认为这是战胜国的国家体制，因此并不属于德国。

1930年，议会制被总统制所取代，大大鼓舞了议会之外的势力。希特勒之所以能成功获选，首先要归功于他的政治手腕，他一方面迎合了广大民众对议会民主制的仇恨，而这种议会民主制当时确已失败；另一方面，他也迎合了民众对参政权的要求，因为当时的总统内阁剥夺了这种权利的政治效力。因此，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并不是偶然事件，也不是意外事故，而是有其历史原因，正是这些历史原因放弃了其他可能，选择了他来解决危机。

102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位纳粹党元首成为国家总理是历史的必然。1932年5月，布吕宁的免职极大激化了德国的危机局势，这并不是“必然”，而是军方和大地主阶层采取不计后果的利益政治的结果。在1933年1月，德国还不需要通过推迟议会选举来阻止希特勒上台。总统兴登堡当时坚决拒绝希特勒进入总理府，他不应该理会针对其任命的总理冯·施莱赫尔的不信任案，这一不信任案虽在意料之中，但并没有什么影响；兴登堡本应让施莱赫尔留在总理府主持大局，早在1932年底、1933年初时，一些知识分子就主张走这条道路，但兴登堡和施莱赫尔都没有听从这一建议——或许因为他们两人都是军人，却在一个无能的议会中碰了壁，因此两人不由都有些小题大做。

或者，兴登堡也可以让一个“非政治的”、不走极端路线的人来接任施莱赫尔，这样至少赢得了时间。但是，这位高龄总统这次打算走右派路线，他听从了帕彭和其他顾问的建议，认定希特勒担当保守势力为主的内阁总理是最安全的人选。

103 人们或许会争论这个问题：1932年，当多数德国人投票支持那些企图废除民主制的党派时，他们是否已在政治上遭遇了“完败”。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原本能阻止希特勒掌权的人确实完败了。因为在最关键的时候，他们发挥了自己的影响力，将希特勒送上了权位。“完败”是一种价值判断，在此我将转到下一个问题，探讨历史学家们作出这种判断的凭据。

约翰·古斯塔夫·德罗森（Johann Gustav Droysen）在他的《史学》（*Historik*）（根据他在19世纪50年代的讲稿整理而成）一书中总结了历史解读的四种形式：第一，实用主义解读，强调因果联系；第二，客观历史条件的解读，强调行为者所处的客观条件；第三，心理解读，追问历史人物的主观动机；第四，“根据伦理力量和理念作出的解读”。

我们之前探讨的正是这几个层面：希特勒上台这一历史事件发生的因果关联；当时的政坛活动家们考虑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而正是这些条件决定了他们的行为空间；他们的动机，以及衡量他们行为的标准。

最后一点是最困难的。黑格尔派学者德罗森认为，道德理念的变化和成长正是历史的运动和生命所在。他把它看成是一个静态的过程，称其为“囊括一切的伦理地平线，它包含了一个民族在某一历史时段发生的一切，也包含了这一民

族、这个时代中每一个细小进程的测量标准”。然后他又谈及“前进运动的时刻”，认为这些时刻影响着“它们引领的方向和导致的结果。这样我们才可以理解，当时的历史运动，当时人的追求和奋斗，他们的斗争、胜利以及失败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12]

带着这样的思考来回顾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的德国，我们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很明显，希特勒的上台并没有违背那些身居要职并促成此事的人的价值观。那些试图保全民主、阻止希特勒上台的人自然持有不同的价值观。当然，那些企图通过革命铲除魏玛政权、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的人肯定也有另一种价值观。可见在那些彼此竞争的党派之间，并没有建立在人权和公民权这种基本共识上的共同价值观。 104

如果他们真的有一种共同价值观，那么“当时人的追求和奋斗”、“他们的斗争”最终也不会走向那条如此远离“伦理地平线”的道路。

在考察魏玛共和国的覆灭以及希特勒上台问题时，如果一个历史学家以人权和公民权的“伦理地平线”作为自己的考察视角，也并不意味着他违背了历史规律。因为这种“伦理地平线”既是魏玛宪法中最核心的内容，也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价值法律传统，它也是德国和西方世界之间的联结纽带。如果我们不用这样的标准来评判 1933 年 1 月 30 日这一历史时刻，那么我们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12] Johann Gustav Droysen, 《史学》, Darmstadt, 1960 年, 第 149—187 页。

十二 沦陷之后的逆转*

1945年是德国历史的关键转折点

阿道夫·希特勒的预言至少对了一次。1939年9月1日，也就是希特勒发动战争的第一天，这位“元首兼帝国总理”在议会上宣称：“德国历史上再也不会出现第二个1918年11月。”^{〔1〕}

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的“国内前线”却一片平静，这与“一战”时期的情形截然不同。德国国内没有罢工，没有兵变，更没有发生革命，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当时无处不在的恐怖统治，更重要的是德国对被占领地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掠夺，这使得德国避免了类似1916年、1917年间的蔬菜大饥荒事件。另一个原因是，德国还对几百万的外国强制劳工、战俘以及集中营俘虏进行了残酷的奴役。“二

* 《明镜》，2005年1月31日。

〔1〕 帝国议会讨论速记文件，第460卷，第48页。

战”期间对外国劳工的强迫奴役使得德国工人在“二战”期间免于遭受“一战”时期的严重剥削，他们难免会因此产生一种优越感，事实上大多数人的确有这种感觉。因此“第三帝国”根本不用担心自己会重蹈德意志帝国的覆辙——在战乱末期被工人和士兵的革命夺走政权。

1918年11月，德国经历了一场政权变革，共和国取代了君主政体。德国虽然在1919年因《凡尔赛和约》损失了七分之一的领土，但国家幸得保存。“一战”后的德国并没有与德意志帝国进行社会和道德上的决裂。军方高层、政界高官、大企业主和易北河东的大地主们依然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从1918年10月起，德国开始实行议会民主制，对于很多人而言这是战胜国的政体，因而不属于德国。德国的右翼势力将军事上的失败归咎于左派阴险的卖国行为，归咎于他们对德国“战无不胜”的军队刺了“背后一刀”。德国没有反思自己在1914年战争中应承担的责任。这种观点使得针对“凡尔赛不平等和约”的抗争变得顺理成章：如果说魏玛共和国时期所有德国人都持有一种共识，那就是他们都深信，德国在外交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废除1919年建立的和平秩序。

106

经历了“二战”之后，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战胜国把持着占领地以及四个分管辖区的最高权力。幸存的纳粹首领们受到了协约国的审判，同时被审判的还有牵连最深的军界、外交和经济界高层。这之后的好多年中，德国都没有自己的军队。和“一战”后不同的是，1945年之后德国既没有

出现战争无罪说，也再没有“背后一刀”的传言。纳粹德国必须对“二战”负责，只有极少数冥顽不灵的人才会质疑这种说法。

对于德国历史而言，1945年不仅仅是其众多转折点中的一个，更是整个德国史的转折点，它曾经几乎标志着德国民族史的终结。1945年5月底，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几周之后，德国流亡人士中的重量级人物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发表了一番题为“德国与德国人”的演讲，讨论了德国灾难的深层原因。他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德国从未经历过一场革命，也从未学习过如何将民族和自由两个概念糅为一体”。

107 托马斯·曼认为，即便是“德国人最有名的特性”，也就是“内向性”，对他们而言也是祸大于福。曼认为“内向性”的一种表现即德国浪漫派。浪漫派为欧洲赋予了深刻而新鲜的活力，而德国人却因为浪漫派“变成了一个抵制革命的浪漫民族，他们反对哲学的唯理智论和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曼因此得出结论，“并不存在一善一恶两个德国，德国只有一个，它的善良一面却因为魔鬼的诡计变得邪恶。所谓邪恶的德国，实是迷途中的善良德国，是沉沦在不幸、罪孽和毁灭之中的善良德国。”〔2〕

托马斯·曼传递给听众的观点未必经得住百分百的推敲，也并不是百分百原创。然而在《德国的一番自我批评》

〔2〕 Thomas Mann, 《德国与德国人》，全集第2卷，法兰克福，1990年，第1126—1148页。

(*Stück deutscher Selbstkritik*) 一文中，他还是触及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德国历史的基本矛盾。德国属于古老西方文化和社会的一部分，却走上了一条与西方邻国截然不同的政治发展之路。和英国、法国相比，德国很晚才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而实行民主制的时间更晚。

直到 1871 年，俾斯麦才将德意志帝国建成了一个民族国家，世人将其称为一次“自上而下革命”的成果。1871 年是普鲁士对 1848 年失败革命的回应。俾斯麦来自普鲁士勃兰登堡省的古老贵族家族，他实现了 1848 年革命两个目标之一，也就是统一问题。另一个自由问题，他却没有解决，也无力解决。德国实行议会责任制政体完全违背了古老普鲁士的利益，违背了普鲁士王朝、拥有封地的贵族、军官以及官僚阶层的利益，当然也违背了其他联邦州如巴伐利亚、符腾堡以及萨克森的利益。

1918 年，德国希望通过温和的方式赢得和平，因此采用了西方的议会多数制政体，当时托马斯·曼还在他的《一个
108
不问政事者的观察》(*Betrachtungen eines Unpolitischen*) 一文中捍卫过德国的集权专制体系，他针对的是西方民主制的政治理念。曼坚信，德国“文化”的亮点和它超越西方“文明”之处在于，它拥有一个不依赖于多数派意志的强大国家，能够为国民提供足够的保护。^[3]

魏玛共和国建立之后，曼全盘修改了自己的观点：他摇

[3] 《德国与德国人》，第 12 卷，第 1—589 页。

身变成了议会民主制的说客。然而在拥有大量知识分子的德国，多数人反对新的秩序，对“西方”也持保留意见。德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主制是一场败战的结果，这个负担是魏玛共和国失败的关键原因之一。

这场败战还造就了一个人，那就是在魏玛国家危机中以胜利者姿态登台的阿道夫·希特勒。败战带给德国人的创伤为希特勒上台创造了条件。当时有很多人都在推波助澜，煽动德国人对1918年“体制”的普遍仇恨情绪，希特勒却技高一筹。和那些身居要职的资产阶级右翼高官不同，这位纳粹党领袖懂得拉拢民众。1930年，魏玛共和国的议会民主制崩溃，被半独裁的总统制所取代，此时支持纳粹党的选票一路飙升。

109 德国很晚才开始实行议会民主制，这种民主制在魏玛共和国从一开始便运作不良，但早在俾斯麦时代，德国人就享有了普遍平等的议会选举权。到了共和国晚期，在总统制之下，议会作为一个立法机关，其权力甚至还不如帝制时期：普遍选举权在很大程度上已名存实亡。这也是希特勒的机会：他把自己伪装成一个维权者，代言被剥夺权利的德国人，他向人们承诺，“第三帝国”将不同于德国迄今为止的一切政权，它是最亲近民众的。

1931年7月31日，纳粹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了37.4%的选票，这是他们有史以来最好的选举成绩。但很快他们就遭到一记重创：在1932年11月6日的第二次议会大选中，纳粹党只获得了33.1%的选票。与前一年7月相比，少了两百多

万张选票。当时很多国内外的观察家认为，希特勒在政治上已经“完蛋”。可惜他们低估了希特勒的机遇，那就是德国人对内战和红色革命的恐惧。德国共产党在11月6日获得的选票比前一次多了六十万张，赢得了神奇的100个议席，以16.9%的席位数，他们仅仅落后社民党3.5个百分点。

选举结果令人无比震惊，因此1932年11月之后，与高龄总统来往密切的保守派政客、重工业领域以及普鲁士贵族都强烈要求希特勒参政。他们认为，保守派占多数的内阁可以牵制住希特勒，即使他当了总理也不会有什么威胁，反而会在“民族”精英和“民族”大众之间建起一座桥梁。他们既然这样认为，兴登堡即使很不情愿，最后也只得同意。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振兴民族”政府的首脑，在这届政府中，保守派官员的数量远远超过了纳粹党。

希特勒上台并不是魏玛共和国历史的必然。兴登堡在1932年6月解散了1930年9月选举产生的议会，极大激化了国家危机，但这个决定并不是别人逼迫他作出的。如果新一轮的议会选举是在1934年9月举行，也就是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当时的经济或许已经复苏，政治局势也得到了缓和。

1932年7月31日议会选举之后，纳粹党和共产党不出意料地获得了多数议席，此时兴登堡仍有机会既不违背宪法又能阻止希特勒当选总理。他可以把帝国议会以无效多数派通过不信任案的总理留在任上，主持政府事务。

因此1933年1月30日的事件并非是一次“意外事故”。易北河东的贵族和军方组成的保守势力对总统有着很

大的影响力，他们其实才是魏玛共和国晚期的权力核心，这种现象在德国历史中有其渊源，普鲁士式古老集权国家依然活在兴登堡及其盟友的心中。也正是这个群体在1932年和1933年间将德国引向了灾难之路。

有一个流传很久、到今天还能时常听到的托词：希特勒在大选中从未获得过德国民众的多数选票。事实是，在1933年3月5日的议会大选中，德国人完全有机会把他选下去。纳粹党当时获得了43.9%的选票，与其联合的政党联盟“黑一白一红阵线”则获得了8%的选票。这样他们就以总共51.9%的选票占据了多数，使希特勒成为政府首领。

阿道夫·希特勒的个人声望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一路飙升，远远超过了他领导的党派。德国人之所以如此拥戴希特勒，一方面是因为他在短短几年中解决了失业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军工企业的高速发展；另一个原因是，“二战”之前，德国还取得了两个外交上的成功：1936年和平收复解除了武装的莱茵地区，1938年与奥地利“合并”。

111 在当时大多数德国人心中，纳粹党对犹太人的敌意虽然过分，从根本上来说也不是毫无道理。他们看不惯的只是纳粹对犹太人实施的残忍暴力。但很少有人对“依法”剥夺犹太人的权利而感到愤慨，也没有人在侵占被驱逐犹太人的财产时有半点犹豫。1933年至1939年间的“雅利安化”是一场巨大的、将犹太人财产强行转移给非犹太德国人的运动，德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彻底的一次财产再分配，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日。从1941年起，德国人已得知了对欧洲

犹太人的大屠杀行为，甚至知道了政府未公布的一些事实。然而“知晓”也包括“对知晓的欲望”，而在涉及大屠杀问题时，第三帝国的德国人却缺乏这种欲望。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突袭波兰挑起战争，这场战争在初始时期并没有得到德国人的支持，然而待到德国初战告捷，尤其在1940年夏战胜了法国之后，情况开始改观。巴黎沦陷之后，德国似乎在苦等了22年之后终于赢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40年7月9日，士瓦本政府首脑在报告中写道：“今天，善良的民族同胞们彻底、愉快、感恩地理解了领袖及其事业的伟大之处。”〔4〕

德国知识分子的热情也不亚于无名的“民族同胞们”。1862年出生的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一度对希特勒和纳粹主义持一种冷静、否定的态度。然而在1940年7月4日的一封信给同事的信中他却也写道：“我的心中也充盈着对军队的喜悦、赞美和骄傲。竟然收复了斯特拉斯堡！怎能不为之欢欣雀跃！”〔5〕

若是没有学术界精英们的强烈支持，希特勒很难执掌权力达十二年之久。“元首”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坚固桥梁正是一种“帝国”神话。没有人能像希特勒这样巧妙地利用这个神话；也没有人能像这些学富五车的学者，对这个神话寄予如此深刻的热情。

〔4〕 Ian Kershaw,《希特勒神话——第三帝国的民众意见和宣传》，斯图加特，1980年，第137页。

〔5〕 Friedrich Meinecke, 作品集第6卷：精选信件。斯图加特，1962年，第364页。

1806年，迫于拿破仑的压力，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宣告解散，当时的德意志并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很长时间以来，这个帝国一直将自己视为西方基督教信仰的保护伞，因此其性质是跨民族的。

神圣罗马帝国的理念是“大德意志帝国”，其领土中也包括奥地利，直到1871年普鲁士人俾斯麦将奥地利划出了“小德意志帝国”。因此在“一战”之后，德国人对“大德意志”观投注了前所未有的期望，而随着哈布斯堡帝国的覆灭，奥地利人和“帝国德意志人”的合并之路上的最大障碍也已扫除。

然而帝国的意识形态中还包括其他的层面：德意志帝国希望成为“欧洲秩序”的决定者。这是纳粹党1941年党纲的主题，同时也是那些信仰希特勒的知识分子的信条。^[6]有些人甚至仍抱着中世纪的观念，认为德意志帝国肩负着消灭反基督教政权的使命，因此纳粹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敌意也带上了基督教神圣使命的光环。希特勒生于这种扭曲的德意志教育中，并将这种扭曲性带进了政治中，这一特性也体现在很多德国很多知识分子身上——尤其在年轻知识分子身上，相形之下，那些年岁较长的知识分子出生在“一战”之前，很难克服自己对“暴发户”的成见。

希特勒和那些自诩代表着德国精神的年轻人之间存在着一种亲和力。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也没有影响这种亲和

[6] Karl Richard Ganzer, 《作为欧洲强国的帝国》，汉堡，1941年。

力，而当希特勒自认为即将赢得对“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最后一战时，这种亲和力更是前所未有的高涨。

1943年1月，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失败给了这位独裁者一记重创。很多德国人逐渐开始怀疑“最终胜利”一说。1944年7月22日晚的消息称，希特勒在一次暗杀行动中只受了轻伤，这使德国人对希特勒的同情再次抵达了大德意志帝国的顶峰。纽伦堡高级法院院长认为，当时甚至那些非纳粹党员的德国人也相信，“只有元首才能控制局势，如果他去世了，德国必将陷入混乱和内战。”〔7〕

九个月之后，也就是1945年春，很多人都改变了想法。纳粹保安部的工作人员记录了一种当时已普遍存在的观点：“元首是上帝派来的，但他的任务不是拯救德国，而是毁灭德国。上帝的旨意是要灭亡德意志民族，而希特勒正是上帝意愿的执行者。”〔8〕

1945年5月8日，“第三帝国”覆灭，同时覆灭的还有俾斯麦建于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托马斯·曼称其为“普鲁士民族不神圣的德意志帝国”，并称它永远只是一个“战争帝国”。盟军管制委员会于1945年2月25日发布了第46号法案之后，生活在希特勒统治阴影下的普鲁士也随之灭亡，解散普鲁士的理由是“它一直是德国军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载体”，事实上也早已不复存在。〔9〕

〔7〕 Kershaw,《希特勒神话》(见注4),第187—188页。

〔8〕 同上书,第193页。

〔9〕 Ingo von Münch (主编),《有关分裂德国的文件》,斯图加特,1976年,第54页。

这是一种推卸责任的片面观点，因为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另一个”普鲁士：启蒙时期的普鲁士，施泰恩—哈登贝格改革时期的普鲁士，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普鲁士以及1944年7月20日的普鲁士。但是奥地利人希特勒利用了普鲁士这个神话，利用了人们对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崇拜，利用了普鲁士人恭顺尽职的美德来统治德国，并将其引向战争。到“二战”结束时，普鲁士神话已被掏空，一同被掏空的还有更古老的帝国神话——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覆灭后，帝国神话仍存活了一百三十九年。

114 1945年，希特勒统治时期的帝国领土损失惨重，只剩下奥德—尼斯河西部。东普鲁士、后波莫瑞（Hinterpommern）、勃兰登堡省东和石勒苏益格被波兰管辖，柯尼斯堡附近的区域则划给了苏联管理，这不仅仅意味着德国损失了1937年国家领土的四分之一，超过七百万人口被迫迁移。东部领土的损失再加上苏占区内实施的“土地改革”也构成了一次重大的社会历史转折：易北河东部的骑士贵族从此消失。这支一度叱咤风云、象征着古老集权德国的独特势力就这样彻底烟消云散。

除东荷尔施泰和温特兰特以外，三个西占区在历史中没有出现过骑士贵族阶层。与魏玛共和国不同，联邦德国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亲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1945年的文化断裂。

“第三帝国”覆灭之后，德国并没有进入“零点时刻”，但这个概念却精确表达了当时很多人的感受。1945年春，国家的未来如此不可预测，混乱如此无所不在，这在德国历史

上还是第一次。和西占区相比，苏占区的德国人，特别是女性，遭受了更为残忍的暴力折磨。德国投降后的几周内，所有德国人的共同感受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在各个占领区内，“崩溃的社会”都处于流离失所的境地：百万被战争剥夺家园的人、强迫劳工和大屠杀的幸存者都在寻找安身之处；饥肠辘辘的城市居民涌进农村，通过交换物品来获取生活必需品；曾经衣食无忧的人们如今没有薪金、养老金，更没有固定的收入，有时还得去做一些低级体力活；废墟上的妇女成为了这种社会角色大换血的代表形象。

115

在轰炸、驱逐和崩溃之中，德国社会的动荡远远超过了希特勒统治前十年时期。社会动荡也引发了价值观的剧变：饥饿、流离失所、生死线上的挣扎动摇了传统的道德观念。当一些教会信徒开始抢夺别人财物时，甚至连科隆主教约瑟夫·弗林斯（Joseph Frings）也对此表示理解（因此当时民间将强占他人财产的行为称为弗林斯式占有）。

亲历过那个时代的德国人刻骨铭心地记得那种茫然无助的感觉。但在1945年，一切变化都是瞬息即逝。崩溃的社会处于一种紧急状态中，它没有秩序，却充满了对任何一种正常状态的深刻渴盼。1948年6月，随着西占区的货币改革政策，正常状态终于姗姗来临。

1945年后，德国人对刚刚经历的这段历史抱着十分矛盾的态度。很多人认为，他们曾经奉为神灵那个人是德国的灾难。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在1946年出版了《德国的浩劫》，

这本书当时被广泛阅读，但德国人认为，这场浩劫的罪魁祸首并不是自己，而是“第三帝国”的领袖，也就是误导了他们的希特勒。

116 很多德国人在被问及他们在 1933 年至 1945 年间扮演的角色时，更愿意选择沉默——这指的是那些在“去纳粹化”运动中被查明不仅仅是“随大流者”的人。没有任何民主党派逼迫过他们坦诚事实。据战争结束时的统计，纳粹党共有八百五十万成员。如果不想把这些从前的纳粹党人赶进右翼极端党派队伍，就不能疾言厉色，只能软言招安。因此，这些人的观念很难顷刻间改变。直到数十年之后，德国人才开始意识到，纳粹主义并不是本着善良意图但被错误执行的理念，相反，它在本质上自始至终都是邪恶的。

只有一部分德国人获得了重建民主制的机会，那就是西德人。而西方占领国之所以帮助他们建立民主国家，当然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从 1946 年开始，局势逐渐明朗起来，西方占领国和苏联在德国的未来问题完全无法达成一致。在东西冷战的背景下，冷战双方都希望让战败国成为自己阵营的盟友。

在这一点上，技高一筹的是最强大的战胜国——美国。苏联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欧洲中部之后，美国不得不重视自己在欧洲的政治责任。美国没有重复“一战”之后的政策，而是在欧洲留驻了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在苏联继续扩张的威胁之下，惩罚德国人的问题暂时被搁置到了一边，华盛顿意图通过对德国人的“再教育”，准确地说是西德

人的再教育，使他们最终成为民主的拥戴者。

美国成功实现了这一想法，因为德国人此时也已意识到，正是对西方民主的蔑视给他招致了巨大的历史灾难。在“二战”中幸免于难的那些魏玛民主人士，无论身属哪一个党派，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那就是从第一次共和国的失败经历中汲取教训，重建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要从一开始就向它的敌人宣战，要有良好的运作机制，即便在危机时刻也能经受住考验。联邦德国的宪法就是这种经验学习的结果。

117

德国新建之后如果没有迅速实现经济奇迹，今天的人回顾历史时或许就不会称之为“联邦德国的成功史”了。德国的经济奇迹也是 20 世纪持续最久的经济振兴期，它使得那些丧失家园的人很快重新融入了社会，并降低了右翼和左翼极端政治势力的吸引力。

随着联邦德国 50 年代经济的繁荣发展，社会也发生了一场变革，与这场变革相比，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期间的所有社会变动都显得黯然失色。农业逐渐萎缩，服务业逐渐成长，社会群体的重心由工人转向了雇佣职员。电视机走进了千家万户，机动技术的发展使联邦德国的公民具有越来越高的流动性，这也使得那些最后残存的固定“阶层”也逐渐消失。到 50 年代中期，无产阶级意识已十分淡漠，各个教派之间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势同水火。

从中获利最大的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民主党派——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创建的基督教民主联

盟，这个党派联合了所有阶层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早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已有人尝试过创建一个融合不同教派的政党，当时未能成功。经历了1933年之后的教会抗争，经历了纳粹对反希特勒的教徒的迫害之后，这种良好意愿终于在战后成为政治现实。

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相比，社民党要把自己从古老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出来，需要更多的时间。即使在1945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阶级斗争、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化的信条，依然是社民党的政治纲领，至少在原则上依然有效。直到1959年通过《哥德斯堡纲领》(Godesberger Programm)后，社民党才彻底告别马克思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因此一跃成为人民党派。

“第三帝国”在军事上的失败将德国人从希特勒的统治之下解放了出来。但是解放并不等同于自由。德国人虽然因为这种解放才在政治上获得了自由，却直到很久以后才完全认同：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是他们获得自由的前提条件。苏占区以及后来民主德国境内的人们直到1989年秋天才通过“和平革命”获得了自由——比西德人晚了四十多年。

1945年5月8日是德国历史的关键转折点，不是终结点。而1990年10月3日则标志着一个新的转折点。它在双重意义上解决了德国人自19世纪初就面对的问题——就领土问题而言，1945年划定的国界解决了这一问题，另一方面，统一和自由问题也同时得到了解决。

1990年10月3日，当时的德国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在柏林爱乐厅举行的庆祝活动上说出了整个德国的心声——“今天，德国第一次在西方民主的框架内找到了自己永恒的位置。”^[10]

[10] 关于德国政治的论文，第3行，波恩，1992年，第717—731（718）页。

十三 融入西方*

阿登纳与德国的特色道路

康拉德·阿登纳是“德国特色道路”理念的信徒吗？他是否认同那些评论员和历史学家的观点，将1933年至1945年间的德国灾难理解为德国对西方的背离？——这里的“西方”被视为人权、自由和民主的象征。阿登纳本人并没有提过“特色道路”的说法。但是从他众多关于德国历史的言论中，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在阿登纳看来，希特勒上台并不是一次“意外事故”。如若当时的当权者——兴登堡和他的智囊团——有更理智的解决方式，这件事是可以避免的。而他们之所以未能避免这次“意外事故”，其原因可以

* 2001年4月26日阿登纳基金会赞助的题为“Rhöndorfer Gespräche”会议上的报告，发表在Doering-Manteuffel和Hans-Peter Schwarz主编的《阿登纳和德国历史》一书中，波恩，2001年，第10—18页。缩减版发表在2001年4月27日的《南德意志报》上。

追溯到德国历史中。在这个意义上，阿登纳的看法与备受争议的“德国特色道路”论之间是存在一致性的。

1951年12月6日，阿登纳在伦敦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发表了一番题为“当代问题中的德国”的演说，深入分析了德国的历史。他比较了英国和德国的发展史，并从中得出结论，英国的“民主是其历史不间断地发展的成果”，这种民主被视为“一种无可置疑的国家和社会体制”。阿登纳认为，德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具有类似可能的美妙萌芽，特别是在各个城市中”。“然而随着德意志民族罗马帝国逐渐解体，领土国纷纷诞生，各邦之间权力争夺阻碍了民主理念的发展以及民主机制的建立。直至19世纪初，德国才开始萌发新的政治意识。这种对自由国家体制的追求理所当然地和民族统一的愿望融为一体。民众的愿望促成了1848年的第一届德国人民民主代表大会，然而大会却没能组建起一个民主的德意志帝国。这为德意志民族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非但没有实现民族自由，却为追逐权欲的民族主义提供了温床。这种观念不断激化，加上‘一战’之后的社会困境，纳粹主义终于产生，给全世界，尤其是德国带来了难以言喻的灾难。”〔1〕

120

以上寥寥几句不仅表现了阿登纳对德国历史观点的看法，同时也揭示了“德国特色道路”的核心含义。“德国特

〔1〕 Konrad Adenauer, 《1917—1967 谈话集》，斯图加特，1975年，第233页。

色道路”并不是要暗示德国与其他西欧大国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它强调更多的是德国与西欧以及北美国家在社会和文化上的共同点，以期在这种背景下突出德国政治发展的特性，尤其是德国集权制的悠久传统。“德国特色道路”的出发点也不是假设某个国家——如英国——的道路是正常的。然而典型的西方民主在一定的程度上都基于一种普遍的信念，只不过 20 世纪前半叶这种信仰在德国并没有获得认同，在第一次民主制尝试——魏玛共和国——的后期甚至失去了多数派的支持。这种信念正是道尔夫·施坦贝尔格（Dolf Sternberger）于 1979 年提出的“宪法爱国主义”概念所表达的含义。^{〔2〕}

121 在德国的历史问题上，阿登纳并不满足于将其定义为灾难史的这一论调——从回顾历史的角度。他同时也在“反事实地”考察历史，尤其是 1871 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的那段历史。他也没有批判“小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立：阿登纳是来自莱茵地区的天主教徒，他的父亲是普鲁士士兵，曾参加过克尼希格拉兹（Königgrätz）战役，因其英勇还获得过战功，因此阿登纳决不会抱怨 1866 年的战争以及奥地利的分离。阿登纳也不仇恨俾斯麦，相反，他一生都在称赞这位帝国创建者的外交政策。但阿登纳认为俾斯麦的内政是灾难性的，他经常提到当时的文化斗争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正是这两个事件导致了后来历史的错误发展，而阿登

〔2〕 Dolf Sternberger,《宪法爱国主义》，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1990 年，第 13—16 页。

纳坚信，这些错误原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1960年11月14日阿登纳对美国记者乔治·贝利（George Bailey）说：“由于俾斯麦在德意志帝国的过错，我们没有形成健康的内政政策。这是因为俾斯麦残酷迫害、打压社会党人，又残酷地迫害、打压天主教徒。若他当初没有做这两件事情，那么在德国西部有可能出现一个强大的自由党，东部则有可能产生一个强大的保守党，而社会主义和社民党派也不会向后来那样发展，因为每个国家都应该有一个自己的社会主义党派。”〔3〕

1963年8月13日，阿登纳卸任总理职位两个月前，对美国的年轻历史学家克劳斯·爱普施泰恩（Klaus Epstein）说了以下令人深思的话：“您看，1914年之前，普鲁士在德国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普鲁士主要由东部势力领导，俾斯麦的过错在于他的糟糕内政，他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施行文化斗争政策，这个错误阻碍了西部地区形成一个强大的自由党，吸收大部分社民党人以及中央党人，否则德国就会产生一个足以对抗东部强大保守势力的平衡力量了。”〔4〕

122

1967年1月5日是阿登纳90岁生日，也是他去世前三个月，这一天他又一次提到了上述想法。他认为，文化斗争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后果是，“东部势力本着自己特殊的政治观点从普鲁士控制了整个德国，若没有文化斗争，就不会出现那样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这样的话——您不要害怕

〔3〕 Konrad Adenauer, 《1959—1961 茶话集》，柏林，1988年，第356页。

〔4〕 Konrad Adenauer, 《1961—1963 茶话集》，柏林，1992年，第426页。

——西部就会成立一个强大的自由党！……但是，这种后果更深远的影响在于，1870年至1871年的战争之后，德国已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被东部势力所控制，实际上，那时的德国本应由西部势力控制”。因此，德意志帝国“建立在脆弱的基座之上”，是“一个没有根基的庞然大物”。〔5〕

然而阿登纳假设的这种历史进程其实也经不住推敲。文化斗争不仅仅是俾斯麦的政策，其中至少还有自由党人的参与，他们也因此失去了大部分天主教选民。此外参与文化斗争的还包括天主教的教皇极权主义派，他们对自由党的敌意完全不亚于自由党对教会干预政治行为的敌意。而自由党之所以失去了最后一批工人阶层的支持者，《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也不是唯一原因。自由党后来虽然渐渐摒弃了曼彻斯特自由派的观点，1890年之后也没有继续执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但还是没能重新赢回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已经在社民党那里找到了自己的政治归属地。文化斗争对于信仰天主教的德国，正如《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对于社民党的工人运动，两者都是一段长达十余年的创伤经历：在这一点上

123 阿登纳的观点不无道理。如果说俾斯麦遏制中央党和社民党的政策是阻碍自由党成为德国人民大党的唯一原因——只能是一种马后炮式的幻想。

德意志帝国受到东部势力而非西部势力的控制，其实也不是俾斯麦个人的“过错”，而是勃兰登堡贵族创建德意志帝

〔5〕 Konrad Adenauer,《民主是我们的一种世界观》，科隆，1998年，第220页。

国时依循的法律。正因为如此，1918年11月帝制被推翻后，有人认为应解散普鲁士，当时阿登纳还是科隆市长，1919年2月1日，他在德国国民议会的莱茵左岸议员和普鲁士州议会前发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说，对这种观点表示支持。^{〔6〕}他这样做不仅是出于外交上的考虑，还涉及内政原因。阿登纳希望阻止莱茵地区从德国分裂出去，更希望让西部势力成为自此之后统治德国的力量。

在解散普鲁士的问题上，持反对意见的人却有更充分的理由，在他们看来，普鲁士作为德国最大的邦，是凝聚帝国东部和西方势力的纽带。在魏玛共和国所处的环境下，阿登纳的提议自然无法执行。对于1925年之后施特雷瑟曼的外交政策，阿登纳的批评是“不稳定，左右摇摆”，而且没有倾向西部，然而这些其实正是魏玛政府的明智之处。^{〔7〕}1926年5月，阿登纳作为中央党推举的总理竞选人，败在了施特雷瑟曼的德国人民党之下。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去假设——如果阿登纳竞选成功，德国的历史将会走上什么样的道路，更何况他当时根本没有这个机会。

1945年，德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该年10月9日，阿登纳在外国媒体前笃定地表示：“在未来不可预计的时间内，德国都不可能收回被俄国占领的土地。”^{〔8〕}

〔6〕 Konrad Adenauer 谈话集（见注1），第25—38页。

〔7〕 Paul Weymar, 《康拉德·阿登纳——授权出版的传记》。慕尼黑，1955年，第132页。

〔8〕 Konrad Adenauer, 1945—1947年间信件。

1919年2月，“一战”结束后不久，阿登纳在谈到“普鲁士”问题时强调，他将“尽可能地排除一切情感因素的干扰”。〔9〕“二战”结束几个月之后，他依然信守这句诺言，以比较冷静的态度接受现实，而另一方面，阿登纳在内政上最强有力的对手，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却对这种态度表示强烈反对。“德意志帝国必须保持国家和民族的完整性！”——这是1945年5月8日从“舒马赫博士办公室”传出的第一声呼吁。〔10〕阿登纳和舒马赫之间的分歧正如俩人的生平背景一样水火不容：阿登纳虔信天主教，来自莱茵地区的科隆市，舒马赫则出生于库尔姆，成长于西普鲁士的新教家庭，对俾斯麦建立的德意志帝国抱着一种更深切的感情。

“我们期待一个新德国的诞生”，1946年3月24日，阿登纳作为英占区基督教民主联盟党第一代表，在科隆大学发表主题演讲时说道：“我们不需要普鲁士领导下的俾斯麦帝国。”〔11〕这是阿登纳在“二战”结束一年之后对普鲁士作出的定论，与盟军管制委员会在一年之后，也就是1945年2月25日，解散普鲁士时提出的理由十分相仿：普鲁士“一直是德国军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载体”。〔12〕阿登纳在科隆演

〔9〕 Adenauer 谈话集（见注1），第104页。

〔10〕 Kurt Schumacher, 《1945—1952年间的谈话—文集—信件》，柏林，1983年，第254页。

〔11〕 Adenauer 谈话集（见注1），第104页。

〔12〕 Ingo von Münch（主编），《有关分裂德国的文件》，斯图加特，1976年，第54页。

说中还提到，“国家万能的信念”在德国历经了两个步骤之后才成为了主流信仰：首先是“普鲁士发起的自由战争”，其次是“1870年至1871年战争的胜利”。这次战争之后，“军国主义便牢牢控制住了广大民众的理性和感性层面”。“而普鲁士领导下的帝国建立”之后，“这个国家从原本生机勃勃的机制渐渐蜕变成了一个独裁机器”。他在演讲中还提到了易北河东的骑士贵族势力。阿登纳认为，在政治风云的另一面，骑士贵族又以新的方式复活了：“……首先我是一个德国人，作为德国人，我极其遗憾地发现，社民党官方声明中125 游荡着古老普鲁士的幽灵，那是一种对独权的疯狂追求，只有容克地主阶级曾享有过这种独权。”^[13]

从阿登纳的演讲中，可以感受到一个莱茵地区公民的心声，自古以来，他这样的人一直看不起打着容克烙印的普鲁士（阿登纳或许觉得社民党人库尔特·舒马赫也带着这种容克烙印）。阿登纳后来的一位下属，弗朗茨·迈（Franz Mai），将他称为“古罗马界墙之内”的德国人，他这样的人永远忧心忡忡，因为“古罗马界墙之外的德国充斥着年轻的非理性和狂热，笃信绝对完满的世界，会将整个德国拖入危险境地。”^[14]正是因为带有这种莱茵地域、西式文化和拉丁传统的烙印，阿登纳才会在1945年3月底和一位美国军官谈到“两个德国”的概念：一个是西部以罗马文化为主的德国，另一个是普鲁士的德国，而普鲁士德国却将自己的观念

[13] Adenauer 谈话集（见注1），第85、101页。

[14] Hans Buchheim（主编），《阿登纳的爱国主义》，波恩，1983年，第38页。

强加到更古老的德国中。^[15]九个月以后，也就是1945年12月，阿登纳在和一位年轻的英国军官交谈时又指出，英国对德政策最大失误在于，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英国“非常愚昧地将普鲁士视为了抵御法国和第二个拿破仑的堡垒”。^[16]

1945年德国“溃败”之后，阿登纳对普鲁士在德国历史中扮演的角色作出了严厉的批判，然而未必只有莱茵地区的天主教徒会站在这种批判的立场上。在坚定的自由党人或左派人士看来，霍恩索伦王朝的角色甚至更消极。即便在普鲁士完全成为了历史之后（1945年还没有），作为一个邦国，它曾经的形象也是矛盾丛生的。因此，我们完全应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普鲁士问题上保持冷静的态度——这种态度要远远胜于那种盲目的称颂，而1945年之前，几乎整个德国
126 都在称颂普鲁士。但是，这种关于两个德国的说法也有其负面作用。如果将1933年至1945年间的德国灾难统统推到普鲁士身上，那么德国其他地区就能免于被问责。在处理历史的问题中，阿登纳的观点恰恰为德国的西部和南部地区提供了一种便利，甚至流于自负的立场。这种立场对他的政治有利，但同时也推动了东德和西德之间的疏离。

阿登纳任职总理之后，在涉及“普鲁士”的问题上，他

[15] 《战争结束，莱茵的重新开始——瑞士总领事 Franz-Rudolf von Weiß 报告中的阿登纳》，慕尼黑，1986年，第24—25页。

[16] Hans-Peter Schwarz, 《阿登纳——1876—1952的上升》，斯图加特，1986年，第449页。

的态度与1945年至1949年间相比变得更谨慎。他不再重复当初反对柏林作首都的论调，相反，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态度（至少在言语上）有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颇有西柏林人我行我素的作风。^[17]但是，阿登纳与当时“统一德国董事会”的活动却明确地保持了距离，这个团体是他的政治伙伴——联邦内务部长雅各布·凯泽（Jakob Kaiser）在1954年创建的。对于阿登纳而言，这个组织带有太多的俾斯麦色彩，又太缺乏欧洲色彩。^[18]但另一方面，阿登纳也不赞同那种将德国建成一个欧洲联邦国的观点，这是当时《莱茵河周报》和《新西方》杂志的圈内某些天主教泛德意志人士的建议。政治评论家保罗·威廉·魏格纳（Paul Wilhelm Wegner）就是这种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阿登纳在1960年7月19日与一位名为丹尼尔·罗特（Daniel Roth）的瑞士记者谈话间提起了魏格纳：“他属于异想天开的那一类人。我敬重他，但他有时会做出一些对我而言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19]阿登纳对德国和欧洲未来的设想比魏格纳要清醒得多。身为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他认为未来的德国不会成为一个松散的民族联邦，政治上在东西方阵营之间摇摆不定，因而只能走“特色道路”。阿登纳并不希望德国走到这一步。“自始至终，欧洲都需要统一起来”，阿登纳在回忆录中提到1954年夏天欧洲

127

[17] Johann Baptist Gradl, *Adenauer und Berlin*, 载《阿登纳和他的时代——第一任联邦总理的其政其人》，柏林，2000年，第535—549页。

[18] Edgar Wolfum, 《联邦德国的历史政治——走向1848—1990年联邦共和国记忆的道路》，达姆施塔特，1999年，第108—110页。

[19] 茶话集（见注3），第283页。

防御共同体以失败告终时这样写道：“联邦德国和统一之后的德国必须与西方保持联盟关系。”^[20]这正是阿登纳的政治路线，这一路线基于他对局势的判断，他认为，在东西方之间摇摆不定的德国迟早会让苏联成为欧洲的霸主。

是不是只有阿登纳本人的特殊背景，才能让德国彻底摒弃反西方的特色道路呢？而且他在此过程中的确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很多迹象表明答案是肯定的，库尔特·舒马赫不可能走阿登纳道路，身为社民党战后第一届领导人，舒马赫太普鲁士，且对1871年的民族德国抱有太深厚的感情。但是如果没有舒马赫以及他的政党，阿登纳的西化政策也根本行不通。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民族反对党”代表着右倾和反民主的路线，而到了联邦共和国早期，它又成了左倾力量、民主人士的代表。社民党在议会中反对阿登纳的“西方政策”，反而促成了这种路线的合法化。此外，舒马赫的社民党与基督教民主联盟一样反共产党，因此在原则上也同样是亲西方的。然而从实践的角度而言，既然反对在军事上融入西方阵营，就意味着反对西方。正因为如此，和舒马赫以统一为第一要务的主张相比，阿登纳联合西方的路线更符合西德人对安全感的渴望。

1986年，也就是阿登纳卸职近二十五年之后，德国发生了一场围绕着犹太大屠杀行为特殊性的讨论，这场讨论也被称为“历史学家之争”，在这一时期，联邦德国出现了一

[20] Konrad Adenauer, 《1953—1955年回忆集》，斯图加特，1966年，第304页。

个“后阿登纳左派”。^[21] 于尔根·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 提出的著名观点——“联邦德国应毫无保留地向西方政治文化敞开臂膀”——被视为“二战”后的重大思想功绩，这种观点不仅否定了任何以民族借口来修正联邦共和国历史观的行为，^[22] 同时也（虽然是无意识的）肯定了阿登纳当时遏制左派反抗而实施的政策。此外，另一位“后阿登纳左派”成员也曾引用过阿登纳的观点，但不是无意识的引用，而是带有明确的意图。两德统一九个月之后，也就是1991年6月20日，联邦议院就德国首都问题进行了一场大辩论，社民党人彼得·格罗茨 (Peter Glotz) 警告基民盟总理赫尔穆特·科尔 (Helmut Kohl) 说：“如果把票投给柏林，您就背离了欧洲一家的路线……请您继续贯彻阿登纳超民族欧洲的理念，这是那位伟大政治家留给后人最重要的遗产……波恩象征着第二个德意志共和国。波恩必须且应该继续是政府和议会的所在地。”^[23]

无论阿登纳本人在1991年6月20日会把票投给哪一方，他和“后阿登纳左派”在观念上还是存在着本质区别。“后阿登纳左派”是一个理想化的组织，他们认为民族国家已是一种过时的形式，一个“后民族”的时代即将到来或已经到来。阿登纳的确希望超越那种古老、孤立、自主的民族

[21]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阿登纳是否希望统一?》，载《时代》，1988年10月7日。

[22] Jürgen Habermas, 《一种对伤害的处理方式》，慕尼黑，1987年，第62—76(75)页。

[23] 德国联邦议院谈判速记材料。

国家，但他希望看到的是不同民族及民族国家的共存在统一的欧洲中。阿登纳并没有想过德国会成为特例。既然他不相信德国可以走一条特色道路，所以必然也不会支持走“后民族”特色道路。

卡尔·马克思写于1843—1844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导论中有这样一句名言：“让思想促动现实是不够的，现实自身也要去促动思想。”^[24]1945年之后，西德的现实正在促动思想，即“融入西方”的思想，1963年初阿登纳曾说过，自1925年以来这一理念一直是他从政的“指明灯”。^[25]从1990年10月3日起，这一理念在整个德国都变成了现实。德国问题不复存在，德国特色道路的时代也已结束。

[24] MEW, 柏林, 1959—1961年, 第1卷, 第386页。

[25] Adenauer, (1961—1963茶话集)(见p. 131注4.)。

十四 柏林的巴士底狱*

129

1961年8月13日——德国战后历史的重大转折

1961年7月30日，瓦尔特·乌布里希（Walter Ulbricht）平生第一次得到了一位西方政治家的深切同情。这一天，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的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傅尔布莱特（William Fulbright）在电视采访中谈到，如果他是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SED）书记的话，会如何行事：“我不明白为什么东德人不封闭他们的边界。我认为他们完全有理由封闭边界。”^{〔1〕}

华盛顿之所以会做出这种令人惊异的表态，是因为当时逃离民主德国的运动正在迅速升级：1960年，有20万人离开民主德国逃往西柏林，西柏林是东西“铁幕”间的唯一通道。单是1961年4月的逃亡人数就达3万之多。逃亡大潮

《每日镜报》，2001年8月11日。

〔1〕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肯尼迪的一千日》，伯尔尼，1965年，第376页。

反映了民主德国不断推进的苏维埃化，日益加剧的农业集体化，以及物资短缺问题和东德人的恐惧感。之所以恐惧，是因为从1958年底开始，苏共中央总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反复对柏林施加压力。西方社会也认为，莫斯科必然会采取措施阻止这场逃亡运动，以防止民主德国“失血而亡”。

和平建筑？

从1961年7月25日开始，莫斯科和东柏林已经明确意识到了自己该做什么——如果他们不想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在这一天，美国总统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电视讲话中提出著名的三个“要点”，即美国在柏林问题上必须坚持的三点：一、西方盟国必须在柏林派驻力量；二、他们必须享有进入柏林的自由通道；三、西柏林200万人的政治自主权。在这次讲话中，肯尼迪没有提到东柏林人。

7月31日，傅尔布莱特接受电视采访的第二天，乌布里希来到莫斯科与苏共会晤。赫鲁晓夫表示同意封锁通往西柏林的边界，这样可以遏制住民主德国的逃亡大潮。乌布里希还提出切断西柏林空中走廊的建议，却遭到了这位克里姆林宫首脑的拒绝，因为他觉得这样做太危险。同年6月初，赫鲁晓夫还在维也纳峰会上对肯尼迪下了最后通牒，敦促与民主德国签订独立的和平条约，此时关于合约的谈判也被他暂时搁置在了一边。在此之前，苏联还曾要求把西柏林变成一

个非军事化的“和平城市”，要同盟国彻底撤军，并打算切断和西柏林以及联邦德国之间的联系，与这些要求相比，封锁边界只不过是一个大问题的“小方案”。这个方案是华沙公约国在1958年8月5日投票同意通过的。一锤定音后，乌布里希开始着手砌柏林墙。

对于乌布里希和赫鲁晓夫而言，这一做法的风险很小。因为英国首相麦克米伦、美国总统肯尼迪以及北约在此之前对柏林问题已有表态，莫斯科和东柏林可以借此推测出西方对修建柏林墙的反应：他们顶多只会口头谴责几句，根本不会有任何过激行为。因为发生在1961年8月13日的事件具有一种双重逻辑：雅尔塔体系的逻辑和“铁幕”背后体系的逻辑。

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划定了苏联和英美在欧洲的势力范围。斯大林不断扩张苏联体系，一直延展到其势力范围131的西部，然而苏联体系是一种强迫性秩序，柏林的四个占领区之间却有着很高的流动性，违背了苏联的安全要求。因此修建柏林墙是迟早的事，而1961年8月13日也因此成为了一个真相之日。

1957年至1966年间任柏林市长的威利·布兰特后来谈到，1961年8月13日“揭开了帷幕，却让我们看到一个空荡荡的舞台。”1976年，他又写到柏林墙：“我们失去了幻想，这些幻想是深层希望破灭之后的余晖——我们借着幻想依靠在已不复存在的现实上。乌布里希趁机狠狠踢了西方强国一脚——而美国也只是生气地拉长了脸。这一天的经历影响了我之后多年的政治思考。我施行的所谓东方政策，也正

是在这个背景下成形的。”〔2〕

如果西方阵营在1961年8月对东德的铁丝网和城墙采取了武力干涉，就有可能引发一场核战争。而东方阵营封锁通往西柏林的通道的时候，也应考虑过这一可能的后果。由于双方都希望避免战争，世界才幸免于难。

东西方阵营之间的紧张局势在柏林墙建成以后丝毫没有得到缓和，相反，柏林及其周边的形势在建墙之后的12个月中多次激化。直到1962年10月爆发古巴危机，局势才出现了转机：在美国海上封锁的威胁下，苏联撤走了加勒比岛的中程导弹。就柏林危机和古巴危机之间的“辩证”关系，理查德·罗文塔尔（Richard Löwenthal）在1974年这样表述道：“柏林墙使苏联巩固了它在中欧的实力，而导弹危机则
132 巩固了西方阵营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位置——包括在西柏林的位置。在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的作用之下，东西阵营的对峙在这一基础之上得到了一定缓和。因此，联邦德国对东政策的框架条件终于也相应发生了变化。”〔3〕

对德国人而言，1961年8月13日是自1949年德国分裂（或是自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以来最大的历史转折点。与西德人相比，苏占区及后来民主德国的德国人才是“二战”真正的输家。然而自从他们被禁止离开民主德国之后，这种不自由又上升成了一种无法逃避的命运。1961年8月13日之后，即便民主德国的公民对“他们的”

〔2〕 Willy Brandt,《邂逅与明辨——1960—1975年》。汉堡,1976年,第17页。

〔3〕 Richard Löwenthal,《从冷战到东方政策》。斯图加特,1974年,第604—699页。

国家抱着完全排斥的态度，却也再没有第二个选择。因为大多数人是没有办法离开的，除非他们愿意冒极大的风险，因此，这些人现在只得努力去适应这个体制。

无论西德人对1961年8月13日的暴力事件感到多么愤怒，客观地看来，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虽然阿登纳一再重申要和平自由地统一两德，但他的“强势政策”手段并没有实现这一目标。东德修筑的柏林墙更是让这种分裂变得无可挽回，此时此刻，在两德是否能统一的问题上，人们产生了有史以来最强烈的怀疑。柏林墙也因此激起了人们对德国问题的新一轮反思。

最先开始反思的是西柏林，西柏林也是受这座可怕建筑影响最大的地区。1962年，布兰特和他最重要的顾问埃贡·巴尔（Egon Bahr）（柏林媒体信息部主管）开始意识到，民主德国的糟糕现实只能通过交流以及一定程度的认同才有可能得到解决。1963年7月16日，巴尔在图岑（Tutzing）基督教学院政治俱乐部的演讲中提出要“以接近求变化”。〔4〕此后西德开始实行“小步政策”，也正是这一政策使得1963年至1966年间的四个西柏林的通行证协议成为可能。

133

几年之后，“小步政策”变得大刀阔斧起来：在布兰特和舍尔的带领下，社会自由党联盟签订了一系列《东方条约》，其中包括1970年的《莫斯科条约》和《华沙条约》，1971年关于柏林问题的《四国条约》，以及与东德签订的1973年生效

〔4〕 德国政治文件，第4行，第9卷，第565—575页。

的《基础条约》。这些条约起初备受争议，基民盟考虑到他们的保守派选民，特别是那些流亡人士的观点，表态时尤其强调民族角度。其中基民盟的立场最具有民族主义色彩——令人惊讶的是，早在1966年，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ß）就在其《欧洲草案》（*Entwurf für Europa*）一书中建议“将德国问题欧洲化”，他是第一个表达这一观点的西德政治家，在这本书中，他还写下了一段极其大胆的话：“我不相信德国能重建民族国家，即便是在四个占领区内也不可能。”〔5〕

后民族的联邦德国

1970年底，柏林墙修建九年之后，乌布里希放弃了一个社会主义统一党此前坚信不疑的理念：一个德国民族的理念。取而代之的新观点是（昂纳克也接受了这一观点），民主德国已开始“创建一个社会主义民族”，这是另一个德国，和联邦德国代表的旧资本主义德国并存。〔6〕“两个民族理论”出现之后，“德国”这一概念退出了民主德国的语言：“德国电台”变成了“民德之声”，“德国科学院”变成了“民德科学院”，由约翰内斯·R. 贝歇尔（Johannes R. Becher）作词、汉斯·艾斯勒（Hanns Eisler）作曲的民德国歌只能被演奏，但不许被唱出来，因为歌词中的“德意

〔5〕 Franz Josef Strauß，《欧洲草案》，1966年，第50—51、162—163页。

〔6〕 德国政治文件4（1970），第291—296页。

志，统一的祖国”违背了民德的新教条。

而联邦德国仍坚持“两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官方立场。联邦宪法法院根据1973年的《基础条约》判定联邦德国有义务促成两德统一，克服一切国家统一道路上的障碍。然而在联邦德国的公共舆论中，“两德统一”这个国家目标正在逐渐淡出视野。某些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提出了一种“民族双边化”的观点，所谓“民族双边化”其实是“两个民族理论”在西德的版本，但其影响并不大。^{〔7〕}另一些人则主张在联邦德国创建一种“民族国家下的后民族时代民主体制”。^{〔8〕}到了20世纪80年代，西德开始流行一种观点：德国的分裂是为东西方阵营的平衡以及欧洲和平付出的代价，也是德国因其在20世纪带给欧洲和世界的灾难受到的惩罚，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在1989年至1990年间也曾说过，这是德国为奥斯维辛赎的罪。^{〔9〕}在此之后，德国人对柏林墙的看法不知不觉地发生了一种逆转：在老联邦德国的很多知识分子看来，这个带着共产主义非人道色彩的建筑竟成了遇害犹太人的纪念碑。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整个世界都为之欢欣鼓舞。然而东德的民权卫士和很多西德知识分子很快就不那么高兴了，随着“德意志，统一的祖国”嘹亮歌声传遍大街小

〔7〕 Gebhard Schweigler,《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民族意识》，杜塞尔多夫，1973年。

〔8〕 Karl Dietrich Bracher,《德国式独裁——纳粹的缘起、结果和后果》，科隆，1979年第6版，第544页。

〔9〕 Günter Grass,《德国负担的平衡》等，哥廷根，1997年，第230—234页。

巷，恐惧也随之而来，人们担心又回到过去，担心这段历史会失去其意义，而这种意义是人们经过痛苦的思考之后才得出的结论：如果两个德国的现状无法维持，德国也应为了欧洲而暂时搁置统一问题，静待欧洲实现统一。

135 1990年3月18日，人民议院选举几乎是以公民投票的形式迅速决定加入联邦德国，这次选举也被视为对启蒙理性的挑战。东德人之所以决定统一，只是为了得到历史的公平。1945年之后，德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不公平的，因为东德人承担了所有的负担。现在人们终于可以纠正这个问题，而正因为他们有这个能力，所以1990年3月18日的投票结果完全在意料之中。

边界独裁

那些曾试图翻过柏林墙逃往西德的人们当中，有239人被杀。1989年2月6日，年轻的克里斯·歌弗罗伊（Chris Gueffroy）被民主德国边界的士兵射杀，他是最后一个死在柏林墙下的人。“8月13日工作组”的调查显示，从1949年开始，至少有943人死在两德边界和柏林墙下。

1989年11月9日之后，柏林墙不复存在。然而柏林经历了28年的柏林墙，已留下了深深的烙印。1973年之后，两德之间虽然一直谋求接近，但东德人和西德人却在日渐疏远。数十年的监禁已让东德人变得麻木，曾几何时，他们可以正常地从柏林的一头走到另一头，直到1961年8月13日

来临。到了1989年11月9日，当他们终于可以重温这一行为时，却觉得这件事“很疯狂”。西德人和西柏林人并没有把柏林墙看得那么严重，不知道他们是否读过黑格尔，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即是合乎理性的。^{〔10〕}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一说法，但老联邦德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似乎都这样认为。民主德国是“独裁”的说法渐渐变成了一种禁忌。不管在东德还是西德，从前的那些“理论家”一直拒绝承认自己的观点有误，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也正是因为这样，柏林和德国直到今天依然有“东”“西”之别。

修建柏林墙40年以后，1961年8月13日依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这也是民主社会主义党（PDS）最关心的话题。民主社会主义党即是12年前的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他们并不是想以“反法西斯壁垒”的借口来为柏林墙辩护。民主社会主义党董事会提出的“永远不再有墙”的口号是严肃的，虽然他们在忏悔的同时也经常试图从“历史背景”的角度来解释8月13日：冷战背景造就了柏林墙。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合理之处，的确，1961年8月13日之前，开放的边界是冷战之前那个时代的遗物。然而冷战本身并不是一个行为主体。直至今日，砌墙那代人的后继者仍没有做过彻底的自我批判。社会主义统一党的原罪并不是柏林墙，而是他们的独裁。独裁者即使失去了民心，也不会主动请辞。在民主德国的问题上，还应考虑到另一个大国的利害关系：

136

〔10〕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法哲学原理》。

作为苏联帝国的最前线，如果民主德国因为民众大逃亡而崩溃，那么“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也会因此消亡，因此莫斯科必然不会放任不管。

承认自己只能通过强制措施才能留住国民——民主德国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因此大失颜面。民主德国和苏联通过封锁边界为自己判了一个缓刑。当然，我们也是在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开放对于民主德国的意义，正如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狱风暴对于法国封建王朝的意义一样：两者都是对旧制度的毁灭一击。柏林墙与巴士底狱一样，都是一种“不自由”的象征。象征倒塌了，旧制度的末日也随之来临。

德国人的历史观之争

最近几年的事实证明，世纪末的阴霾已早早降临。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已经步入了世纪末。在波恩内阁的圆桌会议上，在《法兰克福汇报》的编辑室，在众多德国历史学家的书桌前，一位冷酷的客人徘徊不去，这位客人就是纠缠不休的“过去”。^{〔1〕}人们想赶走他，他却毫不屈服，并不断质问：“为什么你们德国人会犯下20世纪的滔天大罪——欧洲犹太人大屠杀？”

“二战”结束四十年后，一些政治和文化界精英认为已到了摆脱希特勒阴影的时候。他们质问道：如果我们的回忆永远停留在奥斯维辛上，德国还有未来吗？难道年青一代没

* 《法兰克福评论报》，1986年11月14日。

〔1〕 Ernst Nolte,《不愿过去的过去》，载《历史学家大争论》，慕尼黑，1987年，第39—47页（原文发表于1986年6月6日的《法兰克福汇报》上）。

有权利卸下第三帝国的历史包袱，走进新的千年？如果我们的未来永远纠结在一段早成往事的德国罪责上，悲观、挫败和颓废感也会永远如影随形。

138 在“二战”结束四十周年纪念日，美国总统和德国总理共同来到比特堡（Bitburg）的士兵公墓，这次活动被视为一个信号，它意味着“二战”被重新定义成了一次欧洲范围的普通战争。既然里根领导的美国在美莱村屠杀事件之后依然心安理得，那么科尔领导的德国在奥斯维辛事件之后也能保留民族自豪感。^{〔2〕}几乎在同一时间，德国各大州级报纸的增刊上都登出了一则“硬币版本协会”的广告。广告宣传的一套纪念币的主题是纪念德国国防军在1939年到1945年间“杰出战绩”。最后一枚硬币上的文字虽被遮住了一半，但依然能看出上面的字迹：“虽败犹荣”。

比特堡的幽灵一直挥之不去。这其中，《法兰克福汇报》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于比特堡事件，这份“德意志之报”给予了极大的认同和宽容，远远超过了他们对德国总统1985年5月8日的联邦议院演讲的认同和宽容。在此之后，《法兰克福汇报》登载的很多文章读起来仿佛是对魏茨泽克言论的间接回应。1986年2月28日，汇报刊登了弗里德里希·卡尔·弗洛梅（Friedrich Karl Fromme）的一篇重点评论，文章评论了联邦议院此前一天的“反犹太主义”辩论。弗洛梅认为，这种探讨是多余的，没有意义。他的理由是，“‘反犹太主义’已经

〔2〕 在越战期间的1968年3月16日，美莱村发生了一次针对越南平民的大屠杀，死亡人数高达347人。

存在了几个世纪，今天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有‘反犹太主义’，尤其在苏联”。其他的民族或许会问，是不是苏联更值得同情。‘犹太灭绝’这个词必须加引号，在纳粹德国它是秘密进行的；当时德国的广播也从来没有发布每周信息，公布过去几日中被屠杀犹太人的数量。

通情达理

虽然德国人当时并不知道“病态的反犹太主义者希特勒”（毕竟他是被少数人选上台的）暗地里在谋划什么，然而令弗洛梅感到遗憾的是，德国人直到如今依然如履薄冰。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因为面对犹太人，他们不能像普通人那样，对身边人有好恶之分”。

劝诫德国人不要凭感情行事之后，弗洛梅也提醒犹太人 139
不要得寸进尺，否则会激起新一轮反犹太主义运动。“中青年的德国人对犹太人是很有好感的。他们这一代人在情感上并没有背包袱，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他们的耐心是有限的。理性和人性这两个概念并不是永远都能共存，因此我们必须“通情达理”地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一点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通情达理，各方努力”也是这篇为德国人作道德辩护的文章的标题。^[3]

两个月之后，弗洛梅的同行，另一位评论家恩斯特－奥

[3] 《通情达理，各方努力》，载《法兰克福汇报》，1986年2月28日。

托·迈茨克 (Ernst-Otto Maetzke) 也对他的观点表示了支持。1986年4月24日, 迈茨克结合当时全世界对奥地利总统库尔特·瓦尔德海姆 (Kurt Waldheim) 政治过往的讨论, 发表了一篇关于犹太人国际会议的评论。他批评这一会议“虚伪地利用了往日战争和暴力统治的牺牲者, 以达到当下的政治目的。虽然这种手段在政界相当普遍, 但这不能成为他们的理由。这种做法甚至比一般的盗尸者更加卑劣”。迈茨克本打算将这篇评论的题目定为《让已故者去安葬已故者吧! 》, 但为了简明醒目, 最后他又改成了《比盗尸者更可恶》。^[4]

加入《法兰克福汇报》右翼联盟的第三位成员是君特·吉勒森 (Günther Gillissen)。1986年5月14日, 吉勒森用一个多版面的篇幅, 详尽地介绍一位从德国移民到美国的律师弗朗茨·欧彭海默 (Franz Oppenheimer)。欧彭海默读了一些新近出版的书籍, 其中有一本对他的影响极大, 他因此产生了以下这种观点: “希特勒夺取政权之前, 即使在纳粹党核心成员中, 极端反犹主义者也只是占 12.5% 的少数人。”这个数据出自美国战后在德国做的问卷调查, 它恰好为欧彭海默的观点提供了合适的论据。这位“历史文献收藏家”从中得出的结论是: “大多数德国人在希特勒罪行上的过失, 并不比其他人在过去的斯大林、今天的戈尔巴乔夫罪行上的过失更严重。”吉勒森在自己评论的引言中推出了欧彭海默的这

[4] 《比盗尸者更可恶》, 载《法兰克福汇报》, 1986年5月24日。

个结论，还特意用醒目的大字体来强调文章的标题——《谨防对德国历史的错误结论》，副标题则写得更直白：“对集体自责行为的唆使”。〔5〕

经过一系列的铺垫之后，1986年6月6日，柏林自由大学现代历史教授和资深法西斯主义研究家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也粉墨登场。如果有人读过那天的《法兰克福汇报》，可以在副刊中发现诺尔特的一篇题为《不愿过去的过去》的文章，表达了一个之前任何历史学家都没有提过的观点：奥斯维辛其实是苏联斯大林时期“古拉格群岛”的一个翻版。出于对亚洲布尔什维克屠杀欲的恐惧，希特勒自己也做出了一种“亚洲行为”。犹太人大屠杀是不是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假想防御呢？这正是诺尔特的言下之意。

其实诺尔特此前曾用过更隐晦的方式表达这一观点。在1985年H. W. Hoch出版社的《第三帝国面面观》一书中，收录了一篇诺尔特用英语写的文章，文中提出了一种质疑：希特勒在“二战”爆发以后将德国犹太人作为战俘隔离，是否也有其合理之处？〔根据诺尔特的观点，希特勒的行为之所以有“合理性”，是因为犹太社团的主席魏茨曼（Weizmann）曾在1939年9月初给英国首相张伯伦写了一封公开信，承诺犹太人在战争中会站在英国和西方民主国家一方。〕无论在被《法兰克福汇报》删减的章节中是否还有类似段落，在诺尔特之前，还没有哪一位德国历史学家对希特

〔5〕《对集体自责行为的唆使》，载《法兰克福汇报》，1986年5月14日。

勒抱有如此程度的宽容和理解。〔6〕

141 站在世纪末回首历史，诺尔特并不是唯一一位试图将第三帝国及其罪行相对化的历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安德里亚斯·希尔格鲁伯（Andreas Hillgruber）和米夏埃尔·施图尔默（Michael Stürmer）两个名字也常常被提起（哈贝马斯在1986年7月11日刊登在《时代》上的文章中也提到了他们）。这两人被讨论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施图尔默喜欢将自己相对保守的历史观上升为整个德国的历史观，而希尔格鲁伯则对普鲁士的容克贵族和军官抱有明显的好感，虽然他也知道，如果没有这些势力的支持，希特勒既不可能上台也不可能长期执政。但这两位历史学家都不是诺尔特式的相对主义者，他们的立场尚不至于与诺尔特相提并论。〔7〕

而波恩历史学家克劳斯·希尔德布兰特（Klaus Hildebrand）的情况则不同，1986年，希尔德布兰特在《历史学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4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热情洋溢地评论了诺尔特的那篇以英语出版的论文。〔8〕其实早在1983年，希尔德布兰特就借纳粹夺权50周年之际为由强烈抨击了一种观点，即认为1933年之前德国已走上了“特色道路”，偏离了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正常”发展。而在希尔德布兰特看来，所谓的“特色道路”只能指1933年至

〔6〕 Nolte, 《不愿过去的过去》（见注1），第39—47页。

〔7〕 Jürgen Habermas, 《一种对伤害的处理方式》，载《历史学家大争论》（见注1），第62—76页。

〔8〕 《历史学杂志》242（1986），第465—466页。

1945 年间，因为当时出现了“希特勒这个意外情况”。〔9〕

希尔德布兰特的另一篇文章发表在 1984 年沃尔夫冈·米沙尔卡 (Wolfgang Michalka) 出版的关于纳粹夺权的论文集中，这篇文章直到今天都没有引起过人们的注意。在该文中希尔德布兰特又收回了之前的一些说法，他写道：“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在未来的研究中（例如与斯大林俄国的比较研究），或随着历史的迈进（如柬埔寨原始共产主义提供的例子），人们是否会以历史化的眼光来看待希特勒时代。这样或许会产生出很多可怕的历史观点，同时也伴随着痛苦的人性体验，然而说得恐怖些，这两种现象都足以令‘1933 年到 1945 年间德国特色道路’这个概念变得相对化。”〔10〕

很多人驳斥过希尔德布兰特关于 1933 年之前不存在“德国特色道路”的说法，但几乎都是老生常谈。对我们而言，更值得关注的是诺尔特提到了斯大林和波尔布特，将他们的罪行和希特勒相提并论。但这种比较有什么意义呢？德国在文化上是一个西方国家，参与了欧洲启蒙运动，并有悠久的法治国家传统。而俄国和柬埔寨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原谅斯大林和红色高棉的罪行。只不过，希特勒及其帮凶们的行为需要用西方标准来衡量。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德国发起的大规模种族屠杀，包括对犹太人、辛蒂

〔9〕 Klaus Hildebrand,《战争与和平，和平与战争——关于 1931—1941 年国家社会合法性的问题》，1987 年，第 1—26 页。

〔10〕《德国特色道路和第三帝国》，载 Wolfgang Michalka (主编)：《纳粹夺权》。帕德波恩，1984 年，第 386—396 页。

人和罗马人的屠杀，是 20 世纪最大的罪行，也是世界史上最大的罪行。

西方价值观的大甩卖

1986 年 8 月 29 日，约阿西姆·费斯特（Joachim Fest）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写道，谴责德国其实是以一种傲慢的姿态“延续着从前的纳粹等级观，将人类划分为高等民族和肆意杀戮的劣等民族”。^[11]

这些人自我辩护的伎俩多么令人匪夷所思！费斯特将德国抽出了它自己参与创造的价值体系，并免除了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即从历史本身出发进行恰当的判断。诺尔特、希尔德布兰特以及费斯特的目的都不是鼓吹玩世不恭的虚无主义，但是他们的所言所行，说得恐怖一些，是对西方价值观的一次大甩卖。

哈贝马斯认为，诺尔特和希尔德布兰特旨在鼓吹民族自辩论。而费斯特在上文提到的这篇文章中，针对哈贝马斯的论断为诺尔特和希尔德布兰特进行了辩护，并称这种论断简直是一种人身攻击。魔鬼梅菲斯特说过什么？“纯洁心灵迫切渴求之物，不可在纯洁之耳前提及。”^[12]利用斯大林和波尔布特来“相对化”希特勒的人，不是在做历史学研究，而

[11] Joachim Fest, 《未被偿还的记忆——关于纳粹大屠杀独一无二性的争议》，载《历史学家大争论》（见注 1），第 100—112 页。

[12] 《浮士德》，第一部分（森林和地狱，诗行第 3296—3297 行）。

是在从事“历史政治”，他们为了实现政治目的而将历史工具化，这种“右翼”做法和1968年左派学生运动的理论领导者的行为如出一辙。费斯特难道敢声称，他的报纸之所以讨伐“德国罪责论”，并非出于政治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追寻历史真相，为了真理本身？

《法兰克福汇报》上的一系列的文章也暴露了民族自辩浪潮的幕后推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汇报的各大专栏无不在大声呼吁着德国统一，这种声音比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响亮。无论汇报本身是否相信能最终实现这一目标，重要的是，这种统一的呼声强化了德国人的民族意识。为了重建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必须要改写过去的历史。因此那个摧毁了统一德国的政权不能继续以过去的形象出现，这也就意味着，不能再将它称为史上最反人类的政权。所以有人将纳粹政权与其他民族（不管处在何种文化发展阶段）的罪行相提并论。最后他们又回归了三百多年前的德国人早已得出的结论：一切历史都是罪恶史，德国的历史也不例外。

21世纪也是新千年，或许这也是一种安慰。德国人在回顾历史时，可以思考自己在长久的历史中究竟为世界做了什么贡献，当然政治成就显然不在其列。从19世纪的局势来看，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是势在必行之事。然而建于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却毁在德国人自己手中。鉴于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扮演的角色，欧洲和德国人自己都不希望再重建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重建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这

144

就是历史的逻辑，用俾斯麦的话来说，这种逻辑比普鲁士内阁更明确。^[13]

现在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必须学会带着历史继续生活，而不是事后改写历史。对于未来，我们不能苛求，而且要明白为什么不能苛求。历史赋予我们一种义务，要去团结被德国自负伤害的人们，尤其是犹太人和波兰人。历史留给我们的任务还有团结民主德国的公民们，和西德人相比，他们一直承担着更多的历史重负。

比特堡的幽灵试图阻止我们吸取历史教训。它让我们充满对别国“常态”的嫉妒，虽然这种“常态”亦真亦假。它迷惑我们，让我们误认为如果修改历史，就能获得一种权利。它诱惑着我们再次走上那条曾将我们引向灾难的道路。今天，我们是时候驱走这个幽灵了。

[13] Fürst Otto von Bismarck, 《思考与回忆》，作品合集，柏林，1924—1926年，第1卷，第393页。

十年之后：回顾德国历史学家之争

当老联邦德国开始争论纳粹大屠杀的独特性——也就是“历史学家之争”——的时候，距离新千年还有十四年。其实在1986年，这场争论已带有明显的世纪末情绪。引发争论的人正是恩斯特·诺尔特，他自居为黑格尔式的世界精神，将20世纪传唤到自己的法官席前，并宣判道：大屠杀并不完全是一场反人类罪行，而是对另一桩同样特殊、且更“原始”罪行的拙劣模仿，也就是“古拉格群岛事件”。所谓“原始”，是因为斯大林的阶级屠杀不仅在时间上先于希特勒的种族屠杀，两者之间更存在一种“因果联系”：希特勒当时处于假想防卫状态，为了避免被布尔什维克毁灭，他才向

* 《法兰克福评论报》，1996年10月29日。

其幕后主使者——全世界的犹太人——宣战。^[1]

诺尔特这种辩解的意图显而易见。这位柏林历史学家想全盘减轻德国（尤其是资产阶级）的历史重负。批评家不难看出诺尔特这种误导的意图所在，也不难发现他对大屠杀的历史引申其实是一种历史政治的建构。而出现以于尔根·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反对声音并不奇怪，他们的反对也很有成效：这种试图修改德国历史观的民族自辩未能得逞，德国仍继续对自己的政治传统进行自省反思。^[2]

146 十年之后，当年的参与者也应以自省的态度来回顾这场历史学家大争论。1986年11月14日，我在《法兰克福评论报》（*Frankfurter Rundschau*）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永远活在希特勒的阴影下吗？》的文章，笃定地预言未来：“鉴于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扮演的角色，欧洲和德国人都不希望再重建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重建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这就是历史的逻辑，用俾斯麦的话来说，这种逻辑比普鲁士内阁更明确。”^[3]到了今天，我为自己当时的武断感到不安。

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应该反对德国民族主义，毋庸置疑，诺尔特鼓吹的正是民族主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两德分裂终究还是德国政治和过错的后果。可是我当时

[1] Ernst Nolte, 《不愿过去的过去》，载《历史学家大争论》，慕尼黑，1987年，第39—47页。

[2] Jürgen Habermas, 《一种对伤害的处理方式》，载《历史学家大争论》，第84—92页。

[3]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永远活在希特勒的阴影下吗？》，载《历史学家大争论》，第256—263页。

凭什么断言不会再有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呢？正如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所言，历史学家预言的不是未来，而是过去。^{〔4〕}如果一个历史学家自称可以预测未来，那它就不再是历史科学，而是世俗化的历史神学。历史学家之争期间发表的某些批判性文章或多或少地都在走历史神学道路，对事实并无裨益。

诺尔特和某些保守派历史学家企图通过相对化（Relativierung）的手段来“清理”德国历史，这种说法并非假设，而是判断。可是，我们这些批评者真的完全不为“清理历史”所动吗？呼吁接受国家长期分裂的状态，难道不也是一种有意无意的尝试，通过意义建构来减轻历史的重负吗？20世纪80年代后期，联邦德国出现的“后民族”和“宪法爱国主义”等自我定位，除了积极、启蒙以及解放的一面，难道就没有自私的另一面吗？——相比东德人，西德人活得更轻松，前者在1945年之后承担了大部分两德共同历史的负担，而这种说法却在为这一局面寻找借口。

现在是时候审查历史学家争论中的某些貌似正义凛然的言论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当时的左派也在走历史政治路线。两德分裂是为奥斯维辛付出的代价——当时虽没有历史学家发表过类似言论，且并非所有批评诺尔特的人都萌生过这种想法，但是在1989—1990年，君特·格拉斯为这一观点辩护时，他的说法其实在当时早已流行。^{〔5〕}德国分裂

147

〔4〕 August Wilhelm Schlegel, 《雅典娜神庙》, 第一卷第二本, 柏林, 1798年, 第196页。

〔5〕 Günter Grass, 《一个不爱国者的简短言论》, 哥廷根, 1997年, 第230—234页。

可以为纳粹罪行赎罪——没有人公开表达过这种看法，但它却有深厚的信仰基础，这种看法已成为联邦德国左派的弥天大谎，与其相对应的是右派力量的另一个弥天大谎：两德统一是联邦德国政治的首要目标。

1990年之后，左派谎言的影响依然存在，它变成了知识分子对统一德国的一种保留观点。而因为东德人不同于西德人，这种保留观点也愈发坚定：东德人没有机会形成“后民族”的自我意识，因此他们保留了传统的德国民族性，尽管这与社会主义的国际教条相悖。令很多老联邦德国左派人士不快的是，在两德统一的过程中，国家主权的提升也引发了一系列军事政治后果。在联合国和北约，统一后的德国要承担比1990年之前更多的责任。部分左派人士对此表示抗议，他们提出的理由几乎已不能单单用“历史政治”来定性。在发生新一轮民族屠杀时，以奥斯维辛来为这种太平洋德国特色道路赋予合法性：德国对波斯尼亚的看法令人不由想起病理学习法。〔6〕

148 要想理解这种现象，我们必须得承认：对诺尔特民族自辩修正主义的批判也有一定的消极面：关于纳粹大屠杀历史独一无二的观点是一把双刃剑。它有其合理之处，因为它能够防止人们将德国的反人类罪行相对化。但同时，它也衍生出了另一种后果，在强调犹太人大屠杀独特性的同时，其他国家的罪行（甚至包括种族灭绝罪行）也相应被低估了，这也

〔6〕 1995年，德国就是否应派兵参加北约波斯尼亚行动发生了一场大争论。1995年6月30日，经过投票，联邦议院以386对258的票数通过了这一提案。投赞成票的人中包括45个社民党人和4个绿党。

是另一种形式的相对化——它利用了犹太大屠杀，即使提出这种观点的是“左派人士”，也不能获得同情分。

直至今今天，左派人士依然强烈反对在两种独裁制度间进行比较，这两种制度即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他们甚至反对使用“独裁”这个概念。在德国这个亲历了两种独裁制度的国家，问题和命名的禁忌有着最牢固的根基。人们有理由抗议将褐色独裁和红色独裁相提并论。然而比较并不意味着相提并论，它的目的是找出两者间的共性和差异。在国际上，最早回顾整个世纪历史的著作是埃里克·霍布斯堡姆(Eric Hobsbawm)的《极端年代》和弗朗索瓦·弗雷的《幻想的终结》。这两本书均不是出自德国，而是出自英国和法国，这是一种偶然吗？即便在德国，这两本书也没有得到足够关注，其影响远远不如丹尼尔·格尔特哈根(Daniel Goldhagen)的《希特勒的热心执行者》(*Hitlers willige Vollstrecker*)。^[7]

东西德的左派禁忌话题当然不是德国缺乏类似霍布斯堡姆和弗雷这样的成功作品的唯一原因。回顾历史学家大争论，整个线索令人不寒而栗。1987年，诺尔特在他出版的《1917—1945年的欧洲内战》(*Der europäische Bürgerkrieg 1917—1945*)一书中(在书中他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那些观点)首次提出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互动关系的世纪问题，他还提出质疑，如果没有俄国的1917年十月革命，德国是不是也不会发生1933年

149

[7] Eric Hobsbawm, 《极端年代——20世纪世界史》，柏林，1996年。

一月事件。^{〔8〕}但是由于他的目的是为德国辩护，因此这一分析以失败告终。不仅是他的研究结果，甚至这一疑问本身在德国也被打入冷宫，因此这种观点只得转移到了英国和法国。

德国历史学家大争论的影响十分复杂。历史学界抵制了一次民族自辩的尝试，但他们自己却身陷在民族历史的视野中，而这正是那些挑衅者试图突破的界限。在这种民族自辩行为中，左派知识分子中的温和势力看到了一种靠拢西方思想的意图，他们因此成为了国家的中坚力量，换言之，成为了“后阿登纳左派”。几年之后人们发现，左派和老联邦德国的感情如此亲厚，以至于两德统一都成为了他们之间的障碍。

统一后的德国并不是重建的德意志帝国。它是一个民族国家，带有后古典主义风格，从一开始就和西方跨民族联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德国的第二次独裁统治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政权（虽然君特·格拉斯等人的观点恰恰相反），它最终退出了历史，德国也因而成为了统一的民主国家；此时德国历史又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在新的局面下，人们终于可以比较两种独裁制度，并将其纳入德国和欧洲的历史背景之中，而新的问题正是诞生在这种空间中。^{〔9〕}德国历史学家大争论的话题并未过时，只要我们将这些问题放入更大的框架中考察，就会有新的发现。

〔8〕 Ernst Nolte, 《1917—1945年的欧洲内战——纳粹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柏林，1987年。

〔9〕 Günter Grass, 《广阔的天地》，哥廷根，1995年（小说主人公是“Fonty”）。

德国的反思日

“命运日”是一个情感充沛的字眼，但用它来描述11月9日的德国却恰如其分。在20世纪的一百年中，有四件载入德国历史的大事都发生在这一天：1918年社民党人菲利普·舍德曼宣告德意志第一届共和国成立；1923年希特勒的慕尼黑政变失败；1938年纳粹党发起了全国范围的午夜犹太人大屠杀事件；1989年柏林墙倒塌。

1989年11月9日过后，有人提议将这一天定为德国国庆日。然而这一天其实是最不合作国庆日的。自从1938年火烧犹太教堂之后，德国人怎么还可能在11月9日欢度国庆？悲喜交集？这对致辞者和听众都是一种苛求。因此，将“德国统一日”定在每年的10月3日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一个

* 《犹太博览》，2003年11月6日。

正确的决定。1990年的10月3日，德国终于再度统一，结束了一个世纪的德国问题也由此得到了解决。从这一天起，德国的领土和边界等孰是孰非的问题都得到了最终确定。

151 11月9日已成为一个反思德国历史进程的日子，因此我们也无须刻意将它定为一个节日。1990年之后，德国终于实现了在自由中统一的理想，这也是19世纪自由党、民主党和社民党广阔运动的最终目标。到今日，还有谁记得那些曾积极参与这场运动的德国犹太人？约翰·雅克比（Johann Jacoby）、路德维希·班贝尔格和爱德瓦特·拉斯克是其中的三个代表，他们的名字已被深深铭刻进了德国历史。1848年革命一度雄心勃勃，力图同时实现德国的自由和统一，却未能成功，因为当时整个欧洲的保守顽固势力要远远超过运动者的力量。后来俾斯麦创建了帝国，以一种切实的“自上而下的革命”的方式为德国人赢得了民族统一。而直到1919年，德国在“一战”中战败后，才开始实行议会责任制政府。而这也从根本上为第一代德意志民主制——即魏玛共和国——埋下了祸根，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这种体制来自战胜国，因此并不具有“德意志色彩”。

因此，1918年11月9日从未发挥过积极的国家象征的影响。只有魏玛社民党和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党将这一天盛赞为迈向自由的关键一步，因为德国的帝制在这个日子被共和政体取代。1933年之后，德国人每年11月9日都要纪念16位纳粹党人，1923年这些人在希特勒进军“统帅堂”（Die Feldherrnhalle）的行动中被巴伐利亚州警察击毙。然而1938

年11月9日夜里，更多人惨遭不测，现在却被轻描淡写地称为“帝国水晶之夜”。在这一夜，至少有91名犹太人被纳粹党人残酷杀害，上百人自杀，或在集中营里受尽凌辱地死去。大屠杀之夜，纳粹将上万名家境殷实的犹太人送进了集中营，逼迫他们离境流亡，并将他们的财产洗劫一空。

非犹太德国人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真正意识到1938年11月9日代表的意义：它代表着纳粹彻底消灭德国犹太人的邪恶用心。这一“终极方案”——彻底灭绝欧洲犹太人——虽然此时还未最终敲定，但是水晶之夜事件已证明，剥夺政治权利和迫害行为很容易就会升级为大屠杀。

152

1938年的屠犹行为——1348年至1350年大瘟疫之后德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屠犹——并没有得到民众的支持，很多德国人反感纳粹对犹太教堂和商行的暴力行为，大多数德国人都明白，所谓的“众怒”不过是当局编造的借口。然而，并没有人抗议纳粹剥夺犹太人的“法律”权利，很多人从犹太财产的“雅利安化”运动中获利匪浅（今天仍有人在从中获利）。反犹太主义在当时甚至带有某种时髦色彩，前提是它带有“资产阶级的优雅气质”，不能太野蛮。

难道必须通过大屠杀这样的经验，才能在德国内外激起社会对反犹太主义的唾弃吗？听起来很可怕，然而种种迹象表明，事实的确如此。1945年之后的“历史大清算”依然伴随着很多矛盾和语焉不详之处。这场清算没有结束，且永远都不会结束。值得庆幸的是，“二战”之后，战败的德国没有重蹈“一战”的覆辙，沉浸在民族愤懑情绪中，它向西方民

主政治敞开了自己，当然这里指的是西德地区。直到 1989 年 11 月 9 日，柏林墙这座 20 世纪的巴士底狱倒塌之后，东德地区也终于实现了开放。

两德统一并没有导致德国内外曾一度担忧的局面，德国人并没有因此停止对近代历史的自我反省。当然，依然有人倒退到民族自辩的思路。例如，被驱逐者联盟要求在柏林建立一个“反驱逐中心”，这就是一种倒退，因为它会向德国内外传递这样一种信息：德国虽然是罪人，但本身也是受害者。

153 这其实就等同于质疑德国此前所有对历史的自我省察。此外，这种做法也会让欧盟成员国之间产生隔阂，因而阻碍欧洲的融合。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应是克服狭隘的民族视角，用长远的眼光共同面对欧洲过去与未来。德国要迎接这一挑战，这是我们从 20 世纪的灾难中吸取的经验教训。

解决两个世纪问题的艰辛道路

“二战”结束十年后，在1955年8月，阿棱斯巴赫（Al-lensbach）民意调查院从联邦德国挑选了一些市民代表，向他们提出了一个假设：如果苏联提出让德国永久放弃石勒苏益格、波莫瑞和东普鲁士，以此换取自由选举和统一，总理阿登纳应该选择接受还是拒绝？三分之二（67%）的受访者认为应该拒绝，只有十分之一（10%）的人认为可以接受。^{〔1〕}

由此可以推断，要想在1945年的边界范围内重新统一德国，会带来极大的风险，那就是极端民族主义。“一战”之后，正是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破坏了民主制度。1952年3月

* 2002年10月11日在布雷斯劳大学威利·布兰特德国和欧洲研究中心发表的报告，发表为：Heinrich August Winkler, *Polnische Befreiung und deutsche Vereinigung*（《波兰的解放和德国统一——两个世纪问题的艰难之路》），威利·布兰特讲座，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华沙办公室主编，华沙，2002年。

〔1〕 公共言论年鉴（=JÖM）3（1958—1964），第323页。

10 日斯大林的德国照会之后，人们对是否能自由和平地统一德国进行了持久的争论，在这些争论中，类似上文提到的民意调查基本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然而在德国东部边界的问题上，公众的意见却至关重要。20 世纪 50 年代的条件还不成熟，不足以在 1945 年边界范围内统一德国。如果不是因为西方大国没有找到足够的政治或军事理由拒绝斯大林的要求，仅仅是出于对一个合并后中立德国的民族主义的恐惧，就足以让德国人放弃统一的想法了。

直到接下来的十年，联邦德国才完全换了一种思路，触发这种思路转换的是 1961 年 8 月 13 日事件引发的震惊。建柏林墙为德国的分裂局面火上浇油，阿登纳的“强势政策”也没有推动统一的步伐。意识到这种现状之后，埃贡·巴尔——当时柏林媒体信息部主管以及市长布兰特的亲信下属之一——1963 年 7 月 16 日在图岑基督教学院的演说中提出“以接近求改变”的口号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2] 承认现实，以此达到改变现实的目的：柏林政府紧跟这一标语，奉行“小步政策”，促成了 1963 年至 1966 年通行证条约的签署。

20 世纪 60 年代的思维转换并不仅限于东西柏林、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之间的关系。1965 年 10 月 1 日，德国基督教理事会的公共责任部出版了一份题为《被驱逐者的情况以及德意志民族和东部邻国的关系》的研究报告集，书中的作者们要求对德国东方政策的基础，包括未来的东部边界，进行仔细

[2] Egon Bahr, 《我的时代》，慕尼黑，1996 年，第 152—154 页。

的审查和重新表述。他们认为，“单一片面地强调德国的权利立场”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要在德国民众当中以及对外创造一种氛围，以便为与东邻一步步和解创造条件。”〔3〕1965年12月5日，在第二次梵蒂冈宗教会议期间，德国主教们在对波兰主教们写于11月18日的一封信的回复中表示，他们应彼此谅解并相互原谅，以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克服战争带来的单方面后果，寻求让各方满意和公正的解决方案”。〔4〕

两年后，也就是1967年的11月，民意调查的结果第一次出现了变化，相对多数（46%对35%）的被访问者表示愿意接受奥德—尼斯河作为边界。〔5〕20世纪60年代的民意转变反映了多方面的因素：被驱逐者成功地融入了联邦德国的社会；新一代人特有的心态；1962年秋古巴危机解决，世界政治形势得到缓和。直到6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的党派仍一致认为德国东部的边界只能以和平条约的形式确定，而任何一种对奥德—尼斯边界的承认都将不在考虑范围内。社民党人在这个问题上也不例外：1964年11月，也就是布兰特当选党主席九个月后，社民党的党代会在卡尔斯鲁尔召开，会议室的正前方挂着一张1937年的德国地图，地图下写着“遗产和任务”。〔6〕

三年半之后，1968年的3月18日，布兰特——此时他

〔3〕 德国政治文件，系列4，第2卷（1965），第869—897页（896）。

〔4〕 同上，第973—976（975）页。

〔5〕 JÖM 5（1968—1973），第525页。

〔6〕 Kurt Klotzbach，《通往国家党派之路》，柏林，1982年，第569页。

已是大联盟政府的外交部长——作出了一次轰动性的转向。他在社民党纽伦堡的党代会上宣称，即使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实现统一、什么时候能签订和平条约的情况下，德意志民族也要与波兰人民和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承认并尊重奥德—尼斯边界，直到签署和平协定为止。”〔7〕虽然被驱逐者联盟和联盟党阵营对此表示了强烈抗议，但这也不能阻止这位外交部长在1969年（联邦议会选举年）5月在慕尼黑的一次演讲中再次强调上述观点：“我……在这里重申，我们愿意在任何时候与波兰政府就包括边界问题在内的放弃武力的声明进行谈判，这也是欧洲和平秩序的组成部分。我们有和谈的诚意，与波兰的和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使命。而且我也坚信，这个目标也会得到大多数被驱逐的德国同胞的认可。”〔8〕

157 对此，布兰特在1974年出版的回忆录《邂逅与明辨》（*Begegnung und Einsichten*）中谈到，作为大联盟政府的外交部长，这已是他能力范围内最大的让步了。他说得不错，如果与波兰建立外交关系，就意味着承认了奥德河和尼斯河的边界，以及对民主德国在某种方式上的承认。基民盟/基社盟不愿意作出这样的牺牲。1950年，有450万名德国人被从奥德河和尼斯河东部驱逐出来，他们生活在联邦德国和西柏林，构成了一个各党派争相拉拢的大票仓。如果将从前帝国外境德国聚居区的被驱逐者算在内，这一数字会增长到800

〔7〕 Willy Brandt, 《邂逅与明辨》，汉堡，1976年，第242页。

〔8〕 同上书，第243页。

万。^[9] 在 1969 年，谁要是敢表态承认奥德—尼斯边界，也就等于同意放弃前德意志帝国的东部领土，这样做委实需要冒极大的风险。

敢于表态支持的社民党人和自民党人当时虽然赢得了重要媒体的支持，包括汉堡的《明镜周刊》、《时代》和《明星》，以及两份跨区的日报《南德意志报》和《法兰克福评论报》。然而在 1969 年 9 月 28 日的第六次联邦议会选举上，各党票数却极为接近：社民党和自民党只比（选举总理必需的）绝对多数多出了 5 票。1969 年 10 月 21 日，布兰特以超出最少票数 4 票的结果当选联邦总理。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从此定下了方向。

1970 年 12 月 7 日，联邦总理布兰特和外长瓦尔特·舍尔签署《华沙条约》时，他们心里很明白，联邦德国的大多数人是支持自己的，但也有强大的少数派反对自己：那年 3 月的民调显示，58% 的人支持接受奥德—尼斯边界，25% 的人表示反对。^[10] 联邦德国和三个西方大国照会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德波边界的最终划定权留给和平条约。但双方都十分清楚，这一关于双边关系正常化基础的条约同时也肯定了德波领土边界的现状。正因为如此，它在两国关系中构成了一个重要拐点。布兰特在华沙“二战”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是一种对德国历史罪责的忏悔——这是 1945 年以来德

158

[9] Karl Dietrich Erdmann, 《世界战争时代》，两卷本，斯图加特，1976 年，第 808—809 页。

[10] JÖM 5 (1968—1973), 第 525 页。

国所有政治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忏悔。在华沙时，他对德国人发表了一番电视讲话，保证“该条约没有放弃任何东西，除了早已被输掉的”，而输掉它们的不是那些在联邦德国承担责任的人，“而是罪恶的纳粹政权。”〔11〕

在联邦德国内部，《东方条约》一直都备受争议——和《莫斯科条约》和《华沙条约》相比，与民主德国签订的《基础条约》的争议性更大。前两个条约于1972年5月17日在大多数基民盟/基社盟议员弃权的情况下以多数票通过。联邦德国签订的一系列《东方条约》为后来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前提：1975年，35个欧洲国家、美国和加拿大经过历时两年的商讨达成了一项广泛的协议，这就是《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也是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终签署的文件。这份决议文件承认现有边界的不可触犯性和不干涉签署国内政原则。对苏联而言，这意味着西方国家承认了苏联在东欧的霸权地位，但西方也从苏联手中换取了尊重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的承诺，其中包括思想自由、宗教自由、信仰自由以及对人员接触、信息交流的自由。这也是“社会主义阵营”为与西方交流而付出的代价。

159 1975年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推动了华约国家的公民权利运动：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使我们不把赫尔辛基视为触发之后十年历史发展的唯一原因，而这种发展完全改变了欧洲和世界面貌。而在波兰也发生了一个几乎具有同等重要性

〔11〕 德国政治文件6（1979/71），第263—265页。

的事件：1978年10月克拉科夫（Krakau）的红衣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Karol Wojtyla）当选为教皇。时隔二十五年后回首，考虑到他对世界的影响，我们把保罗二世当选教皇称为一次“教皇革命”也不为过，更确切地说，这是历史上的第二次教皇革命。

1931年，德国犹太籍大学者欧根·罗森施托克-胡塞（Eugen Rosenstock-Huessy）（当时是布雷斯劳大学的教授）在其《欧洲革命和民族特性》一书中，把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反对当时皇帝和国王的斗争称为一次“教皇革命”。在1075年的《教皇敕令》中——罗森施托克-胡塞将其称为“教皇革命”宣言，格里高利宣称自己拥有罢免世俗统治者的权力。^[12]但保罗二世没有这么做。1979年6月，保罗二世首次重回故乡时，他让共产主义国家意识到，在保留了天主教的波兰，他比政府拥有更广泛的支持。从教会的角度看，第二次“教皇革命”实际上是一次保守革命。它对世界的影响是一种自由精神。这种影响远远超出了波兰的范围，甚至也促进了东欧国家集团的垮台和瓦解。

如果不考虑此前一年教皇的造访，我们无法解释1980年9月“团结工联”的建立和10月的正式注册。在共产主义国家创建独立于党派的工会是不合逻辑的。列宁认为工会在共产党和劳动大众之间起着“传送带”的作用，也就是说工会只是党的一种权力工具。因此，1980年8月18日的但

[12] Eugen Rosenstock-Huessy, 《欧洲革命和民族特性》，斯图加特，1961年，第131—133页。

160 泽二十一条要求（团结工联的萌芽期）不啻于一封对“民主集权主义”的宣战书，而根据加入1920年8月6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要求，所有共产党都必须符合“民主集权主义”的特征。共产国际虽然在1943年形式上瓦解，“民主集权主义”却得到了保留，与它并行的还有工会从属党派的硬性规定。因此，1980年夏的波兰事件也具有一定的革命（在正统“马列主义者”看来是反革命）性质。

波兰当时进入的“双重统治”状态不可能长久存在。新工会的自由特征和国家暴力的独裁特征之间的矛盾急需某种解决方案。这一“权力问题”迟早要得到澄清。1980年时人们还无法预见苏联会如何处理波兰的危机。

20世纪80年代初的波兰事件在联邦德国引起了十分复杂的反响。首先，波兰人对自由的追求引起了德国人的同情，然而在同情的同时，部分社民党人心中也泛起了一丝不安：这个新的独立工会表现既不走左派也不走社会主义路线，它是民族的，是天主教式的——完全不同于人们设想的“进步”工人运动。相较于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已然流传着很多古老偏见：波兰的罢工一直被视为缺乏管教，甚至是消极怠工的表现。很明显，统治阶级和民众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

161 波兰的冲突越激化，东西两德也越担心波兰的内战和混乱将会引发一系列国际后果。如果波兰彻底失控，苏联与其他华约国像1968年介入捷克斯洛伐克一样介入波兰，会对东西方关系产生剧烈影响。1980年2月，苏联红军开进阿富

汗两个月后，法国总统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和德国总理赫尔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警告说，当前的缓和态势将经受不了“第二次同样的打击”。^[13]如果苏联武力介入波兰，那就将造成“第二次打击”；而缓和政策如果中断，在整个欧洲，除了波兰之外，东西德国将会成为损失最大的国家。毕竟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是通过缓和政策才达成了一种“暂时妥协”，也就是在“人道的放松状态”下实现的有限合作。

当1981年12月13日波兰党主席兼政府首脑雅鲁泽尔斯基（Jaruzelski）颁布《战争法》时，联邦德国内部的反应混杂了恐惧和释然——恐惧是因为此事的后果难以预计，释然是因为与苏联的军事介入相比，波兰内部的危机解决方案更容易被人接受。社民党的联邦总理施密特这时正在柏林北部的舒尔夫海德（Schorfheide）与民主德国社会党总书记、国家主席昂纳克会谈；1983年12月13日他还在电视采访中声称：“事态走到如此无奈的一步，昂纳克先生和我一样震惊。”^[14]然而不久之后施密特就自打嘴巴：12月18日他在联邦议会前表达了对波兰工人的同情，并要求尽快撤销《战争法》。

几周前——1981年10月末至11月初，社民党东方政策的真正推手埃贡·巴尔接受了罗沃尔特出版社两位采访人的采访，他们想整理出版巴尔对德国乃至世界局势的见解。采访中，巴尔提出了自己对“共同安全”必要性的观念——无

[13] Heinrich August Winkler,《通往西方的漫漫长路》，慕尼黑，2005年，第358页。

[14] 同上书，第383—384页。

论是苏联和民主德国，还是美国和联邦德国都从未产生过这一想法。然而巴尔深信，“世上只有共同的安全……要与敌对方、盟友、各国领导共享安全。我们已不可能感到单方面的安全。安全只能是共同感受。考虑到我们当前的形势：联邦德国只能与民主德国共同安全。否则我们只能用另一种方案来解决德国问题：在共同灭亡中统一。”

两位采访者对巴尔的结论是这样理解的：在他看来，“从这种观念和这种安全感出发，在情不得已时可以牺牲波兰自主历史未来的权利，而且——如果波兰在华约中的成员国地位受到质疑——为了维持您强调的这种稳定性，可以且必须采取这一措施。”

巴尔对这种推论表示肯定，“当然。我们已经认定维护和平的利益高于国家的自主权。对波兰人也不例外。波兰人的民族雄心也要服务于维护和平的利益。我希望联邦德国做到这一点，也希望美国做到这一点。在这个最高的目标之下，民族、国家才能获得自我发展的空间，这也是他们的义务。”^[15] 巴尔的安全政治论出版成书时，《战争法》已经在波兰实行了一个季度。事实上，介入波兰事务的不是苏联，而是波兰党和政府主席，同时也是军委主席；他在知会莫斯科之后采取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政策，在强硬路线的代表（包括昂纳克在内）看来，这种政策对所有华约成员国都是一种威胁。

巴尔所提出的不仅是他个人的观点。其他的社民党人也

[15] Egon Bahr, 《德国人会变成什么样?——提问和回答》, 莱贝克, 1982年, 第22—23页。

有类似的想法。君特·高斯（Günter Gaus）直到1981年初一直是联邦德国的民德常驻代表处主任，1982年1月他在《时代》中写道，承认欧洲现状是“对语言极端主义的必要拒绝，语言极端主义迎合的是危险的骤变和一种以对手的失败为目标的渐变。而西欧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东欧——反之亦然。”^[16]

社民党人间或也会提到纳粹的罪行，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对《战争法》和关押工会成员以及知识分子行为的抗议相对比较保守。社民党主席布兰特在1982年2月接受《时代》采访时，话题谈论到了法国批评他对波兰战争法的态度过于温和，他对此的解释是：“一个德国人在波兰关押营的问题上表现得很谨慎，是有其原因的。因为一旦他谈到这个问题，别人就会质问他：以前在波兰集中营里都发生过什么？而法国人却没有这种历史牵连带来的谨小慎微。”^[17]

20世纪70年代，社会自由精神的东方政策追求欧洲的和平保障，力图在人道上减轻各国负担（主要是分裂中的德国）。1975年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为尊重人权赋予了与边界不可侵犯几乎同等重要的地位。到了80年代，逐渐退出军备竞赛成为了社民党人的首要任务，而对人权的追求则居次要位置。1980年1月，社民党联邦议员卡斯滕·佛克特（Karsten Voigt）首次提出“东方政策第二阶段”，其中也贯穿

[16] 《君特·高斯、波兰、西方联盟或是对缓和政策的支持？》载《为波兰负责？》，莱贝克，1982年，第109—118页。

[17] 《缓和而不冷淡》（采访威利·布兰特），载《时代》，1982年2月5日。

着“共同安全”的精神。〔18〕

164 从军备政策角度看，这是一个必要的目标，但作为外交目标还有所欠缺。华约国家的自由并不属于社民党安全章程中的内容，因此反倒经常被看做是不稳定因素。在一些观察家看来，80年代社民党的东方政策与复辟和前三月（Vormärz）期间奥地利国家总理梅特尼西采取的稳定政策颇有相似之处。〔19〕符合德国利益的欧洲秩序政策：这其实才是社民党外交和安全政策策划者巴尔的设想。1982年社民党下台后，与执政的共产党协商签订的安全合约不仅是一种与官方政策对立的“次要外交政策”，它们同时也说明，社民党缺乏对现实的认识，在党派立足的核心价值观观念上，他们也缺乏敏感度。

波兰的自由主义运动能挺过《战争法》，首先要归功于运动本身的毅力和坚持。1985年之后，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发生政治转向，为波兰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所有苏联的欧洲盟友中，波兰是最先在划时代的1989年脱离共产党独裁的国家。当联邦德国几乎已经没人相信两德能统一的时候，波兰的布罗尼斯瓦夫·盖雷梅克（Bronislaw Geremek）和亚当·米奇林克（Adam Michnik）等知识分子却表态支持德国统一。而直到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西德人才开始慢慢相信，两个德国的统一不久将成为政治可能，甚至会成为政治必然。

〔18〕 Karsten Voigt,《缓缓退出军备竞赛》，载《新社会》27（1980），第47—51页。

〔19〕 Heinrich August Winkler,《社民党何去何从》，载《时代》，1983年2月2日。

统一的一个前提是——在现实主义者看来，这是不容置疑的，德国要在国际法上最终承认奥德—尼斯边界。科尔对此不怀任何疑虑，他比多数社民党人更早意识到了两德统一的机会，因此也一直以这个目标来推行他的政策。但出于内政方面的原因，即考虑到联盟党选民中被驱逐的德国人，他一直到最后时刻才对德国 1945 年东部边界的表态承认。尽管西方盟友、自由党外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尔（Hans-Dietrich Genscher）和在野的社民党和绿党的一直大力催促，他还是将这条底线坚持到了 1990 年。 165

直到 1990 年 3 月 8 日，民主德国人民议会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自由选举前 10 天，联邦议员才通过一项议案，表示支持两个德国议会关于德波边界的相同决议。文件向波兰人民保证，“德国在现在和未来都不会以领土权的借口质疑波兰人安全生活在本国界内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两德合并之后，统一后的德国政府还要和波兰政府签订一份边界问题的条约。^[20]

1990 年 6 月 21 日，联邦议会和人民议院通过了相同决议。在“二加四谈判”上，两个德国与四个“对完整德国负有责任的”大国达成协议，1990 年 7 月 17 日两德在巴黎与波兰达成共识，在两德统一、德国主权重建后最短的期限内签署边境条约，并提交统一德国议会批准。1990 年 10 月 3 日，两德统一，德国重新获得了主权。六周之后，1990 年

[20] 当代档案馆 6 (1990)，第 34305—34306 页。

11月14日，德波外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尔和克尔泽斯托夫·斯库比斯泽夫斯基(Krzysztof Skubiszewski)在华沙签署了边境条约，并将该条约与睦邻友好和合作条约一起提交议会批准。1991年11月7日，联邦议院批准通过，波兰议院于一天后批准。

166 1990年10月3日标志着两个世纪问题的解决：德国问题和波兰问题。从重新统一这一天起，德国的领土和边界等孰是孰非的问题都得到了最终确定。德国在国际法上承认德国与波兰之间的奥德河和尼斯河边界是实现统一的前提之一。而正因如此，1990年10月3日也代表着波兰问题的最终解决。在德国重新统一之时，已没有人对确定1945年的边界表示反对。40多年的分裂使人们认识到，要想重新统一德意志帝国剩余的领土，放弃帝国东部是必需的条件。难道只有在经历了分裂之后，德国才能真正理解这一点吗？我们很难回答“是”。然而种种迹象表明，现实就是这样。

波兰的分裂时间要比德国长得多。两个德意志大国，普鲁士和奥地利，是波兰分裂的肇事者和受益者。普鲁士的崛起与波兰的衰弱脱不开干系。盟国管制委员会正式解散普鲁士时，由俾斯麦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已经不复存在。波兰的分裂发生在18世纪下半叶，自此之后，德国和波兰的关系一直困难重重。即使波兰在1918年建立起一个民族国家之后，两国的关系也没有好转，魏玛共和国认为这个国家是非法的。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国方面就已经出现了解散波兰政府的呼声。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像波兰那样，受到德国纳粹如此

残酷的迫害。将人民驱离家乡是不公平的，这一点也适用于1945年之后被驱离家乡的德国人。但是德国人只要谈起自己被驱离家乡的遭遇，就必须承认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

1945年过去很久之后，德国才渐渐开始认识到，德国分裂的深层原因是德国政策和德国罪责。这种认识的形成对抵制新德意志民族主义是十分必要的条件。有时，这种正确的认识自然也会带有世俗历史神学的色彩，得出这样的结论：167
鉴于德国人以德国的名义在“二战”中犯下的罪行，德国应永远处于分裂状态。

分裂的德国为奥斯维辛赎罪：在德国左派和新教徒中（无论是联邦德国还是民主德国），这种观点一度得到普遍认可。当“和平革命”还在民主德国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勃兰特就多次坚决反驳了这种说法。1989年12月18日是他的76岁生日，在这天的社民党柏林党代会上，他宣称：“一个民族的罪责再严重，也不能判决他们以无限期的分裂来偿还。”^[21]现在，德国的分裂已经弥合，但德国的罪责还没有尽偿，也无法尽偿。如果德国人在当前想要负责的行为，这种罪责就是他们必须面对的历史的一部分。

没有波兰的自我解放就不会有德国的重新统一：从这个意义上看，德国问题和波兰问题的解决之间也存在着关联。波兰人的自由斗争最终在1989年取得胜利，它是“和平革命”的开端，并在同年秋天传到民主德国，最后在1990年

[21] Willy Brandt, 《关于德国》, 波恩, 1993年第2版, 第62页。

秋以两德统一胜利告终。德国人完全有理由对波兰人感恩。随着 1990 年 10 月 3 日的到来，德国和波兰的关系也掀开了一个新的篇章。新的开端不仅对这两个国家至关重要，也关系到两国都在致力推动的欧洲统一大业。

欧洲形成极端世纪共识的漫长道路

2004年的5月1日必将载入史册：这在今天已经是确信无疑的事。从这一天起，虽然并非所有的欧洲国家都统一在了欧盟的框架中，但原来属于古老西方——历史中的西方——的国家几乎都加入了进来。所谓的古老西方，指的就是中世纪时期以罗马为宗教中心的欧洲部分，即原来的拉丁欧洲，或西教廷的欧洲。

这部分欧洲有着基本共同的法制传统，起源于城市法的传播、教会法和对罗马法的继承。只有这部分欧洲国家早在中世纪就经历了两次早期权力分立：一次是授职斗争

* Bernd Kauffmann/Basil Kerski (主编): *Antisemitismus und Erinnerungskulturen im post-kommunistischen Europa* (《后共产主义欧洲的反犹主义和记忆文化》), 奥斯纳布吕克, 2006年, 第105—116页。缩减版刊登在2005年7月14日的《法兰克福评论报》上。

中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分离，另一次是贵族权力和平民权力的分离。虽然这些距离孟德斯鸠意义上的现代分权模式——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分立——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离议会代表制民主则更遥远，但如果没有持续几个世纪的分权进程，也就不会出现我们今天所说的“西方政治文化”。

在这个共同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创建一种欧洲的“集体”情感，一种共同归属和团结互助的意识。欧盟如要坚决贯彻政治联盟计划，这种历史性、规范性的基础正是它的立足点。政治联盟需要凝合那些支撑着西方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对这些核心价值的起源、发展和传播进行思考。

169 然而，仅仅巩固西方承认和遵守的标准是远远不够的。创建开明的“集体感”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对历史进行自我批判式的梳理，即使这种历史是对西方价值的排斥史。并不是所有将欧洲国家联结在一起的传统都是“美”、“善”的伟大文化功绩。欧洲的共性之中，也有很多与我们经常称颂的欧洲遗产格格不入之处。

19世纪的“现代反犹太主义”并不是新现象，它继承了一直持续到中世纪晚期的基督教对犹太民族的敌意，并对这种传统进行了重申、世俗化和极端化，这是欧洲阴暗面中最为可怕的一部分。

而民族主义也属于这种阴暗面的一部分。“民族性的存在，是欧洲的欧洲性的历史体现”，这是大约半个世纪前历史

学家赫尔曼·黑培尔（Hermann Heimpel）说的一句话。^{〔1〕}这一评语很得当，但还需补充一点：现代民族主义也是欧洲的发明。

民族主义的影响体现在各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历史观中。西欧人在1945年后为统一各国历史观所做的努力，还远远不是整个欧洲的共识。第一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的大洪荒”：这一由美国历史学家、外交官乔治·F. 肯南（George F. Kennan）在1979年提出的论断，在西欧基本得到了普遍认同。^{〔2〕}然而波兰这样的国家却未必认可这一说法，原因是他们因为“二战”才获得了独立。原则上，中东欧很多国家对“一战”的看法都与波兰相似，这些国家都是在1918年以后才获得独立身份。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的统一运动，是欧洲对民族主义（首当其冲的是德国的民族主义）摧毁性力量的反应。然而脱离了纳粹统治之后，只有欧洲的一部分地区（西欧）获得了政治自由。1945年2月美英苏的雅尔塔会议导致新分界线以东的区域直到四十五年以后才享受到自由和民主。因此，最初参与欧盟的25个国家在1945年之后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历史境遇。2004年新加入的十国中有八国直到1989—1990年还在实行共产主义统治。因此，对于被霍布斯堡姆称为“极端年代”的20世纪，这些国家有着与欧盟“老成员”

170

〔1〕 Hermann Heimpel, 《德国历史草案》，载《当代的人》，哥廷根，1957年第2版，第162—195（173）页。

〔2〕 George F. Kennan, 《俾斯麦体系的瓦解》，法兰克福，1981年，第12页。

完全不同的看法，^{〔3〕}因为这些“老成员”在1945年前后早已成为民主国家。

当然，“老成员”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在第三帝国垮台时，那些深受纳粹统治之害的国家首先感到如释重负。而大多数德国人在国家彻底垮台时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崩溃”而不是“解放”。在西德，解放的感受是在重获内政自由的时候才慢慢产生的。要让德国官方承认1945年5月8日是德国的解放日，还要等到四十年后的1985年5月8日，即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的那次演讲。这位来自基督教民主联盟党的国家首脑说出了他的前任从未如此坦诚表白的一席话：战争的结束并不是逃亡、驱逐和不自由的原因。“原因更多地存在于战争的开端，以及导致这场战争的暴力统治的开端。我们不能将1945年5月8日与1933年1月30日分开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将1945年5月8日看成德国历史迷途的终结，它是为美好的未来播种的一天。”^{〔4〕}

171 当然，即便联邦总统也无法铲除对德国历史的民族自辩思维。在整整一年之后的1986年6月6日，《法兰克福汇报》以《不愿过去的过去》为题发表一篇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的文章。诺尔特在文中没有提到联邦总统，但否定了总统的犹太人大屠杀“史无前例”的论断。在诺尔特看来，

〔3〕 Eric Hobsbawm,《极端年代——20世纪世界史》，慕尼黑，1995年。

〔4〕 Richard von Weizsäcker,《1945年5月8日——40年后》，载《德国视角》，柏林，1985年，第2—36（15—16）页。

纳粹的种族屠杀是布尔什维克阶级屠杀这一“先例”的糟糕翻版，两者间有“逻辑和事实上的承继关系”。将犹太人大屠杀理解为纳粹党对“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假想防卫：这位柏林教授的意图其实是要为希特勒和德国人开脱。^{〔5〕}

诺尔特发表于1986年6月的文章引发了一场“历史学家大争论”，这场争论并没有催生出新的科学认知，但对联邦德国的政治文化却有重要影响。哈贝马斯在这里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一篇回应诺尔特的文章中（刊发在1986年7月2日的《时代》上），哈贝马斯批评这位历史学家道，“我们的过去有幸被去道德化了”，但他却试图抛弃“这种过去的抵押品”，让联邦德国在精神上背离西方。“联邦德国向西方政治文化毫无保留的开放，是我们战后取得的伟大思想功绩，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骄傲。……唯一能让我们不背离西方的爱国主义是宪法爱国主义。可惜的是，在德意志文化民族中，这种对普世宪法原则的坚定信仰在奥斯维辛之后才形成，或者说是因为奥斯维辛才产生……谁要是呼吁德国人回归传统的民族身份，那就破坏了我们与西方之间唯一的坚实纽带。”^{〔6〕}

在批判诺尔特为历史开脱观点的过程中，德国形成了一种“后阿登纳左派”式的阵营。他们的发言人将曾经严厉批

172

〔5〕 Ernst Nolte, 《不愿过去的过去》，载《历史学家大争论》，慕尼黑，1987年，第39—47（45）页。

〔6〕 Jürgen Habermas, 《一种对伤害的处理方式》，同上书，第62—76（75—76）页。

自己的功绩。在这种方式下，德国的确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左派或者左倾自由派联邦共和式宪法爱国主义，这虽然不是什么国家理论，却是许多精英阶层和政治家的切身感受，尤其是在民主党和绿党人士当中。他们认为联邦德国创造了欧洲第一个后民族国家形式的民主，因此它应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那些还未认识到民族国家形式即将过时的国家。“后阿登纳左派”最经典的自我表述体现在奥斯卡·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1988年题为《未来社会》的这本书中。该书的一个核心论点是：正是因为德国人“因为变态的民族主义有过最可怕的经验”，因此“他们注定将在欧洲超民族统一进程中担当核心角色。”〔7〕因为变态而注定：在联邦德国之外，这种基督教早期的“苦其筋骨而天降大任”思想并没有得到多少赞同。

1989年秋，民主德国的“和平革命”突然将“德国问题”再次推到国际政治的日程上时，德国历史的后民族观点也遭到了一次严厉考验。与联邦德国不同，民主德国从德国新近历史中得出的教训不是“反集权”，而是“反法西斯”的，这是为了服务于共产主义一党专政的建立和维护。因此在1989年之前，东德人根本不可能向西方政治文化开放。部分西德左派人士也因此极度怀疑两德统一的后果：他们担心不但无法将东德西化，反而致使西德被东化，并由此倒退到人们认为已经克服的民族主义思维中。

〔7〕 Oskar Lafontaine, 《未来社会——全新社会中的改革政策》，汉堡，1988年，第188—189页。

两德统一后，西德并没有被东德同化，然而同化东德却花费了比1990年乐观派的预测更长久的时间。德国民族主义的复兴自然无从说起，而“后民族国家”梦想也因此破灭。除了西欧的老牌民族国家，许多新建的中东欧民族国家都不愿意消失在欧洲联邦中。联邦德国很早就意识到，欧洲不能建立在与民族国家的对立之上，而要与民族国家一起建立，要通过它们来建立。加入欧盟的是后古典主义的民族国家，它们是欧盟作为超国家体存在的前提，他们愿意与其他国家共享自己的部分主权，或将其让渡给欧盟处理。

与德国统一形成对比的是，欧盟东扩的进程没有伴随着精英知识阶层的讨论——由此也可以看出，我们还远远没有形成一个欧洲范围的公众舆论。只有在德国，10个新成员国加入欧盟前不久，一桩2004年3月24日发生在莱比锡书展上的事件引起了人们短暂的关注。曾经的拉脱维亚女外长、现在的欧盟委员桑德拉·卡尔尼特（Sandra Kalniete）在这天的演讲中指出，1945年“纳粹瘟疫”结束后，“恐怖在欧洲的另一半继续蔓延，在铁幕的另一侧，苏联还在继续迫害和灭绝东欧以及自己的民族。欧洲历史在我们缺席的情况下书写了五十年，这是一种成王败寇的历史书写。直到铁幕倒下，研究者才最终有机会接触档案资料和受害者的经历；他们的考察证实，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集权统治在罪恶程度上不相上下。”〔8〕

〔8〕 http://www.dieunion.de/reden/alten_neues_europa.htm.

“罪恶程度不相上下”：这几个字眼让德国犹太人中心协会副主席所罗门·克尔恩（Salomon Korn）抗议性地离开了大厅。在接受《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 Volkszeitung*）采访时他称，将苏联和纳粹的罪行等同起来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卡尔尼特女士对两种罪行都使用了“种族屠杀”的概念，这就掩盖了“巴尔干国家是纳粹帮凶的事实。她很显然没好好反省自己民族的过去。这正是我担心的：巴尔干以及波兰尚未反省的反犹主义在欧盟扩展过程中被引入欧洲”。〔9〕

莱比锡事件让某些评论家立刻联想起了1986年的历史学家大争论。〔10〕桑德拉·卡尔尼特虽然没有像诺尔特那样试图将古拉格群岛称为犹太大屠杀的先例，却将纳粹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与苏联对东欧民族的所作所为等同了起来。对于这两种行为，卡尔尼特使用的字眼都是“灭绝”，然而灭绝针对的某一种族群体的全体，因此只有犹太人遭遇的不幸才符合它的意思。克尔恩的另一条指责也有根有据：“二战”期间，在对拉脱维亚犹太人的屠杀过程中，很多拉脱维亚人都扮演了帮凶角色，而这位拉脱维亚女外长却回避了这一点，虽然她自己也是苏联驱逐政策的受害者。相反，拉脱维亚国家主席在2005年5月却毫无保留地坦诚了这一点：“在我的国家拉脱维亚，德国纳粹和当地的同谋者犯下了最

〔9〕 Salomon Korn,《担心东欧的反犹主义》，载《莱比锡人民报》，2004年3月26日。

〔10〕《对历史学家大争论的联想》，载《南德意志报》，2004年3月25日。

为可耻的反人类罪行，这在拉脱维亚的领土上是史无前例的。”^[11]

因此，针对这位三个巴尔干共和国之一的女代表在2004年3月提出的对本民族和所有巴尔干民族遭遇的回忆方式，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进行反驳。然而她的这种回忆也是合理和必然的。她认为，“欧洲历史在我们缺席的情况下书写了五十年”，这一点我们无法反驳。她要求将失败者也写进历史当中，否则历史将会是“片面、不完整和不公正的”^[12]，说这句话时，历史的公正性也站在她的身后。

175

有几位批评家对2004年3月事件感到不满的是，拉脱维亚女外长使用了“极权”这个概念，用它来指纳粹统治以及苏联共产党统治。他们认为，“极权”这一概念没有任何解释的功能，仅仅是道德谴责；克里斯蒂安·瑟姆勒(Christian Semler)在《日报》上谈道：人们抽象地将“极权”定义为自由民主标准的对立面。^[13]还有一种比较通俗，但也有道理的说法：“红色”不等于“褐色”，然而这只能证明，极权论是一种非常模糊、缺乏启发性的理论。“极权”是韦伯提出的一个理想型：“极权的产生过程是，某一个或某一些观点脱群而出，节节升级，吸收其他那些模糊、隐晦、分散不定的单个现象也加入到自己当中，并最终形成内部统一

[11] Vaira Vike-Freiberga, 《俄国能从德国学到什么》，载《每日明镜》2005年5月6日。

[12] Sandra Kalniete的言论(见注8)。

[13] Christian Semler, 《拉脱维亚历史政治》，载《日报》，2004年3月26日。

的思想体系。”〔14〕

“极权”作为“冷战”的政治斗争概念已经成为过去，对立民主和“极权”也已不再能撞出思想火花。而学术界对“极权”的使用一直有着另一种维度：它被用于界定 20 世纪新出现的建立在欢呼和恐怖之上的独裁统治，并用它来区别于从前的独裁统治方式，例如军事独裁。

176 从前的独裁并不会将注意力放在“整个人”身上，强制性地创造出一个“新人”。而对新的独裁统治而言，这是不可或缺的手段。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在法西斯纳粹独裁和共产主义独裁之间进行一番比较，当然这里的比较不是等同，而是找出它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1960 年，政治学家理查德·罗文塔尔在一篇关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化的论文中提出一个观点：德国共产党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亦步亦趋说明，他们已经放弃了革命政治的一个关键前提，即组织上的独立性。作为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的工具，德国共产党需要创造一种完全不同于布尔什维克的政党类型，因此它变成了一个“次级极权政党”。〔15〕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将 1945 年之后在欧洲建立的共产党统治——考虑到它们受制于苏联的程度——都称为“次级极权体系”：它们都建立在从斯大林“大清洗”恐怖中诞生

〔14〕 Max Weber,《社会科学认知的“客观性”》，载《社会学——世界史的分析》，斯图加特，1956 年，第 186—262 (235) 页。

〔15〕 Richard Löwenthal,《斯巴达社团的布尔什维主义》，伦敦，1960 年，第 23—71 页。

的苏联模式的基础之上。到了1965年勃列日涅夫上台时，罗文塔尔得出的结论是，赫鲁晓夫统治时期苏联的极权统治已经失去活力，但极权统治的机构却被确定了下来。^[16]

苏联和那些依附于苏联的国家的情况一脉相承。20世纪80年代在波兰和匈牙利、1985年后在戈尔巴乔夫统治下的苏联发生的事件，其实都是一种“去极权化”。如果使用极权统治这个静态的概念无法描述这个渐变过程，而实践韦伯派学者罗文塔尔的灵活运用显然更合适。

比起对“极权”概念内涵的争论，欧盟自东扩以来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更值得关注：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盟的成员国的经历千差万别，应该如何解决他们在欧盟中的“共存”问题？在一篇纪念“二战”结束六十周年的文章177中，前波兰驻德国大使、后来的华沙国际关系中心主席亚努茨·莱特纳（Janusz Reiter）简洁地描述了这其中的问题：“在其文化记忆中，统一的欧洲大陆仍然是分裂的。东扩之后这条分割线从中间穿过了欧盟。对于欧盟中的西欧国家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经验。”^[17]

2005年5月9日的莫斯科庆祝活动显示了这种分裂记忆的政治能量。苏联对巴尔干地区以及其他中东欧国家的控制一直影响到今天。在这几年中，俄罗斯在历史政治上试图为

[16] Richard Löwenthal, 《论俄国革命的熄灭》，载《世界政治观察》，哥廷根，1983年，第95—109页。

[17] Janusz Reiter, 《联合欧洲中的分裂记忆》，载《法兰克福汇报》，2005年5月7日。

希特勒—斯大林的协定辩护，否认自己曾违反国际法占领巴尔干三国的¹事实，并以“伟大的爱国战争”来宣扬斯大林的功绩，这使欧盟的新成员国深感不安；而老成员国对俄罗斯民族主义和独裁主义势力抬头引发的剧变几乎无动于衷。巴黎和柏林政府的对俄政策基本以经济利益和所谓的地域政治利益为导向。他们对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和波兰人的担忧也毫无表示。西欧人一直将表示同情和团结的任务交给美国总统。而随着欧盟的东扩，这种西方内部的分工将导致鸿沟越来越深。

178 欧盟扩张的速度远远超过其深化的速度。宪法条约本应促进欧盟的深化，但遭到了法国和荷兰的否决，英国政府则认为“时机未到”，因此这一工作目前暂告失败。宪法条约力图以最小的机构改革使 25 个成员国的欧盟获得行动能力，同时也要为成员国提供最大幅度的融合空间，这也是这些国家的意愿。无论宪法条约的核心理念能得到多大程度的实现，要真正深化欧盟，单单进行决策程序和机构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能在共同的欧洲历史观（早期和近期）上达成一致，根本无法达到深化欧盟的目标。

对于欧盟老成员国，20 世纪的历史意味着再现、体会中欧和东欧人在 1945 年之后被迫经历的独裁、受制、占领和吞并。而那些新成员国——以及其他国家——要找到一种共同的回忆，他们还得对本国同胞参与谋杀欧洲犹太人的往事进行清算。这一由纳粹德国组织的种族屠杀是 20 世纪的反人类罪行，任何国家的过错都不能与它相提并论。

“向西方政治文化毫无保留地开放”^[18]，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是西德在战后所取得的伟大思想成就。中欧和东欧国家属于古老西方的一部分，他们更容易全盘接受西方民主制度；而东南欧那些东正教传统的国家直到1990年还在由共产党执政，它们通往西方的道路会更加漫长。

因此，在进一步扩张之前，欧盟应细心领会约尔格·瑟姆普鲁恩（Jorge Semprún）（曾经被关押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2005年4月10日在集中营解放六十周年的纪念会上所说的一番话：“给欧洲统一的未来——更确切地说是重新统一——铺路的最有效办法在于，我们应彼此分享过去，融合我们的回忆，统一我们四分五裂的记忆。10个新加入欧盟的中欧和东欧地区国家属于欧洲的另一个部分，他们曾经遭受了苏联的极权主义统治，这些国家要在文化上和生存上真正融入欧洲，需要等到我们能够相互分享和统一记忆的时候。”^[19] 179

瑟姆普鲁恩提出的要求，其实是要我们抛弃技术专家式的简便型政治理念。我们不能掏空欧洲的历史和典范内涵，这完全违背了1945年之后欧洲统一运动的理想。一个没有“集体感”支撑的欧盟会变成一盘散沙，并会让民族主义重新抬头。德国必须要以创建共同的欧洲记忆为己任，第一个原因是德国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欧洲的分裂；第二个原因是1945年之后，两德分裂的经验使德国人也体会到了西欧人和中东欧人的感受。在这种背景下，德国面临着最大的挑战。

[18] Habermas, 《一种对伤害的处理方式》，第75页。

[19] Jorge Semprún, 《谁也不会再多说》，载《时代》，2005年4月14日。

二十 什么是西方价值共同体？*

(一)

我们几乎每天都会听到或读到“价值共同体”这个词。它有时指欧盟，有时又指西方。虽然这个艰涩概念的含义非常复杂，却很少有人对它进行解释。下面我就试着来解释一下这个概念。我会通过三个论点以及相应的论据分步解释这个概念。第一个论点是：没有欧洲价值，只有西方价值。该说法虽然与欧盟的官方口径相左，然而看一眼历史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地理意义上经常被引用的欧洲指的是“从大洋洲到乌拉尔的欧洲”，这个欧洲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价值共同体。当我们说欧盟是一个价值共同体时，我们指的是（不论我们自身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一个承认西方价值的国家共同体。关于欧洲和

* 2007年2月14日告别柏林洪堡大学的讲座。完整版发表在《国际政治》62(2007)，4月版，第66—85页；缩减版发表在2007年2月22日的《时代》上。

西方的区别，没有人比维也纳历史学家格拉尔特·施图尔茨 (Gerald Stourzh) 说得更简明扼要：“欧洲不（仅）是西方，西方不只是欧洲，欧洲也不只是西方。”^{〔1〕}按照各国自己的理解，作为价值共同体的西方包含北美大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民主国家，即美国、加拿大，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 1948 年建国的以色列。相反，在我们惯称的典型“西方”价值和机构的形成和贯彻问题上，欧洲的很多地区都不被包括在内。

我们在冷战期间使用的“西方” (Westen) 概念与历史上的古西方 (Okzident) 概念并不相同。在 1945 年后东西方对峙 181 背景下，大西洋联盟的所有成员国——包括希腊和土耳其这些曾经不属于古西方的国家——都被当成西方。另外，历史上曾经属于西方、由于这时落在铁幕的另一边的国家全被归入了东方（或者东欧）：三个巴尔干国家、波兰，现在的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也就是 2004 年 5 月 1 日加入欧盟的八个中东欧国家中的七个。第八个欧盟新成员是斯洛文尼亚，它在 1991 年之前是隶属于南斯拉夫的一个共和国。

所谓的古代西方 (der alte Westen)，指的是中世纪时期（在某些国家一直到中世纪以后很长时间中）以罗马为宗教中心的那部分欧洲，属西教廷区。只有这部分欧洲经历了两次现代之前的分权形式，第一次是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分离，第二次是贵族权力和平民权力的分离；而只有在这部分欧洲——虽然在程度上有所不一——发生了中世纪晚期和近

〔1〕 Gerald Stourzh, 《接近欧洲历史书写》，维也纳，2002 年，第 11 页。

代早期的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解放运动、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东教廷的拜占庭和后来的莫斯科虽然没有出现人们常说的“政教合一”——即将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统一在一个人身上，但宗教权力却被归属到世俗权力之下。东方也没有欧洲封建制度中典型的君臣互忠的传统，这种传统在后来的贵族和平民二元对立中得到了延续。在这种二元对立当中，如果贵族肆意妄为地滥用权力，平民有抗议的权利，这也是一种“西方典型性”。

182 奥托·辛策不仅是他所在大学里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整个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1931年他在文章《议会代表制宪法的世界史条件》中提出了“二元对立精神”这一概念，他认为西方的平民宪法正是在这种概念中诞生的。^[2]二元对立也是在授职斗争过程中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开始分离时被采用的一个概念。在辛策发表这篇文章的同一年，布雷斯劳法学家和世界历史学家欧根·罗森施托克-胡塞出版了一本关于欧洲革命的书。他把11世纪的“教皇革命”称为欧洲的第一次革命，这次革命是格里高利七世的伟业。^[3]如果这次革命的结果是宗教权力战胜了世俗权力，或是世俗权力战胜了宗教权力，就不会出现这种二元对立，也不会有辛策后来提出的“二元对立精神”了。

无论是在德国、英国还是法国，授职斗争均以尴尬的历史

[2] Otto Hintze, 《议会代表制宪法的世界史条件》，哥廷根，1970年，第84—119页。

[3] Eugen Rosenstock-Huussy, 《欧洲革命和民族特性》，斯图加特，1961年，第131—133页。

妥协收场，这也为后来的矛盾埋下了伏笔。罗森施托克-胡塞的学生，美国法学历史学家哈罗德·伯尔曼（Harold Berman），以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的二元对立为起源来阐释整个西方的法学传统，在他看来这种对立正是“教皇革命”留下的结果。^{〔4〕}这自然是对西方历史特性的一种单向解释，但其中却也不乏真知灼见。二元对立是一种初级的多元主义，而这种原初的多元主义正是构成个人主义这一典型西方精神的前提条件，换言之：二元对立包含着自由的种子，它是古西方最重要的标志。

在历史中，一切事件都有根可循。“帝国”（imperium）或“王国”（regnum）和“圣职”（sacerdotium）的分离以另一种区分为前提，这种区分可以追溯到耶稣本人，或用歌德的话来说，是“基督原初之语”：“皇帝之属赋予皇帝，上帝之属赋予上帝。”^{〔5〕}皇帝与上帝的并立并不是强调两者间的同等距离，也不是强调他们的同等地位。耶稣在回答法利塞人使徒提出的设陷问题时，当然坚信上帝绝对优先的地位。但他的回答中也包含了对任何形式神权统治或神职权力的拒绝。神的统治和世俗统治的区分也意味着对后者的限制和肯定：限制是因为它对宗教领域没有支配权；肯定是因为世俗权力获得了独立自主。这里的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还没有分离。然而耶稣辩证的回答宣告了一种原则的诞生，而权力分离就包含在这一原则里，世界的世俗化和人的解放也由此开始。

183

〔4〕 Harold J. Berman, 《法律和革命》，法兰克福，1991年。

〔5〕 Matthäus 22, 21; Markus 12, 17; Lukas 20, 26.

十七个半世纪之后，一位从内心拒绝基督教并时常遭到基督徒猛烈抨击的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宣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一个温和的政权更容易接受基督教，而专制政权则恰好相反。孟德斯鸠在谈到穆罕默德时指出，如果统治者将一种宗教信仰强加给人们，是人类的不幸。然而，基督教统治者和军事领袖也曾多次一意孤行，触犯自己信仰的最高旨意，尤其是在对伊斯兰残暴的十字军东征过程中，只不过这位《论法的精神》的作者对此避而不谈。而关于基督教会和教徒对犹太人、“异教徒”和“狂热分子”的迫害，他也只字不提。他考察的是最本源的宗教，并在其中找到了衡量基督教统治者、军事领袖以及所有基督徒的普遍标准。

184 对于基督教区分神权和皇权的基本思想，孟德斯鸠是这样“翻译”的：“人们不能用神的法则来治理人治的领域，而人的法则也不能来治理神治的领域。”神法和人法的区分有着古老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赫拉克利特，后经基督教自然法学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一区分对孟德斯鸠而言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人类法则的本质在于听凭所有发生的偶然事件，并按照人的意志进行改变；相反，宗教法则的本质在于它的永恒不变性。人类法则关注的对象是善，而宗教关注的则是至善。善的含义可以改变，因为有很多种善；至善则只有一种，因此不能变换。”〔6〕

孟德斯鸠提出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离的现代三

〔6〕 Montesquieu, 《论法的精神》，巴黎，1961年，第716—718页。

权分立学说是现代之前的分权形式——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的分离，贵族权力与平民权力的分离——的继续发展。孟德斯鸠是第一位为司法权赋予独立的、“第三种”权力地位的大学者；在他之前的大学者如洛克（Locke）和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都还没做到这一点。当然，他提到法官的判决权时，却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存在，也为他前面取得的成就带来了负面影响。^{〔7〕}孟德斯鸠低估了这种因其独立性而对现代法治国家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权力，而另一方面他又高估了立法权和执政权分离的重要性。从18世纪开始，在英国这个曾启发他写出《论法的精神》的国家，处于这一关键分界线两边的已不再是国王和议会，而是执政的多数派和议会的反对派。

受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影响最大的国家是美国，只不过在他有生之年，美国还没有建国。《联邦党人文集》收录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约翰·杰伊（John Jay）和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等人为1787年诞生于费城修道院的美国宪法辩护的论文集，在这本书中，孟德斯鸠被引用的次数遥遥领先于其他人。^{〔8〕}

美国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的确更接近孟德斯鸠的学说，而非同时期英联邦的宪法状况。当然，美国宪法之父们当时肯定还参考了其他的权威理论（事实上也是这样），而洛克、博林布鲁克、孟德斯鸠以及诸多其他近代早期的政治

185

〔7〕 Montesquieu, 《论法的精神》，第401页。

〔8〕 《联邦党人——美国宪法评论》，1787年。

理论家都曾从这些权威理论中汲取过营养。

这些理论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公元前2世纪城邦发展的混合宪制理论。这位希腊的历史学家认为罗马共和国完美地糅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并指出正是这种混合才阻止了罗马成为这三种体制当中的任何一种。^[9]美国的宪法之父们在古希腊古罗马看到的当然不是当前宪制的模范，它充其量只能算是类似于雅典民主的可怕实例。^[10]但他们也认同混合宪制是十分合理的形式，它最早在英国得到了实现，在这里他们依据的是1765年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的《评英国法律》（*Commentaries of the Laws in England*）。

布莱克斯通的确点明了英国执政方式最重要的特点：“即它的所有组成部分都相互牵制”。^[11]秉承着布莱克斯通的思想，1785年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他的《弗吉尼亚州笔记》（*Notes on the states of Virginia*）中表示他支持的政府不仅应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之上，而且它还应将自己的权力以某种方式平衡地分配到各个政府机构中，使任何一个机构都无法超越自身的权限而不受其他机构的控制和制约。^[12]

186

这种观点距离那句著名的“制约与平衡”只有一步之

[9] 《城邦、历史》，慕尼黑，1978年，第525—527页。

[10] 《美国和法国革命中的古典主义》，比萨，2005年，第259—269页。

[11] William Blackstone, 《评英国法律》，达姆施塔特，1973年，第24—25页。

[12] Thomas Jefferson, 《弗吉尼亚州笔记》，1955年，第120页。

遥。第一个提出这句名言的大概是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美国第二任总统。1787年，他在三卷本的《为美国政府宪法的辩护》（*Defence of the Constitutions of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gainst the Attack of M. Turgot*）的前言中首次提出了该说法：“共和国政府的制约和平衡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王子院接受”。）^{〔13〕}到了1792年，《联邦党人文集》的主要作者詹姆斯·麦迪逊在一篇写给《民族日报》（*National Gazette*）的文章中指出，将存在于每个政治社会的不同利益和党派转化成相互控制和均衡是政治家的伟大艺术。^{〔14〕}

美国的1787年宪法对权力分离问题的表述十分明确，却缺乏基本权利部分的内容。这部分是后来补加的，是政府对多个州反对派做出的妥协，这是宪法的第一批10项补充条款，也就是所谓的“权利法案”，于1791年生效。尽管如此，美国却依然自诩为人权领域的领头羊。1776年1月12日的《弗吉尼亚权利法案》（*Virginia Declaration of Rights*）的基本人权目录（也是史上第一份人权目录）是以这样的宣言开场的：“所有人都是生来同样自由与独立的，并享有某些天赋权利，当他们组成一个社会时，他们不能凭任何契约剥夺其后裔的这些权利；也就是说，享受生活与自由的权利，包括获取与拥有财产、追求和享有幸福与安全的手段。”紧随其后的是宣布人民主权原则和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分

〔13〕 John Adams, 《为美国政府宪法的辩护》，1778年。

〔14〕 James Madison, 《联邦党人文集》，纽约，1999年，第504—505页。

立，以及对选举自由、禁止非法剥夺自由、新闻和信仰自由的规定。

187

1776年7月4日的独立宣言基本出自弗吉尼亚的托马斯·杰斐逊之手。这篇宣言以一句含义十分丰富的话表述了人权以及从中派生的人民主权原则的意义：“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受造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必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15]

借助这样一句话中，独立宣言总结了几千年来的经验和认识，它将“不言而喻的真理”变成了一套改变世界的程式，将美国的革命变成了史上第一次现代革命。杰斐逊接受了人文主义教育，并受到了欧洲启蒙传统的影响，他和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等签署独立宣言的人士都受到了一种思想传统的影响，这种传统包括斯多葛主义和西塞罗以来的自然法权思想，近代思想家詹姆斯·哈灵顿（James Harrington）、约翰·洛克（John Locke）、博林布鲁克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学说，以及产生于美国本土的对宗教和政治宽容必要性

[15] 《美国抵抗运动和革命编年史》，芝加哥，1976年，第432—433、447—448页。

的认识。如果有人想撰写早期人权宣言（到 1983 年除了弗吉尼亚的之外还有来自美国的另外五个州参与）的前史，自然还要提到其他思想脉络，尤其是西班牙晚期经学哲学家的思想，其中以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大学为首，这所学校在 16 世纪就曾指出，美国印第安人拥有被作为人对待的权利，然而因为他们身为天主教徒，所以在英属殖民地未能产生影响。^[16]

但是，政治思想史还是无法回答，为什么这些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首先会在北美的殖民地提升到宪法条款的地位，并由此成为最高法权。激发学术界讨论这一问题的是 1895 年宪法学家格奥尔格·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的一篇迅速走红、多次出版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的论文《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在这篇论文中耶利内克强调指出，北美将宗教自由理解为基本人权要归功于其英国清教徒起源，此外他还突出了英国公理宗主义（Kongregationalismus）之父约翰·布朗（John Browne）和美国罗德岛州建立者罗杰·威廉斯（Roger Williams）的影响。耶利内克的结论：“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个体不可剥夺、与生俱来和神圣的权利的思想起源不是政治，而是宗教。一直被人们当成革命（这里指的是 1789 年法国大革命）杰作的成果，事实上是宗教改革和斗争的果实。”^[17]

基督教神学家和宗教哲学家恩斯特·特洛尔驰（Ernst

[16] 详见 Michael Stolleis、Georg Jellinek 关于人权和公民权的言论。

[17] Georg Jellinek,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达姆施塔特，1964 年，第 7—77 页。

Troeltsch) 总体上赞成耶利内克的观点, 但他更尖锐地指出, “人权之父”并不是基督教的新教本身, 而是那些被新教驱逐到新世界的教派和唯灵论——虔信主义的一种美国变体。特洛尔驰特别提到了浸礼会信徒和教会派信徒。他认为在北美地区, 神秘唯心论在瓦解教会、追求道德自由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里, 宗教改革的继子们才最终经历了他们的世界史时刻。”^[18]

189 美国独立宣言之父们大多不是清教徒意义上的基督徒, 更不是先前或现在意义上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或许信仰一个奖惩分明的上帝或至少是一个更高级的存在, 但不是所有人都相信基督的神性或者三位一体。罗杰·威廉斯和威廉·佩恩 (William Penn) 这些先驱者都是“信仰自由”的虔诚信徒, 他们奠定了新教的多元性。这是普遍的人权观念最早得以在美国确立的一个前提。此外启蒙思想也起到了辅助作用, 如果没有启蒙的积极影响, 《弗吉尼亚权利法案》和《独立宣言》这种影响世界的文件是很难与世人见面的。

美国国父们对人的设想不仅受到了从古典到现代以来经典哲学、宪法和政治理论的广泛影响, 它还有宗教渊源。当独立宣言提出造物主赋予每个人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时, 这已不仅仅是一种仪式客套, 以为启蒙过的自然神论者和基督信仰者提供交流基础。“每个个体都拥有人的尊严”的思想起源于犹太—基督教对唯一上帝的信仰, 这个上帝按照自己

[18] Ernst Troeltsch, 《新教对现代世界产生的意义》, 慕尼黑, 1911年, 第59—61页。

的形象创造了人类。承认所有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在历史上以每个人在上帝面前平等为前提条件，换言之，如果没有先前发生的一神论文化革命，也就不可能产生这种说法。而自由思想之所以能得到发展，是因为在古西方在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分离上有着古老传统——正是这种传统让英国和美国对圣公会（以及任何其他）的“国教思想”提出了抗议。

英国法学家和历史学家詹姆斯·布莱斯（James Bryce）曾在1888年——美国宪法通过整整一百年后——指出，这部宪法中贯穿着清教徒对人的自然本性的理解。制定宪法的那些人相信原罪，他们希望通过宪法杜绝一切罪孽的可能。^[19]美国神学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赞同并引用了布莱斯的观点，他在《美国历史的讽刺》（*The Irony of American History*）这本书中评价到，新英格兰的加尔文主义和弗吉尼亚自然神论这两种宗教伦理传统影响了早期的美国生活，两者在美国民族特性和国家特性的意义上都得出了极为相似的结论。“不管我们是从马萨诸塞视角还是弗吉尼亚视角来理解本国的思想传统，我们自认为是一个独特的民族——用上帝来开启人类新的篇章。这种意识也是我们存在之基本。”^[20]

耶利内克从清教—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角度来解释人权和公民权时，也明确地驳斥了法国自诩为人权和公民权先锋国家的提法。事实上，美国人权宣言对法国国民议会在1789年8月26日宣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确有着重要影响。8

[19] James Bryce, 《美国联邦》，伦敦，1888年，第306页。

[20] Reinhold Niebuhr, 《美国历史的讽刺》，纽约，1952年，第23—24页。

月 11 日，一位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的法国人第一个建议在制定宪法前通过这样一项宣言，这个人就是拉法耶特侯爵 (Marquis de Lafayette)。他从北美的弗吉尼亚等各独立州的基本权利宣言中汲取了灵感，而且在起草这份人权宣言的过程中，他还得到了当时美国驻巴黎大使托马斯·杰斐逊的极大帮助。^[21]

191 虽然美国的人权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惊人地相似，但两者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区别。1789 年的宣言对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这一项的强调要比《弗吉尼亚权利宣言》以及美国其他州的基本权利目录更为鲜明。除此之外，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的宣言更注重准确性和普遍性。《人权和公民权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中的人权原则上适用于所有种族和肤色的人。因此，法国国民议会在 1794 年 2 月废除了法国殖民地内的奴隶制（虽然此举未能阻止 1802 年领事在拿破仑有生之年重新恢复了奴隶制）。而如果美国的国父们——包括当时是奴隶主的华盛顿和杰斐逊——当时也禁止奴隶制的话，就会失去南方各州的支持；13 个殖民地也就不会宣布并获得独立。因此，“1789 年”在“1776 年”的基础上又迈出了一大步，另一方面这也说明，法国大革命跟美国有着很深的渊源。

法国历史学家和国家思想家阿雷克斯·德·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 在 19 世纪 30 年代初旅行美国时惊讶

[21] Otto Vossler, 《人权宣言研究》，1924 年，第 166—201 页。

地发现，两种平时极度对立的元素在这里相互交织，神奇地结合在了一起，这两种元素就是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22]美国的经验和特色影响深远，同样影响深远的还有在托尔维克眼中截然不同的法国（或从广义上说欧洲大陆）经验和传统。美国社会的一部分至今仍倾向于从宗教中寻找政治自由的渊源，而忽视启蒙运动的人权、法制国家和民主传统。相反，欧洲却几乎已经忘记了启蒙思想的基督教渊源，虽然这一渊源和古典传统同样重要。

这两种观点都具有片面性。人们需要纠正它们，并牢记在历史中将“老”欧洲西方和“新”美国西方联系在一起的过去。18世纪晚期的人权宣言是大西洋两岸共同努力的结果；它们共同奠定了西方政治事业：一个必须兑现的承诺，只要一个国家承认不可剥夺的人权，就要遵守这一承诺。

192

（二）

接下来谈我的第二个论点：西方的西方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标志是时间的不一致性。这一说法也适用于美国。《独立宣言》发表整整四十年之后，“民主”这个概念才被普遍接受，而不再被认为是议会选举制的对立面。又差不多过了九十年，南方各州的奴隶制才在一场血腥的内战中消亡，而此后又过了一百年，才发生了反对种族歧视奴隶后代

[22] Alexis de Tocqueville, 《论美国民主》，巴黎，1990年，第1卷，第35页。

的激烈而成功的斗争。

美国革命不仅是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同时还是一次保守主义革命：他们诉求的是英国的子民们自古以来就一直享受的权利。为了取得胜利，美国革命需要打败一个外来的敌人：殖民宗主国英国。德国的犹太返乡者恩斯特·弗兰克尔是一位对我启发很大的法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在此我借用他的说法：“美国革命针对的并不是传统英国宪法权利的原则，它针对的其实是违背这一宪法的行为。而因为这场民主的胜利并不是以打倒一个阶层为代价，所以美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对民主的仇恨情绪。”^[23]

193 这种情况不应该也不可能在欧洲重复。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不仅在法国创造了一个反对革命的右派，还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引发了对革命的仇恨情绪。这里的主要原因出在法国革命的进程中，尤其是从温和派到雅各宾派极端“恐怖”政策的急速过渡。托克维尔在19世纪50年代后半期这样描述这次大转变：“起初，人们讨论的只是如何更好地平衡权力，更好地制约关系，但很快，人们追随、追赶、狂奔的对象就变成了民主本身。起初，人们引用和阐释最多的是孟德斯鸠，到后来人们只谈论卢梭；卢梭成了革命辉煌期的唯一导师，并且将一直占据这一位置……”^[24]

托克维尔可能高估了孟德斯鸠的后续影响，但绝对没有高估卢梭的影响。这位《社会契约论》的作者是分权学说、

[23] Fraenkel, 《政府体系》，第29—45页。

[24] Alexis de Tocqueville, 《从断片中继续古老的政权和革命》，斯图加特，1954年。

“制约与平衡”以及“议会代表制政府”的坚定反对者。在公共福利的问题上，卢梭的看法和洛克、博林布鲁克以及《联邦论文集》的作者们不同，他并不认为公共福利来自社会不同利益的分配，是社会多元性的代表性成果，相反，他认为，公共福利是一种理性规定的尺度，需要由一位启蒙进步、代表“普遍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的执行官贯彻到政治中，在迫不得已时，他甚至可以违背多数个体的意志（*volonté de tous*）来行事。^[25] 卢梭不仅受到那些意图将养尊处优的统治者赶下宝座的人士的欢迎，那些决心让整个国家或世界服从他们自诩为进步或历史目标的新型暴君也会赞成他的观点。

法国革命时代的最后一章是拿破仑帝国，紧随其后的首先是1814年波旁王朝的复辟，接着是1830年后奥尔良七月王朝，1848年革命后是拿破仑三世统治的第二帝国，而直到1870—1871年它在德法战争战败后建立了第三共和国（起初只是一个公爵共和国），才成为了一个公民民主政权。英国的议会君主制在光荣革命后将近三十年才得以确立。19世纪及20世纪初期的政治变迁主要通过扩大统治基础来实现，其方式是让中下层民众获得选举权，也就是扩展了参与选举权的范围。而在那些特权阶层社会根基相对薄弱的地方，政治变迁进行得也较为平顺，例如丹麦和瑞典：王朝适应了时代的发展，走向了从绝对君主制到君主立宪制，最后到议会君主制的道路。

194

[25] Jean-Jacques Rousseau, 《社会契约论》，巴黎，1964年，第371—372页。

隶属于伊比利亚王国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步入民主的道路则更为漫长和艰辛。作为保守势力的可靠后盾，天主教会在以农村人口为主的民众中有着广泛的社会根基。两个国家在20世纪都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右翼独裁统治，直到70年代，特殊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才为基本民主铺平了道路。意大利直到1859年的独立战争后才成为民族国家，1861年以后一直是议会君主制。由于地域、社会和意识形态上的剧烈冲突，意大利的民主制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墨索里尼政权倒台整整一年后，1945年3月意大利以全民公投的方式选择了共和国政体。意大利沿用至今的1947年12月宪法具有议会民主性质。

在德国，西方民主观念的阻力是任何一个曾属于古西方的欧洲国家都不能比拟的。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在1932年——纳粹党人“夺权”前一年——曾说道，德国是“经典的不同代国家”。他在这里沿用的是艺术史学家威廉·平德（Wilhelm Pinder）（政治上属于右派）的一个概念：“同代的不同代性”，指不同风格流派的同时并存。马克思主义者布鲁赫用这个概念来解释为什么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德国会存在一批“不同代”的前工业社会“遗留”群体，如容克、农民和小市民等，这些人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马克思主义。布鲁赫认为，这种“不同代性”的主要原因在于德国直到1918年都未曾发生过“市民革命”。^[26]

[26] Ernst Bloch, 《不同代性及其辩证法带来的责任》，波恩，1928年。

“同代的不同代性”说法的确体现了 18 世纪晚期到 20 世纪德国政治发展的特征：德国市民阶层的大多数人拒绝从启蒙运动中得出西方经典民主等政治结论。在俾斯麦统治时期，人民对“自上而下革命”优点的信任慢慢转化成了一种对政府权力的内在默许，而这种权力绝不是来自人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一种粗暴的方式体现了这一点。德国的知识精英们以“1914 年精神”来回应“1789 年精神”，用对秩序、规驯和内向的歌颂来回应“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他们眼中的西方是一种肤浅、物质的“文明”，他们更崇尚的是自诩为更高等、完美和深沉的德意志“文化”。他们拒绝多元的民主，崇尚强势的国家。

德国抗拒西方政治理念的高潮表现在希特勒的统治上。纳粹独裁、“二战”、犹太人大屠杀和 1945 年的彻底失败，这一系列的惨痛经历才让反西方的德国精英阶层和广大民众慢慢摒弃了原先的思想土壤。1945 年后，只有一部分德国人有机会从魏玛的失败中汲取经验，建立了一个能够有效运行的新议会民主制，他们是活在西占区以及后来联邦德国境内的那些德国人。而生活在苏占区以及后来民主德国的德国人要一直等到 1989 年的“和平革命”，才能享受到政治自由。而他们也抓住了这次机会，在一年后加入了联邦德国。

1990 年 10 月 3 日，两德的重新统一从三个层面上解决了德国问题：第一，从国际法上承认了德波的奥德—尼斯河边界，澄清了领土问题（这同时也为另一个世纪问题，波兰问题，给出了答案）。第二，1848 年革命的双重目标，统一

196

和自由得到了实现。第三，统一后的德国成为了北约成员国，这也使德国不再是欧洲的安全威胁。

由此，统一西方的伟大计划终于可以着手实施了。因为，1990年前一直由共产党统治的中东欧八国加入欧盟的意义非同凡响，这些国家都属于古西方：1945年2月雅尔塔协定分裂了欧洲，也违背了历史。此时我们才能做到“同根生，共生长”：这是布兰特在1989年11月10日——柏林墙倒塌后一天——说的一句话，此时他想到的不仅是德国，而且还有欧洲。^[27]

在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上，欧盟的这几个中东欧新成员国自中世纪以来一直与西欧有着文化往来，并拥有共同的法制传统价值。当然，它们和西欧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它们的分界线恰好横跨德国，沿着易北河和萨尔河走向）：相较于197 西欧，中东欧的城市市民阶层势力比较弱小；农业生产以封建地主和数百年的大规模农奴制度为特点。和德国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主制在大多数中东欧国家都无法成功。这些位处古西方东部国家的西化过程还远未完成。即便是西德，也是在“二战”结束几十年之后，哈贝马斯在1986年回顾历史时才提出“联邦德国对西方政治文化毫无保留地开放”。^[28]

“对西方政治文化毫无保留地开放”：欧盟应该将其作

[27] Bernd Rother, 《言出必行？布兰特何时何地说过“同根生，共生长？”》，2000年，第90—93页。

[28] Jürgen Habermas, 《一种对伤害的处理方式》，1987年，第62—76（75）页。

为衡量所有成员国以及想加入欧盟的国家的标准。对西方政治文化开放并不要求该国家一定是古西方的一部分（1981年加入欧盟的希腊就不是，2007年1月1日加入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也不是）。但是价值和政治文化是有历史的，如果希望接受西方价值，就应该了解和承认这些历史——这是欧盟1993年在哥本哈根确立入盟标准的基础。

（三）

最后就我的第三个论点做几点解释：西方政治文化具有多样性，因此是一种争议文化。

“争议文化”这个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小有名气，因为它是一篇引起激烈讨论的文章的副标题，这篇论文由社会主义统一党中央委员会的社会科学院和社民党基本价值委员会经过协商确定，在1987年以《意识形态之争和共同安全》为题发表。^[29] 文章试图以“大众”的方式来解决意识形态的冲突问题，以此达到一定程度的和解，这种尝试的内容和影响是具有争议性的。文章激起了党派政治的抗议，同时也受到了合理的批判，但“争议文化”的意义还不仅于此。事实上，多元民主的存在的确依赖于不同政治见解的和平表达。只有实现了这一点，才能在更高层面将其称之为政治文化：它的最主要特点就是成文和不成文的法律规范的遵

198

[29] 《法兰克福汇报》1987年8月28日。

守，以保证政治斗争不会演变成潜在甚至公开的内部战争。

魏玛共和国只在很有限的程度上实现了争议政治文化。在这个德国第一届民主制度的末期，政治观和世界观的冲突极度激化，几乎证明了那个毁誉参半的政治定义的正确性：该定义由卡尔·施密特于1927年在《政治概念》一文中提出：“决定政治行为和动机的政治区别，实是对朋友和敌人的区别。”^[30]

恩斯特·弗兰克尔经历过魏玛共和国，1938年之前他在纳粹德国，1951年前他一直流亡美国，1975年去世前他又在联邦德国，有了四重经历，他才能用一种饱经风霜、建立在盎格鲁-撒克逊实践基础上的政治多元论来回应卡尔·施密特受卢梭影响的投机决定论（或唯意志论）。1964年弗兰克尔写道：“对多元政治的认同以对民主的认识为前提。自由民主既意味着区别也意味着一致，它既是‘分歧’（cleavage），也是‘共识’（consensus）”。多元民主同时需要满足两个方面的要求：一边是国家和社会共同认可的部分，无须投票而“被普遍接受的价值体系”；另一边则是需要不断投票决定的争议问题。“多元不是指一个只有多元的国家，而是指一个也可以多元的国家。多元是一个辩证概念……多元指一致和区别。”^[31]

对于西方是否（还）是一个价值共同体这一当今经常讨

[30] Carl Schmitt, 《政治性的概念》，柏林，2002年，第26页。

[31] Ernst Fraenkel, 《民主的结构缺陷及其克服过程》，载《德国和西方民主》，斯图加特，1964年，第48—68页。

论的问题，从弗兰克尔这些思考中我们也能得到一个辩证的答案：西方是一个价值共同体，它在从共同价值派生的政治论断上存在争论，且必须争论。西方价值受到了跨大西洋色彩和经验的影响，同时也和所有历史现象一样经历着不断发展。当人们将西方和其他社会文化进行比较时，西方的共同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政治文化上，欧盟国家和美国有着许多自己的特点。值得欣慰的是，这些国家都会为了强调集体“身份”而标榜自己与其他地区的差异。

欧盟和美国也不需要第三方来认可它们的共同点。它们有理由、有必要维护西方的价值和机构不受任何攻击和威胁，并尽可能地宣扬它的影响。然而如果某种政策意图强制性地推广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则注定会一败涂地。

1945年后美英法之所以能成功协助西德建立民主政权，是因为德国不但有自由、法制和民主的传统，而且重新激活了这种传统。以布什总统为首的美国新保守派以德国1945年的经验为依据，认为可以从外部（或必要时只能从外部）使用军事手段将任意国家转化成民主政权，并以此作为发动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借口，这种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伊拉克缺少德国的西方特色和经验，而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德国的转变。整个西方仍将长期为这一错误的类比付出沉重代价——在近东和中东地区更甚。

西方政治文化的历史表明，民主绝不仅仅是多数统治。西方特色民主以多元化的公民社会为前提，一致认同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和法律统治。“法治王国，而不是人治王国”，这

200

是1656年詹姆斯·哈灵顿在《大洋洲联邦》(*Commonwealth of Oceana*)描述的他理想中的共同生存模式——该名言于1780年在马萨诸塞权利法案中再次以“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的形式出现。^[32] 在这位英国共和派人士以及为新英格兰最古老州立宪的国父们看来，法律既包括成文法，也包含不成文法——而属于后者传统的既包括古希腊的不成文法，也包括基督教和启蒙运动传统的自然法规则。

缺乏共同基本价值的多数派统治有可能导致西方民主的反面，在这一点上，德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魏玛共和国1932年最后两届帝国议会选举中，两个极端反对民主而崇尚独裁统治的党派获得了无效的多数票 (*negative mehrheit*)：纳粹党和共产党。我们不能错误地认为，这样的发展只可能出现在非西方式的社会中。然而，不仅德国这样的年轻民主政权需要批判地看待自己的历史，旧的民主政权同样需要。西方一直在反复违背自己宣扬的价值，美国国父们对奴隶制的容忍就是一例。如果西方想令人信服地实践自己的价值观，那它就更没有理由对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及其严重后果保持沉默。

西方的成就以及法制国家、三权分立和民主制度已经被多个非西方社会采纳，种种迹象表明，这种西化或部分西化会持续下去。然而西方早已不再主导着世界，它只代表了众多政治文化中的一种。数一数自认为属于西方的国家的人

[32] James Harrington, 《大洋国》，剑桥，1992年，第8页。

数，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总共只占世界人口的一小部分。

但是，“人的基本权利不可剥夺”仍然是一项普世要求。既然我们不能强制性地在全世界普及这一要求，西方能做的只有坚持自己的价值，宣传这些价值，在必要的情况下，利用包括人道主义干涉在内的一切手段去阻止侵犯人权事件的发生。由此，西方要努力团结起来，致力于改革联合国和修改联合国宪章，促进国际法的继续发展。然而目前的西方远远没有达成这种共识、认识和凝聚力。

西方的历史有很多值得学习之处，西方也希望世界其他国家能从中学习经验。西方的大业仍未完成，而且很可能一直处于未完成状态。但这不阻碍它的继续发展。如果西方不只是在口头上对价值共同体信誓旦旦，而是认真对待，那它还能在这些普遍价值的普及做出更多贡献，而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将这些价值称为“西方价值”。

名词缩写表

- AdR 帝国总理府档案
AsD 社会民主档案馆
CDU 基督教民主联盟
CSU 基督教社会联盟
DDP 德国民主党
DDR 民主德国
DVP 德国人民党
EU 欧盟
FAZ 法兰克福汇报
GULag 苏联劳动惩戒营的管理部门
HZ 历史杂志
JÖM 公共言论年鉴
KPD 德国共产党
KZ 集中营
MEW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
ND 新版/再版
NSDAP 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劳工党
SA 冲锋队
SED 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
SPD 德国社会民主党
SS 党卫军
USA 美国
USPD 独立社会民主党

人名索引

(索引条目后所列数字为原书页码, 即本书边码)

- Adams, John 亚当斯, 约翰 186f.
- Adenauer, Konrad 阿登纳, 康拉德 117, 119—128, 132, 149, 154f., 171f.
- Baden, Max von 巴登, 马克斯·冯 54
- Bahr, Egon 巴尔, 埃贡 132, 155, 151f., 164
- Bailey, George 贝利, 乔治 121
- Bamberger, Ludwig 班贝尔格, 路德维希 29f., 37f., 150
- Bebel August 贝贝尔, 奥古斯特 28, 34
- Becher, Johannes 贝歇尔, 约翰内斯·R. 133
- Behrenhorst, Georg Heinrich von 贝恩霍斯特, 格奥尔格·海因里希·冯 10
- Bell, Johannes 贝尔, 约翰内斯 61
- Bernnigsen, Rudolf von 本恩森, 鲁道夫·冯 33, 39
- Berman, Harold 哈罗德, 伯尔曼 182
- Bernstein, Eduard 贝尔恩施泰恩, 爱德瓦特 66—71
- Bethmann Hollweg, Theobald von 贝特曼·霍尔维克, 泰奥巴尔特·冯 58, 61
- Bismarck, Otto von 俾斯麦, 奥托·冯 13f., 17, 22f., 25—40, 42, 52, 107f., 112f., 121—124, 126, 144, 146, 151, 166, 195
- Blackstone, William 布莱克斯通, 威廉 185

- Bloch, Ernst 布洛赫, 恩斯特 194f.
- Bolingbroke, Henry Saint John, I. Viscount Bolingbroke 博林布鲁克, 亨利·圣约翰, I. 威斯康特·博林布鲁克 184 f, 187, 193
- Brandt, Willy 布兰特, 威利 131 — 133, 155 — 158, 163, 167, 196
- Braun, Adolf 布劳恩, 阿道夫 65, 67
- Brentano, Lujo 布伦塔诺, 鲁约 32
- Breschnew, Leonid Iljitsch 勃列日涅夫, 列昂尼德·伊里奇 176
- Browne, John 布朗, 约翰 188
- Brüning, Heinrich 布吕宁, 海因里希 88—90, 94f., 98, 102
- Bryce, James, I. Viscount Bryce, 布莱斯, 詹姆斯, I. 威斯康特·布莱斯 189f.
- Bush, George W. 布什, 乔治·W. 199
- Chamberlain, Arthur Neville 张伯伦, 亚瑟·纳威 140
- Chotek, Sophie Gräfin, Herzogin von Hohenberg 科泰克, 索菲女伯爵, 霍恩贝尔格公爵夫人 58
- Chruschtschow, Nikita Sergejewitsch 赫鲁晓夫,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129 f., 132, 176
- Cicero, Marcus Tullius 西塞罗, 马库斯·图留斯 187
- David, Eduard 大卫, 爱德瓦特 60, 62, 72
- Dittmann, Wilhelm 迪特曼, 威廉 81
- Droysen, Johann Gustav 德罗森, 约翰·古斯塔夫 103
- Ebert Friedrich 艾伯特, 弗里德里希 52—54, 56, 59f., 62,

- 72, 79, 83, 86, 97
- Eichhorn, Emil 埃希霍尔恩, 艾米尔 55
- Eisler, Hanns 艾斯勒, 汉斯 133
- Eisner, Kurt 埃斯纳, 库尔特 60, 63f., 67
- Elisabeth I., Zarin von Rußland 伊莉莎白一世, 俄国女沙皇
12
- Engelberg Ernst 恩格尔贝格, 恩斯特 17
- Engels, Friedrich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22, 28, 44—48, 50
- Epstein, Klaus 爱普施泰恩, 克劳斯 121
- Fest Joachim 费斯特, 约阿西姆 142f.
- Fraenkel, Ernst 弗兰克尔, 恩斯特 100, 192, 198f.
- Franklin, Benjamin 富兰克林, 本杰明 187
- Franz Ferdinand, Erzherzog von Österreich 弗朗茨, 费迪南德, 奥地利大公 48, 60f.
- Friedrich II. Der Große, König von Preußen 弗里德里希二世, 普鲁士国王 11f., 15, 17, 31, 113
- Friedrich III., Kurfürst von Brandenburg 弗里德里希三世, 勃兰登堡选帝侯(1701年后称弗里德里希一世, 普鲁士国王) 11
- Friedrich Wilhelm I., der Große Kurfürst, Kurfürst von Brandenburg II. 弗里德里希一世, 大选帝侯, 勃兰登堡选帝侯二世 12
- Friedrich Wilhelm I., der Soldatenkönig, König in Preußen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 士兵国王, 普鲁士国王 12
- Friedrich Wilhelm IV. König von Preußen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普鲁士国王 22
- Frings, Joseph, Kardinal 弗林斯, 约瑟夫, 红衣主教 115

Fromme, Friedrich Karl 弗洛梅, 弗里德里希·卡尔 138f.
Fulbright, James William 傅尔布莱特, 詹姆斯·威廉 129f.
Furet, François 弗雷, 弗朗索瓦 43, 50, 148

Gagern, Heinrich von 茄戈恩, 海因里希·冯 18
Gaus, Günter 高斯, 君特 162
Gayl, Wilhelm Freiherr von 盖伊尔, 威廉, 弗莱赫尔·冯 96
Genscher, Hans-Dietrich 根舍尔, 汉斯-迪特里希 165
Geremek, Bronislaw 盖雷梅克, 布罗尼斯瓦夫 164
Geßler, Otto 盖斯勒, 奥托 79
Giebel, Carl 吉贝尔, 卡尔 69
Gillissen, Günter 吉勒森, 君特 139f.
Giscard d'Estaing, Valéry 季斯卡·德斯坦, 瓦莱里 161
Glötz, Peter 格罗茨, 彼特 128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歌德, 约翰·沃尔夫冈·冯 182
Goldhagen, Daniel 格尔特哈根, 丹尼尔 148
Gorbatschow, Michail Sergejewitsch 戈尔巴乔夫, 米哈伊尔·
谢尔盖耶维奇 50, 139f., 164, 176
Grass, Günter 格拉斯, 君特 134, 147, 149
Gregor VII., Papst 格里高利七世, 教皇 159, 182
Gueffroy, Chris 歌弗罗伊, 克里斯 135
Gürtner, Franz 居尔特纳, 弗朗茨 96

Haase, Hugo 哈瑟, 胡戈 58
Habermas, Jürgen 哈贝马斯, 于尔根 127, 141f., 145,
171, 178, 197
Hamilton, Alexander 汉密尔顿, 亚历山大 184, 193
Hardenberg, Karl August Freiherr von 哈登堡, 卡尔·奥古斯

- 特·冯 13
- Harrington, James 哈灵顿, 詹姆斯 187, 200
- Hecker, Friedrich 赫克尔, 弗里德里希 20, 56
-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黑格尔,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 135
- Heimpel, Hermann 黑培尔, 赫尔曼 169
- Heraklit 赫拉克利特 183
- Hildebrand, Klaus 希尔德布兰特, 克劳斯 141f.
- Hildermeier, Manfred 希尔德迈尔, 曼弗雷德 50
- Hilferding, Rudolf 西尔弗丁, 鲁道夫 14, 77, 100
- Hillgruber, Andreas 希尔格鲁伯, 安德里亚斯 140f.
- Hindenburg, Paul von Beneckendorff und von 兴登堡, 保罗·冯·贝内肯多夫·冯 10, 15, 85—99, 102, 109f., 119
- Hindenburg, Oskar von Beneckendorff und von 兴登堡, 奥斯卡·冯·贝内肯多夫·冯 88, 91, 99
- Hintze, Otto 辛策, 奥托 11, 181f.
- Hitler Adolf 希特勒, 阿道夫 7f., 15—17, 32, 71, 73, 89—105, 108—115, 117—119, 137—143, 145f., 148, 150f., 166, 171, 195
- Hobsbawm, Eric 霍布斯堡姆, 埃里克 148, 170
- Hoch, Gustav 豪赫, 古斯塔夫 67
- Hödel, Emil Max 赫德尔, 埃米尔·马克斯 33, 36
- Hoffmann, Max 霍夫曼, 马克斯 33, 36
- Honecker, Erich 昂纳克, 埃里希 17, 133, 161f.
- Hugenberg, Alfred 胡根贝尔格, 阿尔弗雷德 100
- Jacoby, Johann 雅克比, 约翰 150
- Jaruzelski, Woiciech 雅鲁泽尔斯基, 沃伊切赫 161

- Jay, John 杰伊, 约翰 184, 193
- Jefferson, Thomas 杰斐逊, 托马斯 185, 187, 190f.
- Jellinek, Georg 耶利内克, 格奥尔格 188, 190
- Jesus Christus 耶稣基督 182f.
- Johann Sigismund, Kurfürst von Brandenburg 约翰·希吉斯蒙特, 勃兰登堡选帝侯 11
- Kahr, Gustav Ritter von 卡尔, 古斯塔夫·李特·冯 80f.
- Kaiser, Jacob 凯泽, 雅各布 126
- Kalniete, Sandra 卡尔尼特, 桑德拉 173f.
- Kant, Immanuel 康德, 依曼努尔 13
- Kapp, Wolfgang 卡普, 沃尔夫冈 71
- Karl der Große, röm. Kaiser und König der Franken 卡尔大帝, 法兰克皇帝 45
- Kautsky, Karl 考茨基, 卡尔 34, 44, 47f., 54f., 60—62, 66, 70
- Kennan, Geroge F. 肯南, 乔治·F. 169
- Kennedy, John F. 肯尼迪, 约翰·F. 129f., 132
- Koch, Hansjoachim W. 考赫, 汉斯约阿西姆·W. 140
- Kohl, Helmut 科尔, 赫尔穆特 128, 137, 164
- Korn, Salomon 克尔恩, 所罗门 174
- Kummer, Fritz 库默, 弗里茨 67
- Lafayette, Marie-Joseph Motier, Marquis de 拉法耶特侯爵, 玛丽-约瑟夫·蒙特利耶 190
- Lafontaine, Oskar 拉方丹, 奥斯卡 172
- Lassalle, Ferdinand 拉萨勒, 费迪南德 29
- Lasker, Eduard 拉斯科尔, 爱德瓦特 32, 150

- Legien, Carl 雷基恩, 卡尔 70
- Lenin, Wladimir Iljitsch (Uljanow) 列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乌里扬诺夫) 43, 45—48, 50, 55, 159
- Leopold I. 利奥波德一世 11
- Lepsius, M. Rainer 雷普休斯, M. 莱纳 49
- Liebknecht, Karl 李卜克内西, 卡尔 55f., 58
- Liebknecht, Wilhelm 李卜克内西·威廉 28
- Löbe, Paul 吕博, 保罗 82
- Locke, John 洛克, 约翰 184f., 187, 193
- Lossow, Otto von 罗索夫, 奥托·冯 81
- Louis Philippe, König von Frankreich 路易, 菲利普, 法兰西国王 18
- Löwenthal, Richard 罗文塔尔, 理查德 131, 176
- Ludendorff, Erich 鲁登道夫, 埃里希 44, 85
- Luther, Martin 路德, 马丁 45
- Luxemburg, Rosa 卢森堡, 罗莎 55f.
- Macmillan, Harold 麦克米伦, 哈罗德 130
- Madison, James 麦迪逊, 詹姆斯 184, 186, 193
- Maetzke, Ernst-Otto 迈茨克, 恩斯特-奥托 139
- Mai, Franz 迈, 弗朗茨 125
- Mann, Thomas 曼, 托马斯 106—108, 113
- Marx, Karl 马克思, 卡尔 10f., 22f., 28, 43—49, 54, 128
- Marx Wilhelm 马克思, 威廉 83, 86
- Meinecke, Friedrich 迈内克, 弗里德里希 23, 111, 115
- Meissner, Otto 麦思纳, 奥托 88, 91, 97
- Metternich, Clemens Lothar Graf 梅特尼西伯爵, 克雷门斯·洛塔尔 164

- Michalka, Wolfgang 米沙尔卡, 沃尔夫冈 141
- Michnik, Adam 米奇林克, 亚当 164
- Mirabeau, Honoré Gabriel Riqueti Graf von 米拉波伯爵, 奥诺
莱·加里布埃尔·里克蒂 10
- Mittenzwei, Ingrid 米腾茨威, 英格里特 17
- Mohamed 穆罕默德 183
- Mommsen, Theodor 莫姆森, 泰奥多 32
- Montesquieu, 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孟德
斯鸠, 查理·路易 168, 183—185, 187, 193
- Müller, Hermann 缪勒, 赫尔曼 64, 67, 80, 88, 93
- Müller-Armack, Alfred 米勒-阿玛克, 阿尔弗雷德 11
- Napoléon I. Bonaparte 拿破仑·波拿巴一世 13, 112, 191,
193
- Napoléon III. 拿破仑三世 14, 26—28, 31, 193
- Niebuhr, Reinhold 尼布尔, 莱茵霍尔德 190
- Nobiling, Karl-Eduard 诺布林, 卡尔-爱德瓦特 33f, 36
- Nolte, Ernst 诺尔特, 恩斯特 140—142, 145—148, 171,
174
- Noske, Gustav 诺斯克, 古斯塔夫 56
- Nürnberger, Richard 纽因贝尔格, 理查德 43
- Oppenheimer, Franz 欧彭海默, 弗朗茨 139
- Papen, Franz von 帕彭, 弗朗茨·冯 10, 90f., 95—100, 102
- Penn, William 佩恩, 威廉 189
- Pinder, Wilhelm 平德, 威廉 195
- Poincaré, Raymond 庞加莱, 雷蒙德 85

- Radbruch, Gustav 拉特布鲁赫, 古斯塔夫 87
- Rauch, Christian Daniel 拉乌赫, 克里斯蒂安·丹尼尔 17
- Reagan, Ronald 里根, 罗纳德 137
- Reiter, Janusz 莱特尔, 亚努茨 177
- Rosenstock-Huessy, Eugen 罗森施托克 - 胡塞, 欧根 159, 182
- Roth, Daniel 罗特, 丹尼尔 126
- Rousseau, Jean-Jacques 卢梭, 让 - 雅克 193, 198
- Sassulitsch, Vera 萨苏里奇, 维拉 47
- Scheel, Walter 舍尔, 瓦尔特 133, 157
- Scheidemann, Philipp 舍德曼, 菲利普 51, 56, 59 — 62, 66, 69, 150
- Schiffer, Eugen 施费尔, 奥乌根 59f.
- Schlegel, Friedrich 施莱格尔, 弗里德里希 146
- Schleicher, Kurt von 施莱赫尔, 库尔特·冯 88, 91, 95f., 98f., 102
- Schmidt, Helmut 施密特, 赫尔姆特 161
- Schmitt, Carl 施密特, 卡尔 73, 198
- Schröder, Kurt Freiherr von 施罗德, 库尔特·弗莱赫尔·冯 98
- Schumacher, Kurt 舒马赫, 库尔特 124f., 127
- Schwerin von Krosigk, Graf 罗斯克伯爵 96, 98f.
- Seeckt, von Hans 瑟克特, 冯·汉斯 79, 83
- Seißer, Hans Ritter von 赛瑟, 汉斯·李特·冯 81
- Semler, Christian 瑟姆勒, 克里斯蒂安 175
- Semprún, Jorge 瑟姆普鲁恩, 约尔格 178f.

- Severing, Carl 瑟威灵, 卡尔 82
- Skubiszewski, Krzysztof 斯库比斯泽夫斯基, 克尔泽斯托夫
165
- Stadelmann, Rudolf 施塔德尔曼, 鲁道夫 13, 23
- Stalin, Josef Wissarionowitsch 斯大林,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
维奇 43, 49, 131, 139, 142f., 145, 154, 177
- Stein, Karl Reichsfreiherr vom und zum 施泰因, 卡尔·冯 13
- Sternberger, Dolf 施坦贝尔格, 道尔夫 120
- Stinnes, Hugo 施提讷斯, 胡戈 76f., 79
- Stourzh, Gerald 施图尔茨, 格拉尔特 180
- Strasser, Gregor 斯特拉瑟, 格雷戈尔 98
- Strauß, Franz Josef 施特劳斯, 弗朗茨·约瑟夫 133
- Stresemann, Gustav 施特雷瑟曼, 古斯塔夫 75, 77, 79 —
83, 88, 123
- Struve, Gustav von 施图威, 古斯塔夫·冯 20
- Stürmer, Michael 施图尔默, 米夏埃尔 141
- Thälmann, Ernst 台尔曼, 恩斯特 86, 90
- Thomas, Albert 托马斯, 阿尔伯特 63
- Tocqueville, Alexis de 托克维尔, 阿雷克斯·德 191, 193
- Treitschke, Heinrich von 特莱驰克, 海因里希·冯 35
- Troeltsch, Ernst 特洛尔驰, 恩斯特 51, 188
- Trotzki, Leo Davidowitsch 托洛茨基, 里奥·大卫道维奇 43f.
- Ulbricht, Walter 乌布里希, 瓦尔特 129—131, 133
- Vitoria, Francisco de 维多利亚, 弗朗西斯科·德 187
- Vogt, Karl 沃格特, 卡尔 21

- Voigt, Karsten 佛克特, 卡斯滕 163
- Waldheim, Kurt 瓦尔德海姆, 库尔特 139
- Washington, George 华盛顿, 乔治 191
- Weber, Max 韦伯, 马克斯 11, 86, 100, 175
- Weizmann, Chaim 魏茨曼, 蔡姆 140
- Weizsäcker, Richard von 魏茨泽克, 理查德·冯 118, 138, 170f.
- Wels, Otto 威尔斯, 奥托 64f.
- Wegner, Paul Wilhelm 魏格纳, 保罗·威廉 126
- Wilhelm I. 威廉一世 27, 33, 35, 85
- Wilhelm II. 威廉二世 31, 61, 86
- Williams, Roger 威廉斯, 罗杰 188f.
- Wilson, Thomas Woodrow 威尔逊, 托马斯·伍德罗 52
- Wolff, Theodor 沃尔夫, 台奥多 51
- Woityla, Karol 沃伊蒂瓦, 卡罗尔 159
- Zeigner, Erich 蔡格纳, 埃里希 81f.